

# 黄埔军校首席顾问 布柳赫尔元帅

〔苏〕瓦·瓦·布柳赫尔 著

高 瓦译 董 坚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

68311252 673788  
黄埔军校首席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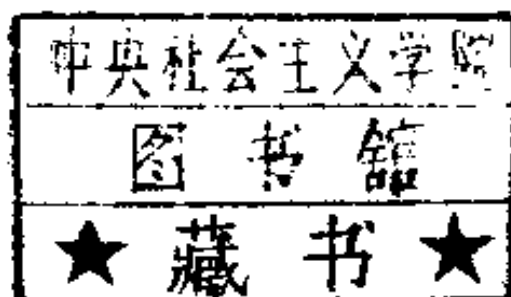
# 布柳赫尔元帅

〔苏〕瓦·瓦·布柳赫尔 著

高瓦译 袁坚校



\*200243398\*



军事科学出版社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之子。为了再现父亲的光辉战斗历程，他曾多次对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访问过许多当年同父亲并肩战斗的老一辈战士，收集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为苏联最早授衔的五位元帅之一，国内战争英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任师长、集团军司令及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在粉碎杜托夫、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及温甘纶等白匪的战斗中，出生入死，英勇无畏，指挥机智，战功卓著，为捍卫伟大十月革命的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1927年曾奉派前来我国，化名加伦，担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黄埔军校顾问组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本书文笔生动，史料翔实，对研究布柳赫尔的戎马生涯、指挥艺术及苏联国内战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均有参考价值。至于书中有无偏颇之处，希望读者注意鉴别。

军事科学出版社

……作为一名与苏维埃共和国  
敌人斗争的无畏战士、驰名的英雄，  
瓦·康·布柳赫尔是众人的楷模。  
坦率地说，我一直希望能成为  
象这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  
非凡的同志和天才的司令员  
那样的人。

苏联元帅、四次苏联英雄  
格·康·朱可夫

## 原书出版者的话

本书作者瓦·瓦·布柳赫尔系苏联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之子。瓦·康·布柳赫尔是苏维埃国家杰出的军事政治活动家，红军天才的统帅和组织者，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本书的写作基础是元帅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回忆录、档案材料以及作者个人到他父亲于1917—1938年间指挥赤卫队、游击队、工农红军的兵团和军团作过战的地方去旅行访问所得到的资料。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是从我们工人的队伍中投身于为保卫伟大十月革命成果、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他担任过车里雅宾斯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领导过车里雅宾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由于他指挥了1918年夏秋乌拉尔红色游击队在敌后的一次空前的奔袭，在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荣获红星勋章。他是步兵第30师，这颗著名的“乌拉尔明珠”的创建人之一，这支部队至今仍在苏联武装力量的编成之内。

作为东方面军第3集团军司令员的助手，瓦·康·布柳赫尔为从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手中最终解放乌拉尔做了大量工作。乌拉尔人是他的步兵第51师的骨干。这个师在争夺秋明和托博尔斯克的战斗中，在守卫神奇的卡霍夫卡和强攻披列科普时的表现，使它的战旗披满不朽的荣誉。

我们的许多同胞在瓦·康·布柳赫尔指挥下参加了争夺

沃洛恰耶夫卡以及在基辅-沃罗涅日铁路沿线，在哈桑湖一带的战斗；他们在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里服役，从1929至1938年这个集团军的司令员就一直是这位无产阶级的统帅。

元帅的儿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布柳赫尔的生活也与乌拉尔紧密相连。1948年他开始在列夫达的中乌拉尔炼铜厂劳动。11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高级工程班毕业，并于同年，1959年，被吸收加入苏联共产党。

1965年前瓦·瓦·布柳赫尔在中乌拉尔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后来他被调到莫斯科，到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工作，但1971年他又重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担任乌拉尔重型电机联合企业的总工程师。

现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乌拉尔最年轻的一座高等学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程师范学院院长兼教授。他曾荣获3枚劳动红旗勋章和1枚民族友谊勋章。

本书不啻叙述了传奇式统帅的生活道路和战斗功勋，而且还十分动人地展示了参加对那些具有战斗荣誉的地方进行考察的成员们的游记，展示了那些在暴风雨的年代首先应召为苏维埃政权、为加强国防实力而斗争的战士的后代们的游记。同时本书还给读者介绍了我国人民由于伟大的革命胜利而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В.В.БЛЮХЕР**  
**ПО ВОЕННЫМ ДОРОГАМ**  
**ОТЦА**

**СРЕДНЕ-УРАЛЬ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4**

根据苏联中乌拉尔书籍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黄埔军校首席顾问  
**布 柳 赫 尔 元 帅**

〔苏〕瓦·瓦·布柳赫尔著

高 瓦 译

袁 坚 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1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21-140-1/K·06

定价：2.95元

# 目 录

原出版者的话.....	1
自那遥远的童年.....	1
三个来自老营地的人.....	6
车里雅宾斯克革委会主席.....	21
在哥萨克草原上.....	31
在卡希林的家乡.....	44
越过乌拉尔山.....	58
同红军老部队在一起.....	76
第51师经受战斗洗礼.....	98
神奇的卡霍夫卡.....	116
不朽的彼列科普.....	130
《在太平洋沿岸.....》.....	146
应孙中山之邀.....	179
在祖国远东大地上.....	201
祖国将永远怀念.....	207



## 自那遥远的童年……

那年夏季我几乎没有见过父亲，一次也没有跟他一道下过乌苏里江。往年的假期则截然不同，不管他公务多忙，总要象下达命令一样喊我们：

“孩子们，快准备好！”旋即跑进书房，不一会儿，当他再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已经不是一身军装，而是穿上一件领子上带绣花的“便服”衬衫了。

于是，我们抓起毛巾，顺着陡峭的台阶一直奔向江边。在尽兴地游完水之后，我们回到沙滩上，回到父亲身边。他憩息的时候从不仰脸躺着，因为他背上的伤疤太多了，那还是1915年德国战争时在捷尔诺波尔烙下的。

父亲告诉我们，“为治这些伤，医生们可真费了大神呢。也不知道从我身上取出了多少弹头和弹片。前后两次把我从手术台上直接送进太平间……可我还是从那里爬了出来。真的，他们把我从军队里除名了。那时候我幻想当一名大学生，但没有成。革命要我去当了她的卫士……”

当我上学以后，我的姓常使我的许多同班同学感到奇怪。他们都说这是个德国人的姓。我都有点抱怨他们了，可父亲只是莞尔一笑：“瞎说，你要牢牢记住，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

有一次，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爷爷从偏僻的小村巴尔欣卡（这村子好象是在雷宾斯克附近的什么地方）来我们家作客。爷爷讲了我们家是怎样改姓布柳赫尔的一段故事。那

起因似乎要追溯到我曾祖父时代。很久很久以前，还在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时代，老人家曾服过役，还出过征。归来时成了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那年月在我们村里象这样的英雄人物还从来没有出过一个。于是乡亲们因他跟法国人作战英勇剽悍而赐了他一个布柳赫尔<sup>①</sup>的雅号。

爷爷最后说，“后来，我们大伙儿，他老人家的孩子们、孙子们就都叫上布柳赫尔了。哈，就连村里的文书官也都忘了我们原先姓什么了。瓦谢克<sup>②</sup>，这就是那段历史了……”

父亲在自己参加的第一次大战时也得过乔治十字勋章和奖章。后来，当他为苏维埃政权作战时，他荣获了特殊的奖赏，那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所给予的奖赏。

说到父亲的战斗勋章……到1938年夏天，他一共获得2枚列宁勋章，5枚红旗勋章和第1号红星勋章。他是第一批获得苏联元帅<sup>③</sup>军衔的统帅之一。

奥伦堡和托博尔斯克，卡霍夫卡和彼列科普，沃洛恰耶夫卡和中东铁路，这些词汇在我们家里是无比神圣的。我们几个孩子从这些词汇中想象到的不是平静而安宁的处所，而是父亲驰骋整个俄罗斯大地的那一场又一场战斗。

父亲视之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第1号红星勋章。

---

① 本应译为布吕歇尔（普鲁士元帅，1815年任普鲁士萨克森军队总司令，在滑铁卢交战中获胜），因考虑到布柳赫尔已为约定俗成的译名，故未改译。——译者注

② 本书作者瓦西里的爱称。——译者注

③ 1935年11月20日，第一批被授予苏联元帅衔的共5人，除布柳赫尔外，尚有：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译者注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是对整个红色乌拉尔的奖赏。我不过是有幸佩戴这枚勋章罢了。”

在1938年8月的日子里，远东的孩子们已经不再做沃洛恰耶夫卡人的游戏了。哈桑湖的英雄，那些以强有力的突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苏维埃领土，把红旗重新插上扎奥泽尔纳亚高地<sup>①</sup>和无名高地的指挥员和红军战士成了他们崇拜的新的偶像。

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这时已改编成了远东红旗方面军。父亲被任命担任方面军司令员。

日本政府阴谋未能得逞，转而请求媾和，于是1938年8月11日前线停止了战斗行动。

9月，我最后一次同父亲见面。这已是在莫斯科了。他把双手放在我肩头，把我拉近他胸前，然后把一只野战皮包递给我，他说：

“瓦谢克，保存好！”

从此以后，我只有在梦中常常跟父亲一起向乌苏里江边奔去。只是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以后，我才又重新见到了他和妈妈（我在失去爸爸以后不久又失去了妈妈）。不过，遗憾的是，我只能在照片上见到他们。那时，卓娅·谢尔盖耶夫娜·杜巴索娃正在到处找我。她是我妈妈的朋友，家里大家都管她叫“卓莎”。她还给了我一张二十年代的照片，一张“中国将军加伦”同他那谁也替代不了的女翻译在一起摄下的照片。那是二十年代的照片。当时中国正在内战。父亲正担任着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总军事顾问。

---

① 即张鼓峰。——译者注

他为创建和加强中国国民革命军出了很多力。我妈妈，加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科利丘金娜-布柳赫尔是苏联电报局派到那个国家去的，她在中国同志中间也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父母亲回到苏联。我就在那时出世。我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总共不过10年光景，同双亲一起生活。我难得见到穿着斜扣高领衬衣的父亲，这是他喜欢穿的衣服；就是妈妈，我也几乎记不起她穿便服时候的样子了，因为她总是穿着军大衣，一身军装……

那只指挥员用的公文皮包我一直带在身边，当我在别德诺杰米扬斯克七年制学校念书时（学校坐落在奔萨附近），我用它来装课本和练习簿，我把父母亲的好朋友寄给我的信都保存在图囊里。我写好了申请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志愿书后也放在图囊里，1944年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从那里取出这份志愿书交给了组织。

后来我到首都的有色金属技术学校学习。从那里毕业后被分配到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列夫达的一家炼铜厂去工作。我问道：“那地方在哪儿呀？”“乌拉尔。”我听到了这样的答复。这时我重又想起了父亲。于是我表示：“我去那儿，到乌拉尔去……”

我到了中乌拉尔炼铜工厂。选矿厂厂长瓦连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波洛诺夫接待了我。他把我的介绍信捉摸了半天，说道：

“呀，你就是当年在我们这里战斗过的那位布柳赫尔的儿子？那末看来你是想马上成为一名机械师了？”

“是这么任命的。”

“能不能最好还是象你父亲那样从基层干起？我想让你到检修车间去，从班组长干起……”

我在列夫达干了好几年活儿。从班组长到工长，后来当了选矿厂的技师，再后来提升为中乌拉尔炼铜厂机修车间的技术主任。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但我周围总有许多善以好言鼓励我，又使我避免做出错事来的好心人。他们帮助我经受劳动的锻炼，教我学习技艺，教我热爱普通工人，这一切我是永志不忘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被任命担任乌恰林矿山选矿联合企业的总机械师，从列夫达搬到了巴什基尔。那时我已经成了家，和矿井养马场主任哈菲兹·加利阿萨罗维奇·加利阿萨罗夫同住一所房子。当我和他处熟之后了解到，国内战争时期他是红色游击队员，在我父亲的混成支队里当过骑兵侦察队的队长。

哈菲兹·加利阿萨罗维奇给我讲了关于数以万计的英雄在敌人后方的那次奔袭、关于乌拉尔“铁流”的许多传奇故事…… 1956年，就是他交给我一封信，那是一封从莫斯科寄来的、由苏联元帅伊·斯·科涅夫签署的特别珍贵的信。它通知说，对我的双亲：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和加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科利丘金娜·布柳赫尔的一切责难应当全部推倒，因为那都是虚构的。

## 三个来自老营地的人

我的大半生时间是在乌拉尔度过的。在那里我有幸会见过许多亲人、许多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同志，他们都非常熟悉我的父亲，不少人是在他的领导下在赤卫队和红色游击队里开始自己的战斗历程的。而1977年，我自己也沿着这些路程走了一遍，那些地方曾经造就出赢得了巨大荣誉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批英雄人物。

伟大的十月革命60周年临近了。为了纪念这一光辉的日子，共青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员会组织了一次访问乌拉尔红色游击队战斗故址的科学宣传考察。参加这次考察的是以“探索”命名的一支大学生小分队的成员，由历史科学副博士М·П·扎哈罗夫率领。考察队的学术领导人是历史科学博士伊·费·普洛特尼科夫教授，我被派去担任这次考察的政治委员，军事顾问则由И·Г·阿列克谢耶夫中校担任，他早在1957年就曾随当时由苏共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员会和乌拉尔军区政治部倡议组成的军事历史考察组沿着同一条路线进行过一次旅行考察。

一个七月的早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的主楼前召集了欢送大会。欢送的人群祝愿我们收集到更多的新的历史资料，希望我们尽可能多会见曾经参加过乌拉尔“铁流”的尚健在的老同志；“探索”小分队的大学生们演奏了以英雄的爱国主义为内容的优秀音乐节目，答谢车里雅宾斯

克州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民众。

我们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前在过去的奥罗瓦伊斯基团军营古老的建筑物前作了短暂的伫留。建筑物上钉有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1918年3月曾在这里组建成第一个乌拉尔红军团——第1乌拉尔步兵团。它参加了瓦·康·布柳赫尔领导的游击队的远征，并曾在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名的步兵第30伊尔库茨克红旗师建制内转战各地。”

纪念牌是在苏维埃武装力量诞生50周年前夕，1968年揭幕的。揭开幔子的荣誉授与了第30师第1乌拉尔步兵团当年的3名指挥员：瓦·阿·祖博夫、瓦·伊·赫列布京和雅·米·克里沃谢科夫。

在那遥远的1918年5月，他们都不过22—24岁年纪。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祖博夫是营长，瓦列里安·伊万诺维奇·赫列布京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谢科夫各指挥着工农红军第1乌拉尔团的一个连。他们从营地出发，突向叶卡捷琳堡车站，以便在车里雅宾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的统一领导下急速前去救援被杜托夫分子围困着的奥伦堡市的苏维埃守备部队。

这些人对我说来是倍感亲切的。我熟悉他们中间的每一位。1957年，当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谢科夫到他青年时期战斗过的地方去旧地重访时，曾喊我跟他们这些老同志一起走一趟。但我未能如愿，因为那年夏天我要参加考试，这是我在战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开办的高级工程班第一学年的考试。我认为，这次考试如能顺利通过，那就是我赠送给只在教会小学念过两年书，后来一直坚持自学的父亲的最好的礼物。父亲一直没有机会到大学或者学院去

学习过。

195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开展了从白匪手中解放4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乌拉尔公社社员广场上举行了方尖碑的揭幕仪式，广场上点燃起了火焰，祝福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志士永垂千古。庆祝活动之后，原第1乌拉尔步兵团的指挥员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造访他们的老营地。

这次访问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谢科夫开始讲述道：

“我是1916年第一次来这儿，到奥罗瓦伊斯基后备团营地来的。那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那你就听我给你讲吧……有一次，副排长克罗欣军官晚点名。点完名后我们大家做祈祷，那祷文的最后一句话是：‘愿魔鬼别再缠住我们’。我们都等着‘解散！’的口令。可上帝却没有阻止魔鬼来缠我们。看样子值日员没有给克罗欣端上装好开水的茶壶，所以克罗欣下了令：‘沙林，拿上曼陀铃，到台子顶上去，跑步走！其余的人，向左转！’大家转过身子。‘把手举起来！’大家把手举了起来。‘全都给我蹲下！’大家都蹲了下来。‘沙林，奏华尔兹！’响起了华尔兹的调子。

‘齐步走！’全排就这样举着手，蹲着腿，围着台子跳步，转了一圈，又一圈……可华尔兹不停地在响着。克罗欣就这么让我们象鸭子似地跳着转着，直到至少有3个人晕倒在地才罢休……”

雅·米·克里沃谢科夫最后说道，“你们看，这就是那时候的军营生活。”

“我到这营地来时可是另外一副样子了”，瘦削的，但



神态端庄，脸上布满深深皱纹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祖博夫说道，“那是1918年2月，我到了叶卡捷琳堡。我是到过前线的，在德国战场上当过连长。那时候我就下了决心：要为劳动人民效劳。我在军营的墙上看到用很大的字写着：‘叶卡捷琳堡市红军’，就去登记当志愿军。起初成立了由3个战斗队组成的一支部队，每个战斗队又分成8个百人队。后来百人队改称连，战斗队改称营。整个部队命名为工农红军第1乌拉尔步兵团。就在这个团里，我碰到了比利姆拜老乡雅科夫·克里沃谢科夫，后来又交上了瓦列里安这位朋友”，祖博夫朝拄着拐杖的赫列布京点了点头。“他跟我一样，以前也打过仗，然后再到奥罗瓦伊斯基这儿来的……”

瓦列里安·伊万诺维奇·赫列布京接着他的话茬说道：“我们部队，就是那个工农红军第1乌拉尔步兵团是由志愿者组成的。许多过去的后备团士兵都跑来了，也有附近几家工厂，象上伊谢茨科耶、下塔吉尔、勒热夫、比利姆拜等工厂的工人。我们请旧军队的军官担任指挥职务，跟他们订了专门的契约。比如我就签过为期6个月的合同，可到头来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从头到尾我都泡在战场上了……”

“我们团可以说是叶卡捷琳堡党组织的爱子，”祖博夫强调说，“在组建时州里的军事委员菲利普·伊萨耶维奇·戈洛谢金和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阿努钦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这里听过乌拉尔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马雷舍夫、列昂尼德·伊萨科维奇·瓦伊涅尔的报告。你父亲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也常常到我们营地来”。

克里沃谢科夫最后说，“在他率领下，我们走出这座营地去进行第一次征战。你们知道，那就是去奥伦堡打杜托夫分子。我们深信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结果使人出乎意料……”

在此前不久，乌拉尔的劳动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了苏维埃时代的第一个五月节。就在举行这一庆祝活动的时刻，去歼击杜托夫哥萨克白匪的英雄们返回了故里。

叶卡捷琳堡的主要大街上热闹非常。乐队在奏乐，工农红军第1乌拉尔团的连队在检阅。的确，这支部队是叶卡捷琳堡常委会和市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骄傲。他们精心培育它，扶植它，关怀它，希望新的工农红军的这个“长子”能成为乌拉尔所有正在组建之中的红军部队的模范。

跟在第1乌拉尔步兵团后面行进的是在乌拉尔南方击溃了杜托夫分子的赤卫队的战斗队员。春天的阳光和草原上吹来的风使他们的皮肤变得粗糙，脸上蒙上一层黝黑。队列中不时地闪现出伤员们头上的白色绷带。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是很不愿意离开同志们的战斗队伍的。

居民们兴高采烈地向从前线凯旋归来的英雄老乡祝贺致意。许多人都在思索，“这会儿行了，可以开始甩开膀子好好建设新生活了……”

那时候父亲正在叶卡捷琳堡，他听到了大街上节日的喧嚣。4月28日，五一节的前夕，他应召离开特罗伊茨克去向乌拉尔省委汇报剿灭杜托夫分子的战斗总结。当然，他很想和战友们一起在五月的清晨漫步在他们亲爱的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但是……他还没有迈步，甚至还没有跨出一步，医生就来命令他躺下。还在途中就发现他那并未治愈的伤口又恶化

了。于是从火车上直接把他送进了医院。他在那里住到1918年的5月10日。

父亲能下床后就去跟大夫们告辞。

“感谢你们使我恢复了健康，请你们别再留我了。我已经康复得这样……”

就在这一天，省的军事委员Ф·И·戈洛谢京会见了。对于已成过去的战斗的细节他们并没有去考究。乌拉尔南部的局势又变得严重起来，哥萨克白匪经常不断地在攻击苏维埃。他们已经占领了新谢尔格彼夫车站，尔后又包围了奥伦堡。

戈洛谢京说道：“应当去营救同志们。我知道您还没有复原，可是……”

“谁跟我一起去？”

省委军事委员答道：“我们准备派去的有：叶利京指挥的人民煤矿车里雅宾斯克矿工支队，叶卡捷琳堡骑兵连，车里雅宾斯克炮兵连……还有刚刚在叶卡捷琳堡组建起来的红军第1乌拉尔团，这个团是由工人志愿者和旧军队的军官组成的。”①

这些话我是从父亲1935年11月22日会见正在撰写步兵第30师历史的作家们的谈话简要记录中摘取的。起先，这份记录稿发表在《南乌拉尔》这部回忆录文集中，文集总的题目是《南乌拉尔工人、农民和哥萨克的革命队伍在为苏维埃祖国的战斗中》。出版说明写了这样一段话：“这里发表的瓦·康·布柳赫尔谈话的记录稿一直保存在维·谢·罗西亚耶

① 见《在南乌拉尔（国内战争参加者回忆录）》，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8年，第75页。

夫的手里。1936年，瓦·康·布柳赫尔将它寄给罗西亚耶夫，请他作某些修改以及对个别地方（如日期、数字）作些诠释。瓦·康·布柳赫尔在谈话中曾多次提到过维·谢·罗西亚耶夫，因为他是布柳赫尔奔袭的直接参加者之一，对于这次历史性事件的全部细节了如指掌。”<sup>①</sup>

后来又出现了这篇记录稿的另外几个文本，但都是在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罗西亚耶夫去世以后才问世的，当然都是未经他校定的。照我看来，这些文本中的资料不一定全都那么可信，因此我援引的记录稿所依据的还是第一份罗西亚耶夫的文本。

父亲在1935年曾证实过，“5月12日，我们把第1乌拉尔团、叶卡捷琳堡骑兵连装上了列车，向车里雅宾斯克开进，其余的部队后来在那里也跟我们会合了”。<sup>②</sup>

从车里雅宾斯克转道向西。那时候经特罗伊茨克——奥尔斯克抵奥伦堡还没有直通的铁路。我们在基涅利河边折向南去，在布祖鲁克附近就进入了战线地带。杜托夫已经把那一带的铁路破坏了。

司令员深知，他这支队伍里多数人是没有经过战斗的青年工人，于是下令在各个连举行飞行集会，让那些老兵在会上讲他们的亲身经历。

到第二天把武器发下来了。一大清早，队伍停留在布祖鲁克城外的会让站上，在一段被损坏了的铁路附近，战士们从车厢里跳下来，去扳直弯成了弧形的铁轨。突然间响起了

---

① 《在南乌拉尔》，第69页。

② 同上，第76页。

机枪声，紧接着步枪也打响了。

大家躺倒在地。谁在打枪，从哪儿打过来的，看不清楚。父亲听到枪声后，立即向战士们奔去。这时另一个人以沉着坚定的声音适时地下达了口令：

“起来！跟我冲！向前冲呀！”

第一个向躲在灌木丛中的哥萨克冲过去，并一边冲一边射击的是第1个乌拉尔团的一位营长。

“真棒，帕夫利谢夫！”父亲称赞道。

从那时起，经常发生这类接触，几乎每走10俄里<sup>①</sup>就会发生一次。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战术：军运梯队战争战术。每与敌人遭遇一次，红色乌拉尔战士就能更加清楚地摸到这种战术的“奥秘”，从而加快向南推进的速度……

经过短暂的，但相当残酷的战斗，我方占领了新谢尔吉耶夫车站。从列车上发起的几次协调得很好的冲击把哥萨克白匪从临近的其他两个小镇的会让站上撵走了。自出征算起，经过了10天，我们和被围困的奥伦堡守备部队在瑟尔特车站上会合了。

奥伦堡市内很快传开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分子煽起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作乱的消息，但这则消息时隐时现，所以许多人并不认真把它当成一回事。他们认为，原先那些俘虏们的作乱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现象，会很快而且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的。

父亲对这些事件所持态度则不同。6月18日，他打电话给当时正在乌法的军事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他认为“派出一部分乌拉尔部队去支援特罗伊茨克和车里雅宾斯

① 1 俄里=1.067公里。——译者注

克，并以此缓解叶卡捷琳堡本身的局势，乃是他们对祖国、对革命理应承担的道义责任”<sup>①</sup>。

人民委员同意这一主张，并建议动员奥伦堡集群的苏维埃部队，他从自己的队伍中抽出一部分兵力去迎战作乱分子。捷克白匪在我方齐心协力冲击下被赶出了布祖鲁克。

胜利也只是到此为止了。我方总共只有800名步骑兵。敌人以5倍于我的庞大兵力实施了反冲击，并占了上风。布祖鲁克不得不放弃。同时在整个地区杜托夫分子全面地活跃了起来。白卫军的进击日盛一日。奥伦堡也将遭到布祖鲁克的命运，这已经显而易见。

父亲回到奥伦堡之后，要求立即召集各支队的司令员来开会。1918年6月28日晨，大家会聚在奥伦堡集群总司令Г·В·季诺维也夫的车厢里。在讨论各种撤退方案时，总司令的意见是让部队和各战斗队顺着未被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向塔什干方向撤退。父亲称这条路线为可能最少遇到拦阻的线路，但他表示应当到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去，到那里去援助红军同捷克白匪进行斗争。

可是有谁斗胆敢劝说乌拉尔人的指挥员去赞成冒这么大的风险的企图呀！就连奥伦堡省的特别政治委员彼·阿·科博泽夫也以责备的口吻问道：

“你要上哪儿去？要到四处都是哥萨克骚乱的地方去？……”<sup>②</sup>

<sup>①</sup>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0，类号1，案卷号241，页次62。

<sup>②</sup> 见《在南乌拉尔》，第82—83页。

父亲的观点得到尼古拉·卡希林和米哈伊尔·卡尔梅科夫的支持，但大多数指挥员主张走土耳其斯坦的方案。

卡尔梅科夫对这个决定当场表示抗议。在这以前有人从乌法神奇般地给他往奥伦堡发来一份电报，说是捷克白军已经从东、西两个方向威胁着乌法了。革命委员会命令乌法战斗队的指挥员火速赶回本城。

6月29日破晓时分，卡尔梅科夫带领部队离开了奥伦堡。父亲在为他送行时，说道：

“别激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是不孤立的，我们也不会离开乌拉尔。我们要保证这次撤退成功，而且也是要向北边去的。”

在奥伦堡，布柳赫尔还会见了上乌拉尔斯克红色哥萨克战斗队的队长尼古拉·卡希林。他在司令员会议上也曾热烈地反复论证过必须向北、向车里雅宾斯克去的理由。那时候，他们几个人虽然是绝对少数，但他们并没有改变要走敌人后方去迎接红军部队的决心。他们的战斗队又在城外前沿阵地上停留了8天。敌人在进逼，在疯狂地冲击过来，但他们还是顶住了，保证了苏维埃机关和部队全部从奥伦堡向南方的安全撤离。

一直到1918年的7月1日，布柳赫尔和尼古拉·卡希林的战斗队才离开奥伦堡，取了朝东北去的路线。父亲率领突围出去的有900多步兵，1个骑兵连和1个装备4门火炮的炮兵连。跟卡希林在一起的有317名哥萨克骑兵和195名特种步兵。

在行军中乌拉尔斯克支队的部队是主力。卡希林的队伍担任战斗警戒勤务。哥萨克白军在周围搜索。我们决定避免同他们发生直接对抗。只是从远处搞一点步枪和机枪的射击

惊吓他们。队伍在行进中没有伤亡。相反，几乎不断地在壮大。

侦察员们除了完成自己的基本职责以外，还出色地担起了宣传员的责任。他们执行任务返回时，几乎总是带回来一批又一批新的志愿人员。常常有大批武装工人和农民跑到队伍上来。其中最大的一批要数由西涅利尼科夫和韦尔济洛夫率领的砂矿工人战斗队和米哈伊洛夫的哥萨克骑兵百人队。

大家对于新来的人员热情欢迎。对新同志的每一次欢迎都使同志们精神振奋，增强了大家对事业之最终胜利的信心。行军还是十分谨慎的，一定要摸清最可靠的路线，根据最细微的征兆去探听前方村镇和城市里的一切消息。

在阿克梅切季城外得到一个坏消息：苏维埃部队已经撤出了上乌拉尔斯克……于是不得不改变方向，到别洛列茨基扎沃德去。

“事态的发展跟我们原来所想象的全然不同。从1918年7月至9月，乌拉尔州委就没有得到过我们的任何消息”，许多年以后，雅·米·克里沃谢科夫回忆道，“而我们团最后抵达叶卡捷琳堡已经是1年多以后的事了。记得已是1919年7月底了，那时我们已经把高尔察克分子彻底打垮了”。

我一边听着老同志们故事，注视着第1乌拉尔团的战斗途程，一边不由自主地设想起：讲故事的这些人彼时彼地会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你们看，他们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桌子上放着几张相片。有一张照的是一个年青人，瘦瘦的个子，圆鼓鼓的嘴唇，细细的脖子伸在军上衣宽宽的领口



里。

赫列布京解释说：“第1乌拉尔团瓦西里·列克谢耶维奇·祖博夫。是他。那时他还不到25岁，可已经把一  
个团抓起来了。他指挥我们在维亚茨克野外和彼尔姆的森林  
里作战。”

“那您，瓦列里安·伊万诺维奇，您呢？”

“难道您没有认出来吗？”这会儿可轮到祖博夫来解释  
了。“您看，多神气呀：上下都是英国式的制服，皮绑腿，  
那皮带扎得……可总归还是一脸的孩子气。他，瓦列里安不  
过比我小两岁。在解放叶卡捷琳堡之前不久，我在一次进攻  
中把这个团交给他了。这相片就是他在这座城里照下的，就  
是我们现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这第三位英雄看来就不难辨认出来了。雅科夫·米哈伊  
洛维奇这么早就蓄上了小胡子。在托博尔，赫列布京患上了  
伤寒症，于是克里沃谢科夫挑起了第1乌拉尔团这副担子。他  
领着这个团走得很远，向东一直到了伊尔库茨克，后来又和  
战士们一起在南方厮杀。在那里第1乌拉尔团的战士们以强  
攻抢占了锡瓦什湖上的铁路桥，突入辽阔的克里木草原。国内  
战争结束后，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有机会撰写这个团的战  
史。他是这样起笔的：

“第30师第1乌拉尔步兵团是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中坚定  
地保卫苏维埃政权，奋不顾身地为之厮杀的战斗力量最强的部  
队之一。这个团的历史上从未有过顶不住敌人的攻击从战  
场上败下阵来的情况。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相反，  
他在防御战中常常能把冲锋过来的敌人逼得撒腿逃跑；一旦  
发起进攻，那就得追击到不达上级首长规定的目标决不撒手

的地步。”<sup>①</sup>

这就是在那遥远的1918年5月的日子里来自老营地的3位年青的红军指挥员的战斗简历。

1919年7月，叶卡捷琳堡解放之后，他们和工农红军第1乌拉尔团（那时已改为第30师步兵第268团）的老同志们一起住在他们原来那温暖的军营里，住在他们曾作为第一批乌拉尔人进行参军宣誓，宣誓要永远忠于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国家的地方。

1924年，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从工农红军退入后备役后回到乌拉尔，回到比利姆拜扎沃德故乡的一个小城。直到现今仍然住在那里。我最近一次去他家作客是1979年的夏季，他们住在基洛夫街。那时他身体还很健壮，还自己提水，自己劈柴。跟我一起去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摄下了他的几个镜头。他们当时准备把这些镜头作为乌拉尔从高尔察克手中获得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播发的。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祖博夫三十年代曾在乌拉尔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工作，战后也定居在比利姆拜，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的余生。

瓦列里安·伊万诺维奇·赫列布京则经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许多考验。1943年他被任命担任步兵第30师化学兵主任，这是他的老部队，过去曾荣获过显赫的称号，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名的三次列宁勋章获得者伊尔库茨克红旗师，后来又增添了近卫师的称号。这个荣誉之获得是因为全

---

① 作者档案。

师人员在防守高加索山脉各山口时表现出了英雄主义。后来近卫师列入了担任强攻夺取新罗西斯克城的军队集群编制。这位第1乌拉尔团的老团长，在这火一样的时刻再也无法稳坐在司令部里了，他向近卫师师长B·H·阿尔申采夫少将提出允许他在这次进攻中回到他原来的岗位上去，去指挥一个步兵团的申请。近卫军中校瓦·伊·赫列布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正如上文所已述及的，正是这3位有功之臣理应在苏维埃武装力量诞辰50周年前夕享有揭开老营地建筑物上这块大理石纪念牌慢子的权利。在庆祝典礼之后，老同志们接受邀请参观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守备区某部的营区。年青的乌拉尔军人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祝贺部队不久以前又受到政府颁发的崇高奖赏。1967年11月，为表彰积极投身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祖博夫被授与列宁勋章，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谢科夫和瓦列里安·伊万诺维奇·赫列布京则被授与红旗勋章。

现在，我再来记述一次在这支部队进行的会见。操场中央穿着远不十分合身的军大衣的年青士兵们排成横队。队伍寂静无声。他们都是昨天才由飞辛菲罗波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航线的喷气式班机送到乌拉尔大地上来的。

从克里木州接兵已成了这里的传统。因为这支部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也和工农红军第1乌拉尔团在国内战争中一样参加了解放克里木的战斗，所以知恩必报的塔夫里亚劳动人民一直骄傲地把自己最优秀的子弟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但愿他们能在乌拉尔庄严地履行他们的爱国主义职责。

于是，他们会见了：一边是在同苏维埃祖国的敌人最初的战斗中保卫过伟大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老同志，一边是他们的孙儿辈，刚刚开始履行军队义务的年青人。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祖博夫向年青人讲了话。

是的，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英雄们的功绩是和建设共产主义的苏维埃人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一脉相承的，是与祖国武装保卫者的现实职责一脉相承的。

## 车里雅宾斯克革委会主席

在乌拉尔所有的道路中我走得最多的莫过于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车里雅宾斯克之间的一段公路。先前，在这200公里的路途中我几乎从未发现过什么新的美妙的东西，但当我年青人一起去了一趟“久远的故地”之后，我的视野开阔了，记忆也敏锐起来了，我胸中不由得滋生出了今昔对比的念头。

20年前，在我们边疆区的这两座最大的工业中心之间还没有直接的柏油马路沟通。1977年，南乌拉尔人铺设了一条宽宽的直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水泥路。他们采用最先进的流水作业法，使用最新的筑路技术装备进行工作。

再看车里雅宾斯克！早在20年前，它就以迅速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冶金城的一个个街区迎接过我们，使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震惊不已。但那时候，这些街区一般都离开公路有4至5公里远，现在则几乎直接相连起来了。而且可以预期，不用很久，公路就会变成市内的街道了。白色的高层建筑群形成了又一座漂亮的新城，这是车里雅宾斯克最年青的一个生活区：西北区。

在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厂附近，公路接上了一条宽阔的市内大街：斯维尔德洛夫大街。河滨一带已经变得使人无法辨认了。曾几何时那条狭而浅的米阿斯河竟成了全市真正的骄傲。过去毫无装点的河岸如今砌上了花岗石，变成了漂亮的河滨大道。在一座崭新的大桥桥头伸展开去一式大圆顶的一

个建筑群，那是乌拉尔最漂亮的贸易中心，河对岸则是美丽的体育馆。

只有那饱经沧桑的红色营地依然如本世纪初那样耸立在河滨，大概也还是父亲第一次来到车里雅宾斯克时所见到的那副模样。营地的建筑物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其中有一幢楼是很值得纪念的，正如镶嵌在那块纪念牌上的文字所告知人们的那样：“1917年11月20日，这里曾经是萨马拉、瑟兹兰和乌法革命工人和赤卫队员混成部队的营房。这支部队在创建车里雅宾斯克苏维埃政权时曾给予了援助。”

从萨马拉派来的战斗队的政治委员是省革委会的委员、1916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瓦·康·布柳赫尔。1935年，父亲在会见作家时曾详细地叙述过他是怎样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

“……有人把我喊到萨马拉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瓦·弗·古比雪夫的办公室去。瓦·弗·古比雪夫十分关注组织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创建工人队伍，以和反革命势力的骚乱进行斗争。所以，我认为，古比雪夫同志召见我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我那时是负责军事工作的革委会委员，但当瓦·弗·古比雪夫一开始谈话，我就懂得这一次把我请到革委会来可是非同寻常。

瓦·弗·古比雪夫以他那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专注而犀利地望着我，他说：“布柳赫尔同志，革委会决定派你去担任解放车里雅宾斯克武装部队的政治委员。我们刚刚接到列宁同志下达的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最后选中了你。这一次的任务是非常重大的……杜托夫占领了奥伦堡，切断了中亚和中央地区的联系，现下杜托夫的部队包围了车里雅宾斯克，

威胁着运送粮食的列车向西，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开进。中央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消除车里雅宾斯克这个漏洞。从彼得格勒和乌拉尔派出了部队。要我们从各革命团队和新组建的工人部队中至少抽出500人，还要带上火炮。你作为这支部队的政委应当保证这次非常重要的作战取得胜利。’

……当时我怎能想到党的这项委任竟会成为我的军事活动的起点，并将使我永远地和亲爱的红军连结在一起呢？”①

在乌法，萨马拉人又会聚了400名赤卫队员。到兹拉托乌斯特以前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但一跨入亚洲境界，各车站上就发现有哥萨克。政委的机敏拯救了部队。他预先命令在各车厢上挂出“退伍兵”的牌子，并告诉战斗队员们怎样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这出戏里列车长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萨德鲁茨基成了炮兵上尉，他那军官的肩章对于骑兵司务长和哥萨克少尉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口头解释管用得多。

在舍尔申车站骗过哥萨克后，“退伍兵”们获准继续前行，但有一个条件：他们要不停顿地直驶车里雅宾斯克。可是步兵的作用完全不同，所以列车就停在远处的一个死岔线上了。

车里雅宾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盛情地接待了萨马拉革委会的使者。他们为刚抵达的部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介绍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的情况，告诉大家苏维埃的活动遭到了破坏，重又恢复了杜马政权，不过也仅仅是一个空名罢了，因为赤卫队还揣着武器，更何况守备区大多数士兵还

---

① 《在南乌拉尔》，第70—71页。

是支持苏维埃的。

把战士们安顿好以后，萨德鲁茨基和布柳赫尔立即着手加强城市防卫的组织工作。在郊外部署了强有力的警卫岗哨，而在威胁最严重的特罗伊茨克方向炮兵连进入了发射阵地。

十一月的白昼是短促的，为了安排这一切事务用去了整整一天的辰光。傍晚6点，部队政治委员去人民之家<sup>①</sup>参加一个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工兵代表苏维埃、团和连的委员会、工会组织的中央局、区铁路委员会以及萨马拉革委会，乌法、兹拉托乌斯特、库尔干和特罗伊茨克各苏维埃的代表。

主席宣布了车里雅宾斯克市及其郊区的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的决定。

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市杜马被解散了。关于按照萨马拉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在车里雅宾斯克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得到了解决。A.П.加拉克季奥诺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E.П.瓦先科。父亲代表萨马拉-瑟兹兰-乌法混成部队参加了委员会。不久，A.П.加拉克季奥诺夫应召离开车里雅宾斯克去了萨马拉，革委会委员们决定请瓦·康·布柳赫尔肩负起革委会主席的职责。

我们停留的又一站在市中心，基洛夫街和卡尔·马克思街交汇处的另一幢古老的建筑物旁。它的正面是一幅镶有统帅画像的覆墙画，旁边钉着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

“1917—1918年，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

---

① 如今这座建筑物是车里雅宾斯克的青年剧场。



曾在这所房子里工作。他是国内战争的英雄，苏联统帅，苏联元帅。1918年南乌拉尔游击军总司令。全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人。在车里雅宾斯克曾担任过革委会主席和车里雅宾斯克地区武装力量参谋长。

英雄将永垂千古！”

还在这次旅行之前，当许多当年为建立和巩固车里雅宾斯克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地奋斗过的老同志还健在的时候，我就收集了不少有关在以瓦·康·布柳赫尔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初期如何开展活动的极有意义的资料。

我觉得，弗·康·萨德鲁茨基的弟弟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和1917年5月入党的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卢贝赫所讲的关于那火热的艰难时期的故事最有价值。我力求在他们的帮助下去描绘能够揭示父亲在车里雅宾斯克革委会主席岗位上的工作特点的某些细节。

当萨马拉的赤卫队员抵达车里雅宾斯克的时候，哥萨克入侵的威胁也就随之消失了，而当大批工人战斗队从叶卡捷琳堡和彼尔姆开进时，反革命分子急匆匆撤掉重围，向南，朝特罗伊茨克逃遁去了。这时候是很容易产生温情软弱、草率马虎等弊病的，但革委会保持了高度警惕。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命令中就有关于“为防止发生反革命骚乱”而建立统率全城一切武装力量的司令部的一道命令。弗·康·萨德鲁茨基担任总司令，布柳赫尔当了革委会主席兼车里雅宾斯克地区武装力量的参谋长<sup>①</sup>。这是对从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沿岸许多地方汇集在城里的各支赤卫队和工人战斗队实施统一

<sup>①</sup> 《为南乌拉尔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917—1918）》，文件和资料汇编，车里雅宾斯克，1957年，第214页。

而坚强领导的保证。

不能跟第109团和第163团两个后备团的团长同流合污，他们深受敌人宣传的影响，在哥萨克头领面前表现得卑躬屈膝，丑态百出。

革委会主席坚决起用忠于革命事业的人去替代那两个团的团长。他常常深入到士兵中去，去了解布尔什维克军人中谁在他们眼里最有威望。等他发现了称职的对象后，即去求得市党委会的支持，只有在这以后他才到总司令跟前去提议撤换团长的问题。

当萨德鲁茨基得知准备担任团长职务的候选人员名单后立即表示抗议，他说：

“你这是要砍掉团队的根基呀。看你尽提拔一些什么人吧！尽是些大兵、准尉！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这就是事情的主要方面！”参谋长答道。“我对您寄予很大期望。我相信您会在工作中很快地帮助他们每个人成长起来的。要不今天您就找几个同志来谈谈。”

下面就举直接参与过这个事件的人，原准尉米·德·戈卢贝赫的话作例。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士兵布尔什维克尼古拉·伊万诺夫被叫到萨德鲁茨基那里去。我们去了，作了报告辞……萨德鲁茨基个子挺高，穿着料子很考究的弗伦奇式军上衣<sup>①</sup>。一双明亮的坦 诚

---

<sup>①</sup> 一种有4个贴兜、带扣带的军上衣，以英国元帅弗伦奇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的眼睛。

‘是我喊你们来的，不过要跟你们谈话的是布柳赫尔’。

‘你们好，同志们，请坐吧。’那一位邀着我们，一边从放在另一端的写字台后面站起身来朝我们走来。

我细细地打量着布柳赫尔。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二十七岁的美男子。轮廓清晰，线条分明。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口音听起来很动人，嘹亮而纯正。

‘您担任什么职务？’他问我。

‘补充连连长。’

‘打过仗吗？’

‘没有。没有上过战场。’

布柳赫尔请我们抽烟。他自己抽得很凶。

‘你们163团团长怎么样？’

‘一个懒汉。酒鬼。要说信念，谈不上，是一个四方讨好、八面玲珑的人物。’

‘那169团团长呢？他是不是强一些？’

‘您怎么啦！一个十足的保皇党。’

‘原来这样，那要是我们选中你去代替他的位子呢？’

布柳赫尔脸上露出一丝探询般的微笑。

‘我坚决反对，’伊万诺夫大声说道，好象根本不让我开口似的，‘我们要推举戈卢贝赫准尉担任我们163团的团长。’

‘等一等。’布柳赫尔停顿一下，‘关于这个团的团长问题我们来专门商量商量。’

‘对不起，’我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词，吞吐着说道，

‘我太年轻，才22岁就……’

布柳赫尔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我的问题，转过身去对尼古拉说。

‘是这样的，伊万诺夫同志，市党委决定推荐你来担任163团团长的职务。我要服从市委的决定，你也一样。好，我们最后还要听听士兵们的意见呢……’

这会儿，我的朋友也不再作声了。

几天过去了……守备部队的两个团都进行了选举。党委的建议得到了赞同。尼古拉·伊万诺夫当选为第163团团长，我则当上了第109团的头头儿。”<sup>①</sup>

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样大胆而迅速地摧毁了旧的机构，把私人银行、工业企业国有化了，从而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各重要部门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秩序铺平了道路。

粮食战线上的情况要求调动一切力量紧张地展开工作。革委会毫不迟误地核算了全部的粮食储备，决定向商人、买卖人和富农有计划地征收粮食。小麦终于从乌拉尔以东运到中央地区正在遭受饥荒的各省去了。忽然新的灾难又降临了。一批奸商和背袋贩子涌进了南乌拉尔草原。他们带来的是一片混乱，严重地破坏了运粮工作的正常进行。铁路上也是忽此忽彼地出现各种漏洞，要想堵塞这些纰漏往往只有靠动武力才能办到。

不过，每过一天，革命的成就总是更加巩固一天。在特罗伊茨克和奥伦堡战胜杜托夫分子以后，已经没有必要再把邻近各市的赤卫队留在车里雅宾斯克了。各战斗队开始返回

---

① 《乌拉尔》杂志，1977年第2期，第158—159页。

各自的家乡去了。萨马拉人也被召回伏尔加河沿岸。俄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把瓦·康·布柳赫尔留下来,从1918年3月8日起他当选为市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sup>①</sup>。

战斗间隙带来的宁静是短暂的。南方爆发新的反革命骚乱的条件已经酿成。3月下半月苏维埃部队向上乌拉尔斯克发起进攻,因为杜托夫分子和他的随从们自奥伦堡逃跑以后就一直盘踞在这里。

叛军头目丢失了第二座“京城”之后,向特罗伊茨克逃窜而去。他们包围了这座城市,因而又象去年秋天一样造成了对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和车里雅宾斯克的威胁。

父亲后来回忆道:“为了消灭这一地区的杜托夫叛军,中央有关部门指示乌拉尔州委军事委员从乌拉尔各工厂抽调一部分武装战斗队,把他们派到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去,从白卫分子手里将特罗伊茨克和上乌拉尔斯克各县和整个奥伦堡省解放出来。指挥作战的任务落到了我们的肩上。”<sup>②</sup>

为了叙述父亲在车里雅宾斯克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活动,我不得不再度就教于我长期以来的老朋友,老同志,原第109后备团的团长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卢贝赫。

“……生活本身、革命把他推了上去的高位要求这位未来的杰出统帅具有宽阔的军事视野。他勤奋学习。客观条件使他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学习,但他总还是能够挤出时间来。他阅读战争艺术史方面的各种书籍。锲而不舍地钻研旧军队的条令。他很自信,在研究过程中善于分辨哪些东西是全部

---

① 见《为南乌拉尔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第291页。

② 《在南乌拉尔》,第74—75页。

可以借用的，哪些是要做改造的，哪些则是要抛弃的。”①

关于这一点，弗·康·萨德鲁茨基的弟弟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也曾证实过。在他寄自车里雅宾斯克的信件中曾公正地指出，弗·康·萨德鲁茨基是一名很有素养的旧军队出身的军官，在获取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所必备的知识，掌握战术训练和战役法的原理方面，他给过瓦·康·布柳赫尔很多帮助；而布柳赫尔对于这位军事领导人也曾有过极好的影响。经常关心他，启迪他，使他心中作为苏维埃政权坚定支持者的素质得到发扬光大②。

当然，对于一切为“争取土地，争取自由，争取最好的命运”而斗争的战士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主要的老师和教育者。正如列宁所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使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有了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③。

如今，革命广场修葺一新，在光亮夺目的花岗岩观礼台上方矗立起了一尊庄重的伊里奇纪念碑。每当我来到车里雅宾斯克，经过这个广场，折进原先的乌法路（现在已经改名为布柳赫尔路）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我心中联翩地浮想起来。

---

① 《乌拉尔》杂志，1977年第2期，第160页。

② 后来，弗·康·萨德鲁茨基成为一名极其出色的红军指挥员，他作战英勇，加入了俄共（布）的队伍，国内战争之后仍然光荣地为武装保卫苏维埃祖国的事业服务，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他是工农红军总军械部的部长。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9卷，第69页。

## 在哥萨克草原上

从车里雅宾斯克到特罗伊茨克途中我读到一本以《游击之路》为题的文集。这本文集是1957年那次军事历史考察结束后由乌拉尔军区政治部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版的。我一边翻阅，一边越来越深信，参与这次考察的人不仅是战后第一批走过乌拉尔红色游击队员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而且还发现了鲜为读者所知的南乌拉尔游击队各支队在白卫军后方所进行的一次1500公里的征战中的300多位志士，拍摄下了他们的相片，描述了曾经作过游击队司令部的房子，发生交战的地点和穿越水障碍的渡口，绘制了这次奔袭的一幅总的示意图和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作战略图。

文集的开首是考察队队长、历史科学副博士B·Г·谢尔然托夫的长篇述评文章《乌拉尔游击队的英勇奔袭》。这部书的核心是有关这次传奇式征战的许多直接参加者的故事。他们是：上乌拉尔斯克骑兵团副团长费奥多尔·安德里安诺维奇·万德舍夫、工农红军第1乌拉尔步兵团连长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克里沃谢科夫、拜马克游击队参谋长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梅利尼科夫、特罗伊茨克炮兵连副连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皮沃瓦罗夫、上乌拉尔斯克工人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主席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波波夫、哥萨克梁赞百人队队长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塔拉先科夫和别洛列茨克青年骑兵队的英雄向导格里戈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什特里亚耶夫。他们都是考察队的军事顾问，这

次考察中作为乌拉尔混成游击队主力部队的代表，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阐释了苏维埃人在国内战争初期立下的这第一次群众性的军功。

《游击之路》文集当时还很年青的一些作者，如达维德·阿列克谢耶夫、弗拉基米尔·巴卡诺夫、瓦列京娜·列昂诺娃和尤里·尤林等都对这部集体著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撰写的特写补充了老同志们的回忆录，并再现了他们是怎样走过这段路程以及他们战斗的青年时代的这段路程中有哪些值得纪念的会见等一幅幅明朗的画卷的。

从这部书的资料中我了解到，1957年考察队的路线同我们这一次不同。他们访问了车里雅宾斯克州“维斯基”国营农场的几个村子。到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斯捷尔利塔马克等城市，这一带虽说并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游击战斗，但在伟大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当年乌拉尔“铁流”英雄中还有许多健在的老同志住在那里。在去特罗伊茨克途中，考察队的汽车还专门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皮沃瓦罗夫的家乡去拐了一趟。沙皇时代，那个村子叫尼古拉耶夫卡，但早在1918年初第一个自由政权苏维埃就把它改称为克拉斯诺耶村（红色村庄）了。

村民们盛情欢迎客人们的到来，当然他们注意的中心是他们的老乡，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格·伊·皮沃瓦罗夫。村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以历史征战为题的座谈会。老同志们回忆起当年他们怎样在村里建立起第一个革命委员会，组织起第一批红色义勇军战斗队，他们又是怎样帮助布柳赫尔的部队打击杜托夫分子，怎样在特罗伊茨克和其他值得纪念的地方战斗的种种情景。

有人拿来一些旧相片。相片上照的是一群威武的年青



小伙子，一个个神气十足地歪戴着毛皮高帽，穿着军大衣、短皮袄，有的就穿着老百姓的西装上衣。但每人手里都操着一支步枪，腰际挂着佩刀和手榴弹。

“这都是谁呀？”客人们问道。

“这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嘛。”

老人们都象年青人一样耸耸肩膀，摆出一副挺神气的样子。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皮沃瓦罗夫讲述道：“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哥萨克上校叫波尔科夫尼科夫的，在特罗伊茨克集中了好大一支队伍，还给我们送来一份最后通牒，说是‘我以杜托夫的名义要求撤销苏维埃……’”

那时候反革命派的实力很强，不过特罗伊茨克的红色义勇军也不是孤立无助的。1918年3月底，车里雅宾斯克赤卫队前来镇压杜托夫叛军。他们搭乘军用运输列车向特罗伊茨克运动。在克拉斯诺耶村附近不得不停止前进。前方的通路遭破坏了，这时机车上储备的水也已经用完了。

村里的革委会了解到赤卫队的困难后，把所有有力气的人都动员起来，去帮助修路和运水。小伙子们跟战士们一起抡起足有1普特<sup>①</sup>重的大锤在敲打铁轨，要把它敲直；老人和小孩则驾着雪橇从村里到会让站来回运送冻得死死的大水桶。

敌人的企图破产了。赤卫队员和农民同心协力地奋斗终于把道路修复了，机车也‘喝足’了水。军用运输列车重又向前开进了。尾随于他们之后，村里的民兵也排着队步行着向特罗伊茨克出发了。他们给予自己未来的总司令以有力的

<sup>①</sup>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16.38公斤。——译者注

支援，总司令后来好好地酬谢了他们付出的劳动：民兵当时武器奇缺，布柳赫尔下令发给他们150多支新式步枪。①

军用列车继续前进的一路上通过了好几个哥萨克的镇子。几乎在每一个镇子前铁路都给扒了，枕木也挖翻了，电线杆子放倒了。于是不得不以最严厉的方式警告各驿站长，要是破坏活动不中止，那我们就要不客气了，真的也就这么来了几下。结果还不等赤卫队员抵达，哥萨克镇子的居民就急急忙忙地把遭毁坏的铁路设施全都整修停当了。

到第4天上，前来跟杜托夫作战的各部队的司令员来到特罗伊茨克。

车里雅宾斯克接到报告：“凡铁路沿线的所有集镇已经全部投诚，都已执行我方的一切命令。原先偷走的铁轨、电报线都送回来了，把旧军官也都交了出来……”

截获到许多重要的文件，其中有指明何时应当占领特罗伊茨克、车里雅宾斯克以及到皮什基利的铁路线的行动计划。这还是杜托夫的首要任务呢。

在各村镇组织了数百个游击队。要是我们的队伍迟来2至3天，那就得参加与有组织的敌人展开的阵地战了……

特罗伊茨克的确遭到了有组织的强大攻击，但所有的冲击全都被炮火和机枪火力打退下去了。

叶卡捷琳堡支队在离特罗伊茨克12俄里的黑河上打了一仗，死伤43人。据悉，哥萨克伤亡超过400人。”②

---

① 见《游击之路》，第65—67页。

② 《为南乌拉尔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第243—244页。

在特罗伊茨克人中布柳赫尔有不少熟人。市里的许多党政工作人员，每到车里雅宾斯克来，都要几次三番地到革委会去找他。他在县委同党委书记Я·В·阿彼利巴乌姆一见面，就能听到有关列宁的使者：第17西伯利亚团的战士和他们的团长雅科夫·马尔科维奇·苏沃罗夫的许多好话。这个部队的战士在海军准尉帕夫洛夫的水兵开赴奥伦堡前线之后留在特罗伊茨克成为革命的主力，他们在保卫城市击退杜托夫的进犯中表现不凡。

司令员表扬了同志们坚定勇敢、团结战斗的精神，问他们在受蒙骗的哥萨克穷人中进行了哪些工作。

曾经试着把这项困难工作做好，但苏维埃宣传工作者想接近哥萨克集镇的一切努力，结果几乎都很悲惨。哥萨克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残酷迫害致使守备部队的战士和他们的领导人得出对于哥萨克只有用武器的语言谈话才能奏效的结论。

“不，同志们，”布柳赫尔表示反对，“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对哥萨克的市镇实施军事行动。我们应当去帮助哥萨克穷人擦亮眼睛，应当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支持者。要是没有哥萨克参与和杜托夫叛军作战，这场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布柳赫尔反复说明，哥萨克内部的分化已经越来越明朗，在清除了杜托夫分子的村庄里应当帮助当地的贫穷阶层组织起自己的苏维埃。

让我们从1918年再回转到1977年7月的日子来吧。汽车用了两个小时把我们送到特罗伊茨克。大路左侧耸立起了高高的烟囱。这就是国营特罗伊茨克发电站。紧接着发电站的便是一座城市了，一座现代化的设施完备的城市。可那并不

是特罗伊茨克市，而是南乌拉尔斯克——特罗伊茨克第一批繁荣的卫星城之一。

革命前，特罗伊茨克是奥伦堡哥萨克军的东方前哨。即使现在许多人也会因附近一些居民点的名称而感到诧异，这些过去的集镇有叫巴黎的，有叫莱比锡的，也有叫瓦尔纳的……这是俄国军队早先的辉煌胜利的象征。然而更加光彩夺目地留在后辈人良好记忆中的还是早期那些为苏维埃政权、为在这片土地上捍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胜利果实而斗争的志士们的形象。

现今的特罗伊茨克市中心耸立着一座胸前佩戴着两枚红旗勋章的军人大理石像。在基座上镌刻着“海军准尉帕夫洛夫”几个大字。海军准尉，这是海军的军衔，可为什么那时候拥有这个军衔的这位军人头上戴的却是红军合成军队指挥员的制式军帽，而不是海军军帽；又为什么他穿的却是长襟的陆军大衣呢？

不过，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没有发生任何差错……这就又要再一次地偏离到历史中去了……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帕夫洛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在第17西伯利亚团开始服役的，当时这个团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相当大。他从准尉学校毕业之后，在彼得格勒于1917年5月15日，即他将满20周岁之前4个月被接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队伍。十月武装起义前夕，经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推荐，第2波罗的海支队的水兵们选举谢·德·帕夫洛夫担任支队长。当时他就是穿着那件灰色的军大衣，率领从各军舰

上下来的水手们去冲击冬宫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帕夫洛夫在皇村和加契纳附近的战场上和他的弟兄们一起为反击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的军队而战，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非常英勇，以至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了”<sup>①</sup>。

1917年11月5日，谢·德·帕夫洛夫的海军支队返回了自己的基地。在庆祝凯旋归来的大会上，支队长宣称：“只要我们大家还活着，只要波罗的海舰队还存在，革命就不会灭亡！……”<sup>②</sup>

鉴于在加契纳方向指挥战斗行动有方，根据水兵们的要求，海军人民委员特发布专门命令，授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以“海军准尉”军衔，这也就成了他终生的军衔。

此后不久，政府又令其去莫吉廖夫执行任务。后来，谢·德·帕夫洛夫在自传中写道：“占领了大本营，抓住了杜霍宁。我支队里的水手们把杜霍宁给打死了。”<sup>③</sup>

1917年11月29日，弗·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报告说：“明天将开来的第一列车是波罗的海水手和第17西伯利亚团。”<sup>④</sup>这一支派去与杜托夫分子作斗争的革命战士的新编部队的领导人便是这位年仅20岁的海军准尉帕夫洛夫。

---

① M·P·鲁布廖夫、O·E·叶戈罗夫：《谢尔盖·帕夫洛夫——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英雄》，切博克萨雷，1963年，第29页。

② 同上，第32页。

③ 同上，第53页。

④ 同上，第61页。

这一批列宁的使者从彼得格勒出发，经过维亚特卡、彼尔姆、叶卡捷琳堡于12月20日以后抵达车里雅宾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瓦·康·布柳赫尔帮助彼得格勒人按乌拉尔人的方式装备起来。8天之后，以托卡廖夫为头目的哥萨克白军被撵出了特罗伊茨克。第1北方游击队队长于1917年12月26日发布命令表彰了这一胜利，命令是这样开头的：“兹特向特罗伊茨克全体市民宣告，从今天起本市将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实施管理……”<sup>①</sup>

海军准尉帕夫洛夫的纪念碑出自车里雅宾斯克雕塑家Э.戈洛夫尼茨卡娅之手，是人民集资建造起来的，1967年在特罗伊茨克隆重揭幕。

在市内逗留期间我们获悉，谢·德·帕夫洛夫在1919年又一次给特罗伊茨克带来了自由。那时他已是步兵第35师第1旅的旅长，步兵第35师属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编成内。在发布任命谢·德·帕夫洛夫担任这一职务的命令时，指挥部表示深信，“在这里，在旅长的光荣岗位上，帕夫洛夫同志也一定会用大红的字体在红军的历史上写进一系列光辉胜利的”<sup>②</sup>。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没有辜负这些期望。第35师第1旅会同斯捷潘·拉辛团的红色哥萨克一起开进了特罗伊茨克，把高尔察克分子远远地赶跑了。谢尔盖·帕夫洛夫在这座1917年起就一直怀念着的城市里作过短时的休整之后，率

---

① 鲁布廖夫、叶戈罗夫：《谢尔盖·帕夫洛夫……》，第69页。

② 同上，第111页。

领全旅向奥尔斯克发起了进攻……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帕夫洛夫是在远东迎来了国内战争的胜利结局的，当时他是第2阿穆尔集团军的司令员。

我们来到特罗伊茨克车站。在主要入口处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1918年8月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曾在这里发表演说……”国内战争的老同志M·A·费多托夫、И·А·卡萨特金、И·В·奥西宁在回忆起这段时日的事件时说道，在这次演说中父亲又一次号召赤卫队员和苏维埃积极分子以最坚定的方式吸引集镇上的贫苦大众站到自己一边来。

那一天，我们就在娜·费·克拉赫马列瓦娅家里住下了。她的两个哥哥彼得和谢苗，为在南乌拉尔建立苏维埃政权而献出了生命。现今市内有一条马路就是用他们的姓氏命名的，而他们俩以前住过的房子上也钉了一块纪念碑，以资纪念。

娜杰日达·费奥多罗夫娜象母亲一样拥抱了我，她哭泣着说：

“孩子，真象，可真象你父亲……那时候，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常常到我家来。他常在我们家过夜。跟同志们一起来。有时还交给我任务呢。让我去给哥萨克们散发传单……”

父亲曾经和特罗伊茨克革命哥萨克的领导人，后来参加组建以斯捷潘·拉辛命名的第1奥伦堡社会主义哥萨克团的尼·德·托明和A·E·卡尔塔舍夫一起起草过一份传单。天知道，也许老太太当年散发的传单中就有这一份呢。这传

单是这样开头的：

“哥萨克的穷哥儿们，你们最终会明白：谁是你们的敌人，谁是你们的朋友。真心实意地到我们这边来吧，你们将始终得到跟你们一样的穷人们的支援……”

成立跟杜托夫作战的部队的司令部在那时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所能指挥的兵力并不多。在特罗伊茨克，除去车里雅宾斯克赤卫队员和当地的守备部队以外还有叶卡捷琳堡战斗队和彼尔姆战斗队，两个战斗队的政委都是经过考验的乌拉尔布尔什维克：一个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马雷舍夫，一个是尼古拉·古里耶维奇·托尔马乔夫。从上乌拉尔斯克方面行动的是卡希林兄弟俩的红色哥萨克，而从马格尼特纳亚镇郊区方面则由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梅科夫指挥的博戈雅夫连工人战斗队的队员负责控制。

在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之后，司令员把歼灭杜托夫匪帮的作战计划提交给司令部进行议决。特罗伊茨克集群保证从北面和东面包围敌人，而乌法工人战斗队和博戈雅夫连工人战斗队以及卡希林兄弟的红色哥萨克则应从西面和西南面实施突击，以此对杜托夫分子形成合围。

4月9日开始总攻。在各主要方向上捷报频传。红色部队在把最贫困的农民和哥萨克战士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同时，神速地向前推进，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一座又一座集镇。1918年4月17日杜托夫连同他的司令部一起被赶出了作为叛乱分子主要基地的克拉斯宁斯卡亚镇。

4月23日，由博贝列夫指挥的叶卡捷琳堡民兵战斗队在布里延斯基村追上了杜托夫。在接战中，布柳赫尔一到特罗伊茨克后立即组建起来的骑兵战斗队的骑兵们表现得特别勇



敢。但单靠这点兵力要全歼杜托夫分子是不够的，加之刚到战场不久的乌法战斗队行动迟缓，杜托夫终于在一小撮贴身护卫的簇拥下逃进了图尔盖草原。在业已来临的道路泥泞时期要继续追击下去，那是不可想象的。

红色部队在完成了粉碎杜托夫分子于特罗伊茨克和上乌拉尔斯克县之后，接到了就地设防的命令。

城市公园已成了今日特罗伊茨克的名胜。公园中央拱门近侧不久前又耸立起一座纪念碑。一张刚毅的男子汉的脸庞。强壮有力的双手按着哥萨克马刀的刀柄。刀身几乎整个伸进了石制的苍穹……这就是出现在这里的布柳赫尔昔日的战友、国内战争的人民英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托明的塑像。是他首先在特罗伊茨克县唤起哥萨克穷苦大众奋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尼·德·托明起初曾是骑兵百人队的队长。在1918年6月的日子里，他把守备部队所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力量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使他们免于遭到原本不可避免的从数量和装备上讲都占优势的敌人所歼灭的命运。

于是便诞生了由尼·德·托明指挥的特罗伊茨克苏维埃战斗队，当时他被认为是红色游击队奔袭中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

又过了一年。在叶卡捷琳堡从高尔察克分子蹂躏下获得解放前夕，东方面军第3集团军领导组建了一个2000人的骑兵战役集群。步兵第30师旅长，红色哥萨克尼古拉·托明被任命出任司令员。集群的任务是切断叶卡捷琳堡和下塔吉尔之间的交通。

1919年7月14日，托明的部队突破了战线。连续3昼夜

他们走了将近150公里路，解放了上塔吉尔、涅维扬斯基、维西莫-沙伊坦斯基和其他几座乌拉尔的工厂所在地。佩涅利亚耶夫将军的北方集群被隔断了与高尔察克西伯利亚集团军其余部队的联系。

托明的骑兵迅速地向正在从乌拉尔几个采矿工业区撤退的白军的后方突进。7月19日，他们在叶戈尔希诺镇附近粉碎了高尔察克叛军。后来又解放了伊尔比特、卡梅什洛夫、多尔马托沃等地。敌西伯利亚集团军陷于瘫痪，其被击溃的部队纷纷向托博尔败退。托明紧追不舍。他们是红军中首先攻进沙德林斯克和库尔斯克的部队。

1920年，尼·德·托明参加了进军华沙的战斗，后来又转战远东各地和沃洛恰耶夫卡，1924年在塔什干斯坦山区剿灭巴斯马奇分子时英勇牺牲。

电机厂的集会又使我想起了特罗伊茨克。工人们从机床边直接会聚到工厂大院里，我们则顺着一个车间的露天梯子来到院场上。这里仿佛又重新出现了战斗的1918年的场面，当时父亲和托明一起给特罗伊茨克的居民解释必须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必须站在苏维埃政权保卫者的红旗下的道理。

在集会上讲话的有伊·费·普洛特尼科夫教授、П·Г·阿列克谢耶夫中校。他们是历史学家，一开口自然就要讲到过去的情景，而我则主要讲今天的事。在建立乌拉尔重型电机生产联合企业时曾经研究过吸收特罗伊茨克电机厂参加进来的问题。我是这个联合企业的总经理，所以曾不止一次到厂里来过。现在，我很高兴地获悉，特罗伊茨克电机厂已有25种产品荣获达到国家质量标准的奖章，是车里雅宾斯克

州 5 个最先进的工厂之一。这个劳动集体是非常忠于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非常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

国际主义……这个词汇的意义对于工厂的工人来说并不抽象，而是十分具体、亲切而又珍贵的。每一次，当他们去上班时都能看到在主厂房的正面镶着一块白色的纪念牌，上面用金字写着：

“1918年6月，国际营马扎尔人（匈牙利人）排曾在这里英勇地战斗过，全排同志在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壮烈牺牲。”

## 在卡希林的家乡

当汽车驶近上乌拉尔斯克时，我们在伊兹沃兹山附近停留下来。整个山坡栽满了碧绿碧绿的小松树。只是在朝向上乌拉尔斯克的一侧剩出来一大片旷地。空旷，但不荒芜。其中央也长着一簇簇新嫩的小松。这些小松栽得不凡，很讨人喜爱，以至远远走来就能看到伸展开去足有百米长的5个字母，连起来那就是我们大家倍感亲切的“Ленин”①。

1957年，当第一个军事历史考察队来到上乌拉尔斯克之前不久，伊兹沃兹山上刚刚隆重地揭幕了一座方尖纪念碑，有500名过去的乌拉尔红色游击队员和1万名车里雅宾斯克州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劳动者参加了这个仪式。事隔11年之后，当欢庆伊兹沃兹交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又耸立起来一座合成的雕塑纪念像。那是一座高高的花岗石尖形塔，在基座旁肩并肩地站着工人赤卫队员和哥萨克游击队员两尊巨大的勇士塑像。可以说，这是给予游击队员的最高奖赏。

我们登上伊兹沃兹山，在这座庄严的纪念碑的台座上献上花环。

有人读着那清晰的铭文：“1918年，此地，在伊兹沃兹山上，红色游击队员的混成部队，在尼古拉·卡希林的指挥下彻底击溃了白卫军的兵团。”

底下是在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的乌拉尔人

---

① 列宁。——译者注

的姓名。

我们为牺牲的英雄默哀一分钟，以寄托对他们的思念之情。

曾参加过游击队那次不朽的奔袭的老同志伊万·彼得罗维奇·巴塔列夫、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利亚明和季莫费·列昂季耶维奇·瑟苏耶夫和我们一起也在纪念碑前低下了他们白发苍苍的头，以志哀悼。

上乌拉尔斯克步兵团当年的游击战士伊·格·利亚明讲开了故事：“我们从别洛列茨克扎沃德发起进攻，把白鬼子从别廖佐瓦亚山上打退下去，占领了维亚佐沃伊和维亚茨基两个村庄。上乌拉尔斯克已经近在咫尺。虽然很近，但还是无法进城，有伊兹沃兹山阻隔。你们可以看到，它高高地耸立在那里，居高临下通往城里的所有通道尽收眼底，真是一目了然呀。白卫分子不是傻瓜，他们早就利用了这个优势。他们在山坡上挖堑壕，构筑几十个机枪巢，还在前面拉了带刺的铁丝网，掘了许多陷阱。即使这样，我们还是照样以强攻攻占了这个要塞。我们团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波戈列利斯基指挥。那可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英雄呀……”

上乌拉尔斯克步兵团由哥萨克穷人和无马的农民组成。它和已如上文所述的几乎全是工人的第1乌拉尔团协同作战。在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强攻那天夜间伊兹沃兹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那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团的代表、原步兵团第8连连长雅·米·克里沃谢科夫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吧。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就曾给我讲过，“七月的太阳落山很晚。就是那时候，我们正向前迅跑。第1乌拉尔团的战士真棒。扎哈尔·米哈伊柳克连的

战士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子弹的呼啸声中爬上陡峭而光秃的山岗。当我们抵近铁丝网障碍跟前时只剩下一半人了；在靠近山顶时发生了一点迟误，右翼稍稍落后了。那里是上乌拉尔斯克哥萨克的步兵队列。他们遇上了敌人的屏障队。有人在喊：‘哥萨克人，别开枪！弟兄们，快清醒过来吧！’我们的同志放慢了脚步，看来，怜悯之心真上劲儿了。‘别听那一套！揍这些白狗子！’百人队队长谢苗·加卢诺夫大喊一声，接着便和排长科热夫尼科夫一起向前冲去。加卢诺夫从腰际抽出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机枪一下子就哑了。上乌拉尔斯克人冲上去拚刺刀。我们对他们的英勇冲杀给予了支援……”

在1918年7月28日夜间展开的这场总决战中加强了工人、农民和奋起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劳动者之间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团结。

在拜谒过伊兹沃兹的纪念碑之后我们来到一座市立公园，那里有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和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两兄弟的纪念像。

卡希林两兄弟是南乌拉尔红色哥萨克运动的创始人和第一批组织者。他们两人后来都成长为著名的苏维埃高级将领。

布柳赫尔谈到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斗争的亲密战友时曾一再强调指出：“在各支队的指挥员中尤其突出的是尼古拉·卡希林和伊万·卡希林兄弟俩。伊·德·卡希林是上乌拉尔斯克支队的司令员，他那个支队里有许多哥萨克青年人……他（指尼·德·卡希林）当时已经入了党。那是一个谦虚，善于克制，而且很聪明的指挥员。”①

---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莫斯科，1963年，第50页。

决战之前，尼·德·卡希林在伊兹沃兹山后受了重伤，但即使受伤他也没有下火线，而且在整个游击队实施奔袭的过程中在作战和其他方面给予了年青的总司令许多帮助。

1919年1月，尼·德·卡希林替代父亲出任步兵第30师师长的职务，他率领全师走过了从维亚特卡河到叶卡捷琳堡的胜利之路。后来又被任命为奥伦堡筑垒地域的守备司令。他招募哥萨克穷人新组建了3个苏维埃师，从而在奥伦堡—阿克纠宾斯克—伊列茨克一线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地区。1920年秋，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南线指挥第3骑兵军作战时表现得十分英勇。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也经历了一段光荣的战斗历程。在游击队奔袭之后，他在步兵第30师作战。当东方军实施强大的反攻之前，他领导了新组建的一个红色哥萨克旅。1919年4月28日，这个旅所属的几个团在乌拉尔土地上开始了胜利进军。他们解放了布古鲁斯兰、别列别伊等城市，在乌法进攻战役时和夏伯阳的第25师协同动作，尔后又凯旋回到故乡上乌拉尔斯克和特罗伊茨克。

国内战争以后父亲好几年没有见过卡希林兄弟二人，就是在结束了中国的军事使命之后他的生活也一直在远离早年的朋友和战友们工作的地方度过的。直到1934年，当成立全国军事委员会时，他们才又重新见了面。那是在莫斯科。远东特别集团军的司令员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一起趁着参加委员会会议之便去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家作客，那时伊万是莫斯科的民警首脑。

父亲对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特别尊重，把

他看作自己的军事老师和指导者。那是在德国战场上荣膺过6枚军官战斗勋章的一位极有素养的指挥员。他不仅以广博的军事知识，而且还以丰富的文化素养和个人的魅力使大家折服。

在人们的记忆中乌拉尔红色游击队在敌人后方的奔袭至今仍然被称作布柳赫尔和卡希林兄弟的队伍共同实施的远征，这是恰当的。这次奔袭的这样一种提法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还常常出现于许多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中。但后来，当研究人员有机会从整个历史全局上对国内战争的各种事件进行研究之后，在论述乌拉尔集团军远征<sup>①</sup>的著作中不知为什么卡希林兄弟俩似乎退居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依我的观点看，这说明对红色哥萨克指挥员在组织和实施乌拉尔领土上的游击斗争中的作用的评价降低了。更有甚者，还出版了一些记叙曾经在布柳赫尔和卡希林兄弟之间发生过的重大分歧的事情。那是在1918年7月16日第一次讨论各支队行动计划的指挥员会议上发生的事情。这些著作还提到“大多数指挥员主张向上乌拉尔斯克进军”<sup>②</sup>，也就是说，是支持尼·德·卡希林的意見的。可实际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文件中找到。历史保存下了那次会议的记录稿。根据这份文件，讨论总的行动计划是这样进行的：“布柳赫尔同志声称，他的支队将去中央

---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是这样称谓布柳赫尔和卡希林兄弟的游击队那次奔袭的（见第27卷，第68页）。

② B·B·杜申金：《从士兵到元帅》，莫斯科，1964年，第20页。



地区……

尼古拉·卡希林则声称，他的支队希望开赴上乌拉尔斯克和特罗伊茨克，理由是只要我们把这一带的反革命镇压下去，那就是给总的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此外，斗争总是应该在更加危险的地方展开，目的无非是更多地歼灭敌人。同时，他还考虑到了他的支队希望回到家乡去的情绪。

布柳赫尔<sup>58</sup>表示反对，他说，要是我们向上乌拉尔斯克运动，那就会因为许多人跑回家去而削弱自己的队伍，而如果再进而去特罗伊茨克，我们就一定会把整个上乌拉尔斯克支队瓦解掉。很可能，从今以后以余剩的兵力去作战将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问题交付表决，结果赞成去中央地区的13票，反对的3票；赞成去上乌拉尔斯克的3票，反对的13票。”

这份记录稿第一次发表在《第30师》一书的第20至23页上。这本书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步兵第30伊尔库茨克红旗师政治部出版的。同时，还在1959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传奇式的奔袭》的附录中刊出，但不知为什么有关表决结果的几行字给删去了。

所谓向中央地区的远征，在那个时期的战斗行动中，正如那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游击队队长会议的参加者米·德·戈卢贝赫曾给我解释过的那样；是指向叶卡捷琳堡的运动。叶卡捷琳堡当时是领导整个辽阔的乌拉尔边疆区的中心，是北方—乌拉尔—西伯利亚战线司令部所在地。后来成为东方军第8集团军基础的红军各部都受这个司令部所领导。

但在那次指挥员会议上当选为总司令的尼·德·卡希林是否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呢？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

应该到由他本人签署的文件中去寻找。

总司令在1918年7月17日的命令中写道：“我们的任务是冲出去和现在正在从中央地区方向行动的部队会师，并与之建立联系。但我认为让整个部队越过车里雅宾斯克—乌法的铁路线则是我们的当前任务……”<sup>①</sup>

在1918年7月20日签发的下一道命令里，尼·德·卡希林又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的总任务是走出多山少粮地带，向北从上乌拉尔斯克到铁路线的方向上运动。在车里雅宾斯克—兹拉托乌斯特地段穿越铁路干线，然后再往北方向继续前进，以期与我们中央地区的部队会师。”<sup>②</sup>

从这些命令中可以看出，总司令在作战行动的最初几天内确定进攻的基本目的时是考虑了大多数指挥员主张向北、向中央地区，也就是向叶卡捷琳堡运动的意见的。只是到了7月21日，当已经明显地看出在东部方向实施进攻要比从季尔良向北发起进攻顺利得多时，总司令才作出重新改变混成部队战斗队形的决定，并下达了直接去攻占上乌拉尔斯克的命令。

命令指出：“布柳赫尔同志，当队伍在卡扎库洛瓦亚村集中以后应以战斗队形穿过乌尊古洛沃村、萨曾巴耶瓦、维亚茨基村去上乌拉尔斯克市，目的是在7月22日占领这个地方。”对上乌拉尔斯克支队司令员写道：“把步兵和炮兵攥成一个拳头，在使你们的步兵与布柳赫尔同志取得人传通信

①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号7414，类号1，案卷号1，页次17。

②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号7414，类号1，案卷号1，页次20。

联络之后，让它向上乌拉尔斯克运动，以加强从布柳赫尔方面的突击……”给托明支队布置的任务是去瑙鲁佐沃，于7月22日占领这个地方，并“进而掩护布柳赫尔同志一翼（左翼。——伊·普洛特尼科夫注）”。①

可见，总司令是把攻占上乌拉尔斯克战斗中的主要任务交予了乌拉尔斯克支队和他的司令员布柳赫尔同志的，象这样的厚爱恐怕未必会赐给一个“根本不同意已经开始实施的作战方案”的人吧。

攻占上乌拉尔斯克无疑便利了当前任务的完成。关于当前任务总司令在1918年7月20日的命令中是这样决定的：

“……暂时先保证自己的后方，控制从上乌拉尔斯克伸展出来，而又是我们所必经的向北方向的各条土路的交汇点”，也就是保证向米阿斯，继而向叶卡捷琳堡的运动。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思想上显然还有着另一个打算——把敌人从这座家乡城市里赶出去，即使两天也行，以便把留在那里的同志和战士们的家属救出来。

由于白卫分子拚死抵抗，7月22日未能攻占上乌拉尔斯克。但即使是28日破晓时分，当伊兹沃兹要塞陷落，敌人离城向东溃逃时，由于他们依仗卡缅内山岗作屏障，游击队员仍然未能开进上乌拉尔斯克空无行人的街道。在这里要说布柳赫尔和托明的主张似乎得到了证实或者指责卡希林兄弟犯了严重的错误，照我的观点看，同样都未必正确，因为早先确定向北方向运动之毫无意义也只是到1918年7月25日以后，即在红军撤出叶卡捷琳堡以后才为大家看清的。这一情况也

---

① 伊·费·普洛特尼科夫：《万人英雄：以布柳赫尔为首的乌拉尔游击队的传奇式奔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年，第55页。

是首先使游击队领导在那么多次的光荣战斗之后才定下迅速将所有支队都撤回别洛列茨克的决心的原因。

如今，在上乌拉尔斯克，为永久纪念游击队传奇式奔袭中的英雄已经做了许多事情。参观了伊兹沃兹山上的纪念碑和卡希林两兄弟的纪念碑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市人民博物馆，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许多年来，这座博物馆一直由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夫洛夫担任馆长，他是著名的第24铁师的一位老同志。这个师曾经解放了辛比尔斯克，后来又在哥萨克草原上的上乌拉尔斯克永远地确立了苏维埃政权。

我曾参观过周围几座城市的许多类似的博物馆，但应当承认，我在哪里都没有见过这么有意义的陈列品和早已偃旗息鼓了的国内战争时期的珍贵的遗物。尤其是上乌拉尔斯克人还用透影画充实他们的博物馆，即使在我们边疆区各州的博物馆里这也是未见先例的。

车里雅宾斯克画家B·A·涅亚索夫的透影画《强攻伊兹沃兹山》占据了博物馆主展厅整个正面的满满一墙。这幅画通过令人信服的形象，大家都很熟悉的细节揭示了激战的进程，在上乌拉尔斯克步兵团地段上攻占敌人工事的情景。画的中央是团长И·В·波戈列利斯基。

当然，上乌拉尔斯克人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是他们首先竭力要有充分根据地、确切无误地再现家乡人的功绩。伊兹沃兹交战的场面实际上要宽广得多，规模也大得多。但万事开头难，从透影画还可以再前进一步，发展成全景画。搞全景画完全可以不在博物馆的大厅里，而是到伊兹沃兹山上去，到叶卡捷琳堡人和拜马克人，特罗伊茨克人和斯捷尔利塔马克大同上乌拉尔斯克的红色哥萨克一起取得首

战告捷的地方去。

涅亚索夫专门为上乌拉尔斯克博物馆画的第二幅作品《渡过锡姆河》也是十分感人的。这幅画把我们带进了整个游击队奔袭中一次最具特色的交战中去。画幅的中心是乌拉尔混成部队的第二任总司令瓦·康·布柳赫尔。

当我走近旁边站着一些老同志的画面跟前时，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利亚明说道：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形象很真。我记得他就是这副样子。可那匹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整个奔袭中，我们游击队员谁也没有见过布柳赫尔骑过白马。”

我证实，即使后来，在远东，父亲最喜爱的也是浅黄色的马。

“我也是这么讲的，”季莫费·列昂季耶维奇·瑟苏耶夫一下子上了火，“不管你怎么争辩，画家就是固执己见。他非说，要的不是那种色调，白马才好看呢……”

“也许，色调倒是有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巴塔列夫插了一句，“可真实性没了……”

我的那些老头儿们热烈地、象青年人一般地嚷嚷起来。电影摄影师鲍里斯·库斯托夫抓住了这个镜头。“画旁争论”后来全部编进了他所摄制的电影特写《值得纪念的旅程》<sup>①</sup>。

当我和考察队员一起在维亚特卡村时经受了許多令人振奋的时刻。1918年7月末，乌拉尔斯克支队司令员的司令部就设在这个村里。现在，这里是地区先进的国营农场的—一个分

<sup>①</sup>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影制片厂，《苏维埃乌拉尔》，1977年第33号。

场，农场就以当年游击队的名称命名，叫乌拉尔斯克国营农场。

可惜当年村里的游击队老同志都已经不在了。分场里年岁最大的要数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谢尔巴科夫，老人曾是“荣誉勋章”的获得者。

“那时候我还不满17岁”，他讲道，“我见过你老爹，但站得稍稍远了点，就在这里，阿夫齐扬那边。他没让我去参加远征，他说，‘你年纪太小，个子还没长成，等你再大点，再长高点，仗还是有你打的’，我还真赶上了。打了两年巴斯马奇分子。又到了芬兰战场。还赶上了卫国战争爆发。这以后就到这儿干活来了，一直到领养老金……”

翌日凌晨，我们告别了卡希林的家乡。一出上乌拉尔斯克，落入眼帘的又是那陡峭挺拔的伊兹沃兹山。车子停了下来，好让我们再次饱览一下屹立在高高的红色游击队荣誉尖塔一侧的工人和哥萨克两尊强壮有力的塑像。

现在是把那位彪炳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人第一次群众性的军功于千古的人公诸于世的时候了。那座纪念石像的作者便是车里雅宾斯克的雕塑家、俄罗斯联邦艺术家协会的会员谢·雅·萨沃奇金。他把自己的全部创作献给了那火一般年代的英雄事业了。他的雕塑《革命史诗》陈列在列宁中央博物馆里。谢·雅·萨沃奇金的许多其他创作也都成了纪念文物。耸立在车里雅宾斯克、科佩伊斯克、克什特姆、米阿斯和南乌拉尔其他一些城市和乡村里的这些纪念碑像，讴歌了青年时期使艺术家的心灵受到过灼伤的那场伟大卫国战争英雄们的不朽的勇敢精神。

1976年春，有人告诉我，谢·雅·萨沃奇金开始为父亲创作一幅雕塑像，希望听到我的意见和建议。我去了车里雅宾斯克。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我一眼注意到了大师写就的字体好大的一条横幅：“忠诚和信念”。谢尔盖·雅科夫列夫截住了我的眼神，解释说：

“不，不，这两个词我不是从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那里撷取来的。但我认为它们能够反映出他品格中的主要特点：战斗中的无所畏惧，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不可调和的仇恨，坚强不屈的勇敢精神和对部属生活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雕塑家接着说，“您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胆敢塑造一个骑马的身像。我知道，国内战争以后，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是坚决主张以现代化武器和技术装备军队的高级将领之一，但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最初日子里，马对于红军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宝物。这就是我所以处心积虑想见到共和国第一位红旗勋章荣膺者跃马奋进的形象的原委……”

谢·雅·萨沃奇金收集了父亲生前的大量照片，父亲的亲密战友对他的回忆录，这对他的创作很有帮助。我认为我也给了雕塑家以我力所能及的帮助，给他讲述了父亲生活中很少为人所知的一些细节、他的很有特色的举止动作，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相片以充实他的照片库。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一位很特殊的对话人，他全神贯注，从浓密的灰白眉毛下透露出来的执着的眼光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庞，同时他那只强壮有力，劳作过度的手不停地、机械地、习惯地在图画纸上划着一些细线条。

谈话结束时萨沃奇金说道：

“哈，您的头形、脸的上半部都跟瓦西里·康斯坦丁诺

维奇很相像。我不会看错吧？”

我对大师如此迅速的发现感到吃惊，回答说：

“那当然，不会看错。我倒是很想听到既对我父亲青年时期，又对他成年以后的情形都十分了解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这次旅行中我们原计划在车里雅宾斯克要去造访谢·雅·萨沃奇金的工作室。不料，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事先打电话给我表示歉意，并说他那里现在没有什么可看的。过去的作品已经没有了。产生了另外的设想。新作的规模将更大，将给人留下更加强烈的印象。不过最早还得过两个月以后，他才能拿得出来。

在上乌拉尔斯克第一次见到谢·雅·萨沃奇金那硕大雄伟的《游击队员纪念碑》时，以至后来和他分手时，我对于雕塑家突如其来的要毁掉我认为是已经完全告成了的作品，并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的决心感到十分惋惜。那个新作将会是一幅怎样的作品呢？

等待的时间果然并不长。就在1977年的10月底，我接受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邀请，去车里雅宾斯克参观州里举办的艺术展览。萨沃奇金写道，他的新作已经通过了选拔竞赛，将与其他献给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0周年纪念的作品一起参加展出。

我去参观了车里雅宾斯克展览会，但不是 在开幕 那一天，而是照通常所说的是在展览会行将收场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间，因为那时候许多观众也好，评委也好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意见，大家都说谢·雅·萨沃奇金的雕塑新作《共和



国第一位红旗勋章荣膺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的确，这已经不是一尊雕塑的身像，而是一幅雕塑的艺术精品，通过这幅作品大师生动地刻划出来的并不是领袖个人的形象，而是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第一批志士的那种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画幅中央跟先前一样是游击队总司令的形象，但现今他身上更多的不仅是形体上的相似，而是足以揭示伟大十月革命所诞生的新型统帅的气质的性格特征。右侧稍前是一个头戴布琼尼式军帽，身穿军上衣的司号员在“发号施令”；左侧靠后则是一个肩上扛着3英分大口径步枪①的大胡子中年人。他是一员刚参加的红色游击队员。这一老一少跟自己的总司令一起正走向新的征途，为了保卫第一个工农国家的胜利果实去建立新的功勋。

卡霍夫卡和沃洛恰耶夫卡，赤塔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都有父亲的纪念像，但那都不过是他的雕像罢了。而象这样既传神韵，又表达集体功绩的艺术品至今我在其他地方还真是从未见过呢。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他成为群众的领导人；是人民，他以信念和正义为之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人民培养他成为统帅。

这一切在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萨沃奇金的新作中都是能够得到说明的。

---

① 一种著名的俄式步枪，3英分=7.62毫米。——译者注

## 越过乌拉尔山

一座大工厂。大坝外是一片辽阔的水面，冈峦起伏。沿河的陡坡上疏落地长着几株小松树。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地方居然尚能如是地保留下古老的乌拉尔景色喔！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别洛列茨克，南乌拉尔的一座光荣的城市。国内最古老的冶金厂是这座城市的心脏。早在200多年前，第一批工匠就在这里开始炼铁、炼钢、锻铁，并很快赢得了能工巧匠的美名。可他们的劳动是沉重的带有强制性的。经过一次次严峻的考验，他们对幸福的未来生起了信心。无论是子弹、监狱，还是西伯利亚的苦役都摧折不了他们对于自由的想望。

呀，右侧是覆盖着森林的大山。当地人叫它姆拉特卡山。第一次俄国革命时工人们常到山上集会。这些聚会的组织者是从流放中逃跑出来的瓦西里·科索罗托夫、费奥尔多·阿列克谢耶夫、德米特里·什特尔利亚耶夫和其他一些意志坚强、英勇无畏的工人布尔什维克。费奥多尔·瑟兹兰金，这位未来的红色指挥员，以后又成为苏维埃学者、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当年就是在这座山上从担负联络员的责任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

姆拉特卡山上的松树也听到了安德烈同志的声音。乌拉尔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米·雅·斯维尔德洛夫和别洛列茨克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常常到他们这里来，在非法的“林中”集会上发表讲话。

别洛列茨克在伟大十月革命前就是南乌拉尔革命运动的战斗中心。遵照党中央的部署，1916年底久经锻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帕维尔·瓦尔福洛梅耶维奇·托奇斯基来到这里。他是彼得堡工人中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者之一，曾参加过红色普列斯尼亚<sup>①</sup>的街垒战。弗·伊·列宁很了解他，他也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亲密朋友。

帕维尔·瓦尔福洛梅耶维奇以其所特有的毅力为加强别洛列茨克党的组织而奔走。他在与杜托夫叛军斗争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1918年2月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第一支别洛列茨克工人义勇战斗队，随之其他战斗组织也应运而生。

半年之内，别洛列茨克扎沃德组建并开赴国内战争各战场的赤卫队共有16多个；市的党组织动员了近4000名战士积极投身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去。在萨马拉和乌法，在兹拉托乌斯特和尤留赞，在季尔良和乌斯季卡塔夫，在上乌拉尔斯克和马格尼特纳亚，到处都有别洛列茨克人在战斗。

在捷克白军骚乱者及其当地的喽啰在南乌拉尔作威作福的日子里，别洛列茨克扎沃德镇就象是四面尽被疯狂的敌人包围着的一块解放区，同时又是未受损失的苏维埃各部队进行集结和联合的处所。它理所当然地赢得了红色游击区首府的称号。

1918年7月8日，伊万·卡希林和尼古拉·托明的两支队伍于被迫撤出上乌拉尔斯克之后来到这里。过了一个星期，别洛列茨克的侦察员传来消息说又有1500多名齐整的

---

<sup>①</sup> 莫斯科的一个区，在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中因工人们的英勇斗争而闻名。——译者注

步、骑兵来到镇口。如是，在游击区首府第一次获悉了关于布柳赫尔和尼古拉·卡希林在哥萨克草原上完成了第5个100俄里转移的消息……

如今，别洛列茨克依然被那一片挺拔的大山紧紧地围裹着，美丽的别拉亚河水依然如昔日一般地在流淌。可也并不是所有的一切统统一如既往。山、水、土地依旧如故，但别洛列茨克的容颜却是改换了模样。这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遍地小木屋的破旧的镇子，而是一座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苏维埃城市了。它的工业跟过去一样还是以冶金业为核心，不过那也已经不是祖辈时期那种黑黢黢的工场，而是强大的冶金联合企业了。

从1963年起，别洛列茨克和它那年轻的，但已经很强壮的小弟弟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之间有宽轨铁路联结起来了。这是国家的一条新建铁路。

我们到了别洛列茨克拥有第一流设备、曾荣获劳动红旗勋章的米·伊·加里宁冶金联合企业的一个最大最新的车间。

市中心几乎就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翻版：文化宫、高层住宅、新的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医院。市的历史地志博物馆不久前迁进了一幢现代化的专门建造的大楼，这使我们感到格外高兴。

过去别洛列茨克矿区经理的那幢十分显眼的别墅如今已显得矮小，也不那么突出了。1918年夏曾两度在这里召开过别洛列茨克扎沃德和周围地区的红色游击队队长的军事会议。

在7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组成了一个新的大兵

团，乌拉尔混成部队，并讨论了向中央地区突围，去和工农红军正规部队会师的第一个计划。

8月2日凌晨，在上乌拉尔斯克方向上的进军是有成效的，但并未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之后各游击队队长又一次来到他们熟悉的这座别墅参加例行的军事会议。会议参加者，乌拉尔步兵第17团当年的一位营长伊万·彼得罗维奇·涅多林在二十年代末所写的《布柳赫尔远征记》一书中给乌拉尔混成部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作了这样的评述：“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大家看到他老是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皮夹克，头戴一顶士兵帽，脚登沾满尘土的靴子。中等个头儿，一头栗色的头发，体格强壮。下巴老是胡子拉茬的，鬓角边也难得刮净。灰色的专注的眼睛里常常透露出钢铁般的意志，同志们深信这是他坚强性格的体现。颌骨和下颏给人以持重、坚定的气质的印象。随身携带的装在木匣子里的驳壳枪、望远镜、野战公文包，这些就是他的全部行头了……

伊万·卡希林，哥萨克穷人所爱戴的人，以其豪放、机智而赢得了声望。高高的个子，一表堂堂……他爱穿哥萨克蓝色的军官裤子，络鞣革的统子高高的皮靴。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夏季天气炎热时就穿一件普通的扣子在一侧的竖领衬衫或者军上衣。衬衣上好扎一条银质的腰带，腰际斜挎一柄哥萨克马刀，也是银质的，一支纳甘式的左轮手枪。卡希林的头发修剪入时，蓄着淡棕色的胡子。他还不到30岁。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好骑手，好击剑手，一个乐天派。

和伊万形影不离的哥哥尼古拉·卡希林是一个谦虚的人。中等个子，乌黑的头发，深色的眼珠，一张沉思的严肃

的脸庞。常常穿着一身普通的哥萨克军官爱穿的西装。尼古拉的伤势尚未痊愈，走起路来还得拄着拐杖或者套在金属鞘里的鏢骑兵的马刀……

在其他几位支队指挥员中最孚声望的当推尼古拉·托明。他是特罗伊茨克旅的旅长，早先是哥萨克军士。大高个子，身强力壮。蓄着淡褐色的胡须。穿一件很好的皮夹克，手里老拿着一根鞭子，腰里别着手枪，胸前挂着望远镜。托明不久前手上负伤，整个远征中他的手老吊着绷带。他是实干派，沉着冷静且英勇无畏，总是跟前线的先头部队在一起。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但又都时时见到他始终是那么精神抖擞。”<sup>①</sup>

在第二次游击队队长的军事会议上，尼·德·卡希林因负伤而卸去了总司令的职务。瓦·康·布柳赫尔被推举当选为乌拉尔混成部队的新任总司令。经过时间不太长，但相当热烈的一番讨论，队长们通过了他所提出的一份新的突围计划。

我又一次去求助于父亲和作家们会见时那份谈话的记录稿，从中找到了这样一些段落：“当我们获悉叶卡捷琳堡已于7月25日失陷，并设想战场很可能就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某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便打算到塔内普河一带或者克拉斯诺乌姆菲斯克地区去和红军主力会合。

这就有一段距离远且很艰难的路程要走。从别洛列茨克启程向西的唯一一条路便是顺着人烟稀少的山区蜿蜒而去的

---

<sup>①</sup> 伊·彼·涅多林：《布柳赫尔远征记》，巴什基尔图书出版社，乌法，1982年，第41—42页。

别洛列茨克——斯捷尔利塔马克的通道。一路上要越过南乌拉尔的好几个山口，还要通过其主要山口阿拉陶。战士们经过5月份以来的远距离行程和一系列战斗，内部很团结。最近的几次战斗使指挥员有了很大提高，积累了指挥经验。我军在以小分队作战时根除了老要为侧翼担心的毛病，现在听到“包抄迂回”这个词也就不至于引起慌张了……

战士们懂得，除去勇往直前去和红军会师，打败白军之外，其他出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sup>①</sup>

1935年父亲是这样谈过的，但1918年8月2日他在给乌拉尔混成部队各支队下达的关于去和东方面军各部会合的第一道命令的结尾曾直截了当地向指战员提出问题：“也许，有许多人……会产生怀疑，究竟值不值得向新的方向前进，留在这里或者到某个地方隐蔽起来是不是更好些。”接着他就作出了斩钉截铁的答复：“同志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样敌人就很容易把我们各个抓住或掐死；而如果我们把5个手指攥成一个拳头，大家拧成一股绳，敌人想要战胜我们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我们能战斗，我们能团结一致地冲出一条路去。前进吧，同志们！谁胆怯，谁就留下，但要记住，一个人成不了力量，是很容易被敌人摧垮的。”<sup>②</sup>

没有出现胆小鬼。大家都明白，拒绝从上乌拉尔斯克方向突围出去意味着什么，于是全体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跟着新任总司令所选定的方向出发了。

① 《在南乌拉尔》，第86页。

② 《历史档案》杂志，1958年，第1期，第82—83页。

1918年8月5日破晓时分，从别洛列茨克扎沃德撤出了最后一个游击连队。先经过大坝，驶过一片工厂的厂房，然后上坡、进山。我们考察队的汽车现在行进的路线就是当年他们所走的路线。

“脚上无鞋、腹中无食的这一支军队缓慢地，但却不停地、顽强地在向西运动，甩开了攻击他们的哥萨克队伍，”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为纪念工农红军建军20周年而发表的《布柳赫尔元帅》一篇特写中写道，“这次运动反映出那么惊人的坚定性和沉着果断的精神，以致白军开始慌乱起来了。

布柳赫尔的名字威震四方。他是什么人，这一位能够将其已经散乱了的团队重新团结得象传奇式的罗马军团一般善战的无所畏惧而又才气横溢的统帅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是谁，这位统帅究竟是谁？他的军队就象一条缓缓流淌着的深而满水的河流一样无法阻遏。这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车工、沙皇军队的一名列兵。白党的报纸连续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报道，说什么布柳赫尔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出大价钱雇佣来的德国军官。白军统帅部为布柳赫尔的脑袋悬赏2万卢布。布柳赫尔读着这则告示，不露声色地在心里发笑。他对自己的脑袋充满信心。”<sup>①</sup>

离开别洛列茨克之后我们一路上曾多次穿过电气化的铁路干线，或者与之平行着驶进。第一次这样的交会是在谢尔梅涅沃村附近，方尖碑在眼前驶过后不久，从那碑上所刻的铭文可以知悉，1918年8月瓦·康·布柳赫尔指挥的红色游击

---

① 《新世界》，1938年，第2期，第215—216页。



兵团的奔袭从这里开始了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接着是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小镇美丽的车站，而在昔日的山村伊尔内克希附近，则架起了一座灵巧而精致的别拉亚河铁路桥……

修建别洛列茨克——卡尔拉曼之间的铁路线是全苏共青团的一项突击工程。1977年夏，当我们正沿着游击队当年战斗的故地行进的时候，这条线路上已经有工作车辆在开动了。

乌拉尔的红色游击队员在那战斗的1918年就是在这里，通过这些陡峭的山冈和难以通行的森林突围出去的。“布柳赫尔的部队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穿山越岭，即使是苏沃洛夫在瑞士的行军也未始能与之相提并论呀，”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向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应当向为我国年青的军队的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的这些英雄们的领袖表示感激和钦佩……”<sup>①</sup>

是的，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壮丽的遗训：要忠于既定的目标，不要在困难面前退却，要象爱护眼珠一样保卫各民族间用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几十年之后，也是在这些深山密林之中又出现了当年传奇式游击奔袭参加者的后代。如今他们是新的铁路干线的建造者，他们内心充满着感激和钦佩之情。

我们走斯捷尔利塔马克那条老路离开别洛列茨克之后相当困难地爬上了卡缅内悬崖：阿拉陶山口最后一个陡峭的峭

---

<sup>①</sup>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76，类号1，案卷号15，页次20。

所。在蜿蜒于崇山千嶂之中的小路上盘旋使人真有忽而直插云霄，忽而骤落隘底之感。到了这里算是呈现出一马平川了。前方是一片阔叶林和别拉亚河沿岸谷地的辽阔的草原。

我们考察队下山以后到了彼得罗夫斯科耶、克拉斯诺乌索利斯基、阿尔汉格尔斯斯科耶、伊格利诺、红戈尔卡等几个村子。所有这些居民点在旅游导游图上都被标明曾是布柳赫尔的游击军与白卫分子发生激战的地方。

在别洛列茨克有人告诉我们，在我们抵达之前两天从城里来过一个共青团摩托车小组，他们也是顺着当年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行进的……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年青人对共和国第一批荣膺红旗勋章的人十分倾心。他们在结束仿佛是一次穿越整个巴什基尔的远距离旅游之后在彼得罗夫斯科耶、克拉斯诺乌索利斯基和沿途其他几个“热点”都竖起了他们亲手浇注的纪念铁牌，上面写着：

“瓦·康·布柳赫尔的游击军曾在这里通过。

光荣属于英雄们！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Г·И·诺索夫矿冶学院的大学生和教师满怀感激的心情悼念英雄们。”

1976年版的导游图用红色箭头标示出游击队传奇式奔袭的路线，这张图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引到那遥远的1918年。我已经进行过多年的研究，研究从老同志的回忆录中，从档案文件中，从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的著述中撷取到的材料，因而自觉到比较充实。现在要去旅行考察，我就要对这一切，按军事用语的说法，到现场去实地进行思索，作出评估。

我在筹划着这样做的同时，渐渐地生出一个信念：正是

在这里，在别拉亚河沿岸谷地的阔叶林和辽阔的草原上养成并深化了游击军总司令作为一个真正的统帅的才具。

在济利姆河、别拉亚河和锡姆河一带的广阔地区展开的战斗是乌拉尔混成部队向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实施突破的决定性战斗。在此之前，混成部队得到两个生气勃勃的赤卫团的补充：一个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梅科夫指挥的博戈亚夫连团，一个是以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丹贝格为首的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团。这时候父亲辖下的已不是几百人，而是几千名指战员，不是一两支队伍，而几乎是整整一个生机勃勃的师；他在定下决心时所应当考虑的已经是这个师整个作战地区的情况了。

就别洛列茨克本身来说，最复杂的问题是选择方向。总司令部当时所掌握的有关敌人兵力的材料实在太少，而敌人则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战胜并驱散红色游击队这股洪流。司令部对于他们要去会合并继续与之共同斗争，打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自己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也几乎全然不知。

参谋人员手里的地图都是上个世纪印行的10俄里：1英寸的比例图，而且份数少得可怜，许多居民点图上根本不标注。很难猜测那些乡间土路现在在什么地方以及路况如何。从当地乡政府大院墙头摄下的地方图也帮不了多少忙。有关道路、路况、河流和渡口的资料多半是从当地居民口中探听的。总之，在他们周围的地形能够“看得”比较清晰的也不过就是在40至50俄里半径的范围之内。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判定方向确实是极端困难的，因此远征中每天的行军路线总司令都是在听取了身边最亲密的助手的意见和建议之后才确定下来。

米·德·戈卢贝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布柳赫尔具有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素质：能始终做到最大程度的专心致志，即使在最复杂、最混乱、最危险的形势下也能保持冷静沉着。他的情绪从未有过瞬间的冲动。但是，当某些地方失败的威胁已经酿成，当一切先前曾经使用过的手段和办法都已无补于转机之促成，或者未见成效时，那他就会毫不动摇地采取断然措施，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出现在第一线的战士中间。”①

在伊尔内克什和别尔季纳亚旷地，在斯卢托克和罗德尼卡都曾有过这种情形。在那些地方他总是处身在火线上。战士们总能见到总司令那穿得已经发白了的皮夹克和破旧的士兵帽在他们前头晃动。他的好几匹坐骑都遭过枪弹，但总司令始终安然无恙。从他那灰色的微微眯缝着的双目中透露出来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惧怯，他的言辞依然如平素一样，是那样地沉着，那样地坚定。

考察队在四次荣获勋章的巴什基尔的首都乌法作了停留。

我们是通过横跨在美丽的阿吉盖尔河②上的新桥进入市区的。左侧的沿岸陡坡上耸立着一尊骑在马背上的无畏的萨拉瓦特·尤拉耶夫的塑像，紧接着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为纪念巴什基尔和俄罗斯合并400周年而建造的“友谊”碑。

战后我曾多次来过乌法，走遍了整个市中心，但还从未自西向东穿越全城。可是，如今这乌法正就是顺着这个走向

① 《乌拉尔》杂志，1977年，第2期，第171页。

② 巴什基尔人对别拉亚河的称谓。

在蓬勃地发展，所以也只有在这一路的行程中才能得到这是多么大的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完整的概念。

我们的汽车在铁路桥以北，沙克沙车站前面乘渡轮过了乌法河。

考察队共青团小组长瓦列里·盖尔特很有兴味地问道：

“布柳赫尔当年攻打过乌法没有？”

“要是10年前，我就肯定地说：没有！可今天我开始怀疑起来了，”伊·费·普洛特尼科夫教授答道，似乎猜透了什么，他微微一笑，“你们瞧，就连沙克沙也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了。可这里，在1918年那时候，还是费奥多尔·万德舍夫这位‘迂回将军’的红色哥萨克部队出没的地方。时间虽说不长，但车站还一直在他们控制之中……”

在伊格利诺，探索家们在区执委会和村里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大楼上砌着的纪念牌上读到了这样的铭文：

“1918年8月，红色游击队在传奇式统帅瓦·康·布柳赫尔指挥下经过战斗通过了伊格利诺车站”，“1918年8月，由瓦·康·布柳赫尔指挥的红色游击队各支队与哥萨克白军在这里发生激战。

以米·卡尔梅科夫命名的兹拉托乌斯特‘探索’小分队旅游同人谨志。”

此后，考察队的几个领导同志和伊格利诺区执委会主席沙穆尔·穆尔塔济诺维奇·艾达罗夫、区委书记尼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普罗斯库里亚科娃举行了座谈。他们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本地区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有趣的事情。这些前景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城市型的集镇伊格利诺将成为共和国东部边疆区的首府。

沿着当年乌拉尔混成部队的道路所进行的两次科学考察前后相隔有20个年头了。当然，参加的人员也都已各奔东西了。乌拉尔“铁流”的许多老同志已经无法跟我们再一起进行这后一次的行程。我们只能到他们的住地去拜访他们，而且即使这样做，尚健在的同志也已经寥寥无几了。因此，我们是尽力做到一个不漏，要跟每一位都谈谈话，要记录好有关他们年青时代战斗生活中的各种事迹。

1977年的考察队成员在整个漫长的旅途中了解到有关当年第一批响应召唤奋起斗争的战士们的儿辈和孙辈的许多佳音。在克拉斯诺乌索利斯科耶这个巴什基尔加富里斯基地区的中心，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区委员会书记鲁芬娜·苏霍鲁科娃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古老的玻璃厂里卡尔梅科夫、卡拉什尼科夫、赫列斯特金时期红色游击队员和工人中青年代表的突击劳动状况。其实鲁芬娜本身也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她的爷爷米哈伊尔·杜布利斯托夫是“克拉斯诺乌利斯科耶共和国”总司令米·瓦·卡尔梅科夫部队的一名最勇敢的机枪手。

还有里沙特·萨利霍维奇·伊斯马吉洛夫，拜吉利季诺中学的校长。他是贫农的儿子，曾慷慨地把准备用来建造新房的木材无偿地送给红色游击队员修桥。他在布列斯特要塞迎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并在那里参加了名垂千古的要塞守备部队的行列。

祖国以卫国战争勋章表彰这位士兵的战功，以“荣誉勋章”表彰这位乡间学校教师多年来的辛勤劳动。里萨特·萨利霍维奇因教学工作出色，对年青一代的生产技能训练和英雄爱国主义教育做出了成绩而获得过5枚苏联国民经济成就

展览会的奖章。他在学校里还办了一个地志博物馆，那是他的骄傲，是共和国内办得最好的一座地志博物馆。从它的展品和资料中可以看到拜吉利季诺村在苏维埃年代的整个历史状况。

再看看俄罗斯联邦的这位功勋中学教师的那些孩子吧！里沙特·萨利霍维奇的大孩子中有两个副博士，两个研究生，他的二女儿和小儿子在乌法读大学。苏维埃政权为伊斯马吉洛夫的儿孙们创造了多么好的条件呀！

离开拜吉利季诺之后考察队到了红戈里卡村——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努里马诺夫斯基地区的中心。它的整个领地在1918年9月几乎全都成了3天激烈交战的战场。在当地居民支援下修建起来的乌法河大桥对于红色游击队打赢这场交战，最终摆脱白卫军的夹击帮了大忙。

1957年为旅行者们作向导的是村里的老住户加济兹·沙拉富林。那一次他讲述道：

“穷人们对游击队的来到欢欣鼓舞，每人都尽力给以招待，都想出力做点有益的事情。当大家知道，布柳赫尔下令要在乌法河上架桥时，所有能干活儿的人都到岸边去了……这座桥修了3天。起初木料缺乏，后来终于找齐了。居民们主动把旧棚子、澡堂、披屋全都拆了……”<sup>①</sup>

20年后，卫国战争时期的老同志、教师和热情的方志学家奈利·扎库阿诺维奇·萨法罗夫把参加那一次旅行的人带到村子北边附近缓坡度的沙岸上，在方尖纪念碑前停留下来，他对我们说：

<sup>①</sup> 《游击之路》，第92页。

桥就建在这里。在游击军（我们有300名老乡也跟着队伍一起）从桥上过河之后，随手就点火把桥烧了……可现在我们有了一座那时候连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新桥。桥址不算太远，就在帕夫洛夫卡，是顺着水电站的拦洪坝架设的。而在拦洪坝和闸门之外伸展着一片大海。那就是我们的乌法海！一直延伸出去足有40公里，直到卡拉伊杰利。那地方，真美呀！……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一度曾把我们这里叫作俄罗斯的瑞士，而现在则变得更加秀丽了。

1918年9月4日夜间，红戈尔卡四周万籁俱寂。火炮不再轰隆了，机枪也不响了。似乎这里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游击队员突然向北折去，离喧闹的乌菲姆卡越来越远了。总司令率领自己的团队走过深藏在偏僻的、无人居住的森林之中的一座又一座乌拉尔小村，这些村落都是处在谁的势力都及不到的地带。

到第5个昼夜乌拉尔混成部队的先遣队进入阿斯基诺村，实际上，抵达这里之后，那传奇式的1500俄里的游击奔袭应该说也就完成了。

如今，阿斯基诺是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最北边的一个地区中心。考察队在这里受到了特殊荣誉的接待。在进村之前考察队的成员被作过专门打扮的欢迎人群团团围住。在我们乘坐的很讲究的汽车前方有4名骑手，头戴尖尖形的头盔，身上穿着“翻转过来”的军上衣，各骑着一匹漂亮的马在奉献骑术。呈三角形排列的摩托车队跟在他们后面缓缓地行驶着。共青团地区委员会书记马拉特·萨利莫夫坐在头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一面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区组织的团



旗在他头顶上飘扬。

在中心广场的列宁纪念碑旁举行了一次集会。由阿斯基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帕尔舒京宣布开会。几位地区劳动者代表致了欢迎辞。少先队员朗诵诗作，赞扬为苏维埃政权而献身的战士，点出了第一批国家元帅布柳赫尔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图哈切夫斯基统帅的英名在这一带，在巴什基尔的北方也是家喻户晓的……

在阿斯基诺逗留两天对于考察队的学术领导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普洛特尼科夫是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的。他是当地出生的人，是乌拉尔混成部队的一位志愿者的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爷爷也曾在混成部队里，后来又在东方面军步兵第30师战斗过。当然，这位历史学家无论是成年累月专心致志地在收集有关乌拉尔红色游击队的资料时，还是以后当他写那部《万人英雄记》的著作时，都是常常缅怀两位老人的。

……阿斯基诺人把考察队员带到了秋伊诺-奥泽尔卡，就是1918年9月12日维克多·鲁夏耶夫的游击队侦察组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杰特金的比尔斯克第1旅的几个红军连队，同真正的工农红军的第一批分队相遇的地方。

在伟大十月革命60周年前夕，到1918年的那些故地去旅行不仅能在我们眼前再现出英勇的苏维埃武装力量光辉史册的最初篇章中的一页，而且能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刻地理解照列宁的说法在那些革命的整个命运明显地摆在一张地图上，当一切都取决于喀山—乌拉尔—萨马拉战场的胜利的时候，这一次的传奇式远征意味着什么①。

---

①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133页。

乌拉尔的红色游击队，在54天内走了150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翻山穿林过沼泽，一路上经历了20多次战斗，歼敌7个团，把白卫分子和外国干涉者的后方搅了个不得安宁，配合了东方面军各部的进攻①，终于使喀山、辛比尔斯克、萨马拉获得了解放。

现在让我们来查看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大事记第6卷，包括其自1918年7月底至1919年3月18日（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这一段将近8个月时间的生活和活动。当翻到第136页时，我们会读到足以证实伊里奇是多么关怀国内战争前期的一批英雄人物的段落。

“9月19日

……列宁和乌拉尔省苏维埃和俄共（布）省委委员A·П·斯蓬德谈到南乌拉尔游击队总司令瓦·康·布柳赫尔。他的数以万计的军队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1500公里远征，那是在乌拉尔山地，从奥伦堡到昆古尔，在白卫分子和外国干涉者大后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远征，他们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和红军正规部队会合。列宁请斯蓬德当天就送一份有关布柳赫尔简历的材料给他。

列宁从斯蓬德写的材料中了解了布柳赫尔，那个材料介绍了布柳赫尔参加消灭杜托夫叛军，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部队，在所有情况下他的战略计划都很成功的情况。俄共（布）乌拉尔省委和省苏维埃在信中给布柳赫尔和他的部队请功，要求给他们授予最高奖赏②。

---

① 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7卷，第68页。

② 《弗·伊·列宁生平大事记》，第6卷，第136页。

由于成功地领导了在敌人后方的远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9月28日发布专门命令，授予布柳赫尔以刚刚设立的红旗勋章。命令指出：“将第1枚勋章授予布柳赫尔同志。”<sup>①</sup>

---

<sup>①</sup> 引自瓦·伊·崔可夫的文章：《英雄们永垂千古》，载《真理报》，1980年11月30日。

## 同红军老部队在一起

在乌拉尔生活的岁月里，我几乎走遍了它的所有城市和较大的村镇，因为这些城市和村镇或多或少都与我父亲在年青的苏维埃国家的武装保卫者队伍中的战斗活动有关。

昆古尔对我来说格外亲切。乌拉尔混成部队总司令在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之后就是在这里首次会见东方面军第3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津的。

集团军司令员爽直地说：“无须隐讳，形势相当危急。敌人正在逼迫我们。集团军司令部手上没有任何预备队。师长们一直在要求增援。我答复他们说：‘我们无力支援你们。我把希望寄托在布柳赫尔的部队。’<sup>①</sup>这会儿你们和我们会师了。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游击队同第4乌拉尔师各部合并，确定由您出任师长。”

这次谈话是星期五进行的；第二天，星期六，宣布1918年9月21日是昆古尔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日子。据师报《革命哨兵》报道，“今天，在昆古尔是红军的节日。以布柳赫尔为首的乌拉尔工人和哥萨克劳动者，这些革命英雄们正好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来到这里……大家都到街头来！大家都来为庆祝我们红军的青年战士、庆祝红军的优秀分子——布柳赫尔的队伍的到来欢度节日吧！”

---

<sup>①</sup>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76，类号4，案卷号44，页次54。

节日的休憩是短暂的。就在当天晚上，新师长便签署了一份战斗命令。

他对曾一起经历过远征的游击队战友们说：“红军同志们！……你们突围出来与我们的战友会师之后，本来理应有权好好休息一下，但遗憾的是在我们来到昆古尔市地区之前，对于在这个地区作战的我军来说，形势变得极其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顾疲劳，为了拯救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必须立即进入阵地的缘故……不管敌人为我们准备下了怎样的战斗考验，我们是一定能光荣地经受住的……”

这一命令中还有针对第1和第2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团讲的话，在此之前全师实际上就由这两个团编成，命令指出：

“从老4师编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战友们，由于前些日子的挫折，情绪有些低落，但我相信你们会忘掉这些艰难的日子，在协调一致的攻击中一定能够击溃冒险妄为的敌人，也一定能够消灭资产阶级雇佣兵……”<sup>①</sup>。

我对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怀有特殊的感情。叶卡捷琳堡失陷之后，年青的红军团在东线北段夺回的第一座城市便是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自游击部队编入之后，第4乌拉尔师成了生机勃勃的真正有战斗力的工农红军兵团，这一光荣的胜利便是这个师的战绩。

伊万·肯索林诺维奇·格里亚兹诺夫的第1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团为这一胜利奠定了基础。他的战士们在白卫军的战斗队形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进攻的第一天，昔日的游击队员，以斯捷潘·拉辛命名的第1奥伦堡社会主义哥萨克

---

<sup>①</sup> 《历史档案》杂志，1958年第1期，第85—86页。

团的骑兵们在亚历山大·叶尔莫拉耶维奇·卡尔塔绍夫率领下深入敌人后方，解放了上、下谢尔金扎沃德的几个村落，从而大大便利了步兵部队向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的推进。

在某种特殊场合彼得格勒共产主义自行车连可作为预备队使用。当需要从两侧控制铁路线时，师长便把这个连投入战斗。自行车连的战士们完成了命令规定的任务，在一昼夜多的时间内击退了敌人多次猛烈的冲击，然后撤出阵地，又突然出现在城市东郊。与此同时步兵战士从西郊突进过来。

1918年10月2日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重又回到了苏维埃的怀抱。这一消息传遍了正处于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各条战线紧紧围裹之中的整个苏维埃俄国。

……在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在列宁图书馆、在乌拉尔，至今都仍保存着登载攻克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消息的报纸合订本。在这些报纸的头版版面上我读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授予父亲刚刚设置的第1号红旗勋章的决定。

让我们再回到昆古尔来吧。1918年11月11日，在这里，按照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工农红军实行统一编号的命令，第4乌拉尔师得到了步兵第30师的番号。作为苏维埃武装力量著名的兵团之一，这个师正是以这个番号载入史册的。

3天以后，11月14日，第30师占领了乌尔曼斯科耶村，随即逼近了莫列布工厂。争夺这座工厂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敌人未能顶住逼攻。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贺词中说：“我们高兴地得知，乌拉尔第1团和博戈亚夫连团共同努力击溃了敌人，拿下了莫列布工厂。你们真不愧是乌拉尔之鹰！你们可以自豪

地说，你们完成了革命所赋予的责任。你们的勇敢顽强精神将成为集团军其他部队的榜样。

军事委员会以革命的名义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sup>①</sup>

这份贺词虽说是发给全师的，但应该说首先是给游击奔袭英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帕夫利谢夫指挥的第8旅各部的。

父亲决定亲自去向老战友们转达他的以及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祝贺。军马在奔驰。突然师长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差一点儿从马鞍上跌落下来。他浑身无力，脸色发白，由传令兵护送着艰难地返回师部。

旧伤口又开裂了。师长拒绝住院治疗，他请求集团军司令员准予他短期休假，以便到已经阔别多年的巴尔欣卡去走一趟……

而1979年，我也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去了父亲的故乡。当时我正和杜比宁教授一起在雅罗斯拉夫尔出差，州委的同志们邀请我们务必要到巴尔欣卡去看看，这就是后来的苏联元帅1890年11月19日（旧历）的出世之地。

那是多雨的十月。道路泥泞难行。从雷宾斯克到地区腹地只能乘坐越野车……巴尔欣卡有一多半人跟我们同姓。村里的墓地也葬着许多姓布柳赫尔的人。我在祖父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墓前低头默哀，还从坟地上取了一撮土留作纪念。在堂姑妈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里见到一张过去在哈巴罗夫斯克拍的照片，站在祖父和父亲中间的就是童年时期的

---

<sup>①</sup>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346，类号2，案卷号639，页次81。

我。然后我们还参观了谢列德尼奥沃中心村。那里仍保留着父亲当年在那里受过正式教育的教区小学的房屋……

让我们再回到战斗的1918年去吧。父亲于12月中旬返抵前线。他既没有好好地歇息，也没有彻底康复。把年迈的双亲留在家里，由他们独自负担供养父亲的两个妹妹亚历山德拉、伊丽莎白和一个弟弟帕维尔。

师里的情况令人不安。新的敌人高尔察克开始进攻了。他们在兵力上几乎超过我军两倍，迫使我部放弃了昆吉尔和彼尔姆。

但到1919年1月下半月步兵第30师已经使敌人遭到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在奥切尔斯克工厂附近的战斗中伊万·格里亚兹诺夫的第1旅击溃了高尔察克的禁卫军。随即伊万·帕夫利谢夫的第3旅发起猛攻，占领了内特文斯基工厂，并一鼓作气把高尔察克匪帮撵过了卡马河。尔后，伊万·卡希林和尼古拉·托明的两个旅的团队同时出击。白卫军全线溃退了。

当时正在第3集团军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们是这样表彰步兵第30师的英勇精神的：“向你们师的光荣战士致以兄弟般的祝贺，是你们粉碎了我们俄罗斯的敌人的好几个突击营。”

1919年1月31日，父亲被任命担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员。临离开之前他去了内特瓦第3旅的司令部。他们用稀粥和胡萝卜茶举行隆重的宴会欢迎师长。大家没有说多少话。内特瓦是个小城市，但还是找到了一名专业摄影师。饭后大家走到室外，在摄影机前照了相。

父亲居正中位置，在他右边是伊·谢·帕夫列谢夫旅长、瓦·安·祖博夫团长和米·弗·卡尔梅科夫团长，左边第1个



是第1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旅的旅长伊·卡·格里亚兹诺夫；在新任集团军副司令员腿前就地而坐的是米·德·戈卢贝赫，游击队奔袭之后他当了第3旅的参谋长。就是他把这张在内特瓦摄下的很值得纪念的相片一直保存到现在，至今已有65年历史了。

从三十年代起我就记得基洛夫市(从前是维亚特卡市)。当我们从远东去首都或者从莫斯科返回远东时，列车总要长时间地停在那个古老的一层楼的车站上等待调换机车乘务组。比起其他车站来，我更喜欢在这个站上散步。在主站台上烟火玩具出售，那是很有名的。从五彩缤纷的售货亭跟前我是从来不曾空着手离开过的……

刚刚庆祝过自己600周年诞辰的这座古老的俄国城市如今又迎来了第二个青春时期，但在今天飞速发展的基洛夫市十分珍惜地保留着从前的以木结构为主的省城维亚特卡的许多遗址，它使人想起赫尔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科罗连科和格林……在从前的奥尔洛夫大街(现在叫共产主义大街)上一座独门独户的院宅(门牌16号)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房屋正面钉上了纪念牌，上面写有：“杰出的统帅、苏联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曾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和工作过。”

“……生活和工作过”，在那样严峻的时刻，也许这几个字把意思表述得未必那么确切。说得更真切一些应该是：

“偶尔在这里休息一下……”集团军副司令员从4月份起还兼任维亚特卡筑垒地区要塞司令的职责，他的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建造纵深配置的防御地带，为前线准备新锐的补充连和后备部队。而整个3月份他几乎都是在餐风宿露中度过的。

盖达将军的西伯利亚集团军在苏维埃第2和第8集团军阵地间的接合部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父亲立即动身上了前线。他以坚决有力的行动制止了步兵第29师各部的后撤，继而保障了尼古拉·托明和伊万·帕夫利谢夫两个旅冲出包围圈，并把第30师的其余团队汇集到一起，以使其战斗力得以充分恢复。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手里还有一支部队，他特别关怀这支部队的作战状况，常常为之焦躁不安，就象为他的亲生孩子一样操心操劳。

2月初，在雷宾斯克组建的步兵第61团从伏尔加河上游，按当时的概念是从大后方来到维亚特卡。这个团的精神政治素质很强，很坚定。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司令员在1918年底视察这支新组建的红军部队时曾指出过这一点。关于这次雷宾斯克之行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第61团的士气相当好。近期工作进展如此顺利的原因是新来了一位政治委员，以及有8位从区兵役委员会训练班回来的同志工作很努力。”<sup>①</sup>

集团军副司令员受到这支老乡队伍的欢迎。副司令员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宣布他们这个团要有一段时间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

他对雷宾斯克人说：“我知道，你们急于奔赴前线，也知道你们的工农觉悟程度很高。这很好。可是现在只凭这一点已经不够了。需要你们在军事训练方面也成为全集团军最优秀的部队。这也正是我们赋予你们红色之鹰助导者重任的

---

<sup>①</sup> 《雷宾斯克市历史文件和资料集》，雅罗斯拉夫尔，1977年，第196页。

缘由。”

第1农民共产主义步兵团（后来是第253团）在塔吉尔的防御战中起了主导作用。它的坚毅精神不仅决定了师（该团所在的师）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整个战线的命运。团队没有动摇，坚持下来了。为了表彰这个团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出的功劳，在第3集团军各部中它首先荣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的荣誉红旗。在荣膺这一崇高的奖赏之后，全团官兵便赢得了一个响亮而光荣的称号：红色之鹰。

雷宾斯克人同身经百战的英雄们并肩战斗产生了良好的效果。1919年2月底3月初，他们经受了战斗洗礼。这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第3集团军司令员看出左翼特别旅对敌人的进攻毫无效果，2月25日便从自己的预备队中抽出第61雷宾斯克团交由特别旅指挥。

第2天，雷宾斯克人就到了前沿，并于2月26日傍晚把高尔察克分子撵出了沃斯克列先斯科耶村东南的两个村子。在第一次战斗中他们伤亡近100人，但士气没有衰退。第61雷宾斯克步兵团继续进攻。3月5日凌晨，战士们攻占了克拉维茨以南敌人的坚固筑垒阵地。

布柳赫尔在给雷宾斯克团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步兵团的行动，其英勇无畏、勇猛冲杀和钢铁般的顽强精神令我钦佩。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你们卓有成效地工作的结果。我以雷宾斯克老乡的名义，以集团军副司令员的身分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同乡的祝贺。”<sup>①</sup>

<sup>①</sup> 《雷宾斯克苏维埃通报》，1919年3月12日。

“2—3月间特别旅在科米彼尔米亚克边疆区实施的进攻战斗，其战役战术意义在于牵制了彼尔姆—维亚特卡主要方向上敌人的大量兵力，拖住敌人达1个月之久，保证了对第3集团军业已暴露的翼侧的防御，粉碎了对翼侧实施迂回的企图……”

对整个第3集团军来说，特别旅的进攻战斗乃是我军拥有巨大的摧毁敌人的能力和积极性的一种独特的标志，尽管兵力和兵器都显得不足。这增强了红军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对未来的战斗作好了充分的准备”<sup>①</sup>。

有一次，我到基洛夫市来，读到了弗·费·西夫科夫的回忆录。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是1908年的老党员，二月革命后是丘索夫工厂赤卫队司令部的成员，1918年12月领导了乌拉尔省苏维埃的一支特别部队。1919年春季高尔察克分子的新攻势迫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注在东方面军后方建立纵深梯次防御地带的问题。当时作出了建立维亚特卡筑垒地域的决议，并确定了由3个人组成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三人委员会的主席是瓦·康·布柳赫尔，С·А·诺沃肖洛夫和弗·费·西夫科夫任委员。

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讲述道：“我第一次同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见面时，心里怀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戒备感。我想，集团军副司令员是英雄……他会怎样对待我？在共事中我们的关系将如何处？但只过了几分钟我的疑虑就烟消云散了。我们如同故友坐着喝茶，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

---

<sup>①</sup> С·И·克萨列夫、А·Н·科罗廖夫、С·П·皮丘戈夫：《特别旅（历史特写）》，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2年 第88页。

在以后的相处中我们之间一直是无拘无束、坦诚相见的。”<sup>①</sup>

在城外挖了战壕，构筑了炮兵阵地和机枪阵地，维亚特卡广场则变成了练兵场，老老少少都在这里进行操练，练习持枪动作，学习射击和白刃格斗的技巧。

据老同志们说，父亲在指挥方面向来是很自信的。但在这里光这一点本事就不够了，要证明自己还是一个能干的而且是懂行的筑城专家才行。这就得重新学习。筑垒地域司令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在那里搜集军事工程方面的书籍，常常读到深夜。天一亮便翻身上马，到各处去跑，直到10—12点也不离马鞍。他跑遍了正在修建防御地线的各个地段，一切都要亲自检查，要求最好地利用指挥高地，关心视界好不好，射界宽不宽，而且还注意到伪装是否可靠，是否巧妙。

然而就在这种紧张而严峻的日常工作氛围中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喜庆日子。一个非同寻常的邮包从战地军邮局寄到了维亚特卡。邮包里装着“第1号”红旗勋章。1919年5月11日给第3集团军发布命令，为表彰1918年夏季和秋初在敌人后方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奔袭，特授予瓦·康·布柳赫尔以红旗勋章。

弗·费·西夫科夫回忆说：“在授予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勋章之后，С·А·诺沃肖洛夫和我，我们两个筑垒区军委会的委员跑到瓦·康·布柳赫尔的办公室，再次对他荣获最高奖赏表示祝贺，称许他的功绩，同时还请他到我们的住处去吃晚饭（我和诺沃肖洛夫住在一起，生活上要比布

---

<sup>①</sup> 《粉碎高尔察克（回忆录）》，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9年，第189页。

柳赫尔过得强些)……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起初对我们的邀请表现出有点为难和犹豫不决,后来他红着脸不大客气地说道:

‘我的同志呀,朋友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不要赞扬我……我们这又不是在开大会……可要注意呀!’接着又温和地说,‘你们这顿晚餐本来应当等到彼尔姆或者叶卡捷琳堡去吃,可我怕东西会馊掉……那就照你们的意思办吧’。

于是,他在我们面前又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很随和的人了。他的眼睛透亮,脸上泛起一片善意的微笑。”①

在彼尔姆州地志博物馆陈列的国内战争的早期展品中有一部已经很陈旧的休斯式电报机,它的黄铜零件都已经发黑了。1919年,这部机子一直在第3集团军司令部里,而且一直在连续不断地使用。得知这一情况,我想,集团军副司令员和维亚特卡及彼尔姆筑垒区要塞司令对这部电报机肯定是很熟悉的。这部机子接收过许多来自莫斯科、来自东方军司令部(辛比尔斯克)的紧急电报。许多电报都是以“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的签署结尾的。布柳赫尔,也跟集团军司令员一样,常常直接从电报纸条上收读到列宁的这些命令、要求、指示和建议。因此他能够理解所有这些都是在至关重要的,是必须立即付诸执行的。

1919年7月1日,休斯式电报机又敲出来一份由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伊·列宁签署的同时发给东方面军第3和第2两个集团军的电报:“我祝贺收复彼尔姆和昆古尔的英雄红

---

① 《粉碎高尔察克》,第191页。

军。向乌拉尔的解放者致以热烈的敬礼。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事业迅速地进行到底。极端需要把新解放的乌拉尔各工厂的工人马上全部动员起来。要设法用新的革命方法立即把这些工人编入军队，以便调往南方和使疲劳的部队进行休整……”<sup>①</sup>

遵照领袖的新指示，集团军司令员谢·亚·梅热尼诺夫为了加强第3集团军正在神速进攻中的部队的后方，并为各部队迅速准备好预备队，立即在卡马河两岸开始组建彼尔姆筑垒区，并把筑垒区的指挥托付给了自己最亲密的助手瓦·康·布柳赫尔。

父亲来到彼尔姆之后，立即对工人展开了普遍的军事训练。为了响应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团结起来去战斗！”的号召开始了一场群众性的志愿参加红军的登记活动。

新筑垒区要塞司令以他个人素有的高度严格的要求，认真而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直接责任，但他的心思却飞到东部战线去了，飞到集团军第1梯队各部实施进攻的锋尖上去了，他抱怨自己在这样一个不可多得时刻却留在了大后方搞即使从防御角度来看现在也已经不会再需要了的工事构筑。

老同志给我讲，为了不丧失军事指挥员、集团军副司令员的素质，父亲以极大的兴趣仔细地分析了苏维埃军队的昆古尔—彼尔姆进攻战役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他知道，这次战役最复杂的阶段是强渡卡马河，而要使强渡实施得万无一失，第3集团军的广大红军战士首先要有高昂的进攻士气，

---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02页。

指挥员的指挥艺术要提高，其所属各部队和分队要搞好战斗协同，提高本领并发挥主动性。

这一次，主要战功属于解放了彼尔姆的步兵第29师，但第30师和特别旅各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为了从整个西乌拉尔迅速而彻底赶走高尔察克分子，以自己的果断而奋不顾身的翼侧行动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雷宾斯克老乡同样表现不凡。特别旅第61团在前出到科索戈尔村以西的丘索瓦亚河后同敌人的由江河区舰队支援的后卫部队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在这一地区红军有几个营还同所谓“不列颠”师的海军步兵遭遇上了。

在争夺彼尔姆期间，白军指挥部为了恐吓红军战士，还竭力散布谣言，说有大批用最新技术兵器装备起来的英国军队开到前线来了。为了“证实”这一点，高尔察克的几个团换上了缀有英国等级标志的英军制服，乘上船，装作登陆队开到前线的重要地段上来。

7月6日拂晓，第61团占领上丘索沃伊戈罗德基之后对在瑟尔瓦河西岸设防的白军后方的通路造成了威胁。高尔察克分子一边设法抵挡这意外的打击，一边连忙仓促地将几个“英国人”的营转移到丘索瓦亚河边去。在江河区舰队炮火支援下，海军步兵又转入了反攻，迫使人数不多的红军连队向科索戈尔村撤退。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特别旅旅长马卡尔·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命令第22基泽洛夫团出发到上丘索沃伊戈罗德基去支援雷宾斯克人，阻止海军步兵的前进，然后把他们打退到丘索沃伊市去。冲击是在正面几乎达到10公里宽的地段上展开的。第61团后备营适时地补充到左翼起了重要作



用，这就保证了对我有利的决定性转折。

第二天就完全击溃了“不列颠”海战师。说句公道话，英国军队在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集团军中是有的，但数量不多。在白军的卡马河区舰队编成中只有两艘配置有英国军官和水兵的武装船：“肯特”号和“萨福”号。他们中间还有英国《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他当然清楚白军搞伪装的企图，在海军步兵师被击溃之后他给历史留下了这样的供词：“尽管听起来多么离奇，但让一些白军部队穿上漂亮的英国军服反而促使红军更加勇猛地去作战，他们就是要抓住那些占领者。”<sup>①</sup>

特别旅各部接二连三地收复了中乌拉尔的一座又一座采煤矿厂。第30师的几个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工矿区的心脏——叶卡捷琳堡突进。前线的胜利使大家欢欣鼓舞，但集团军司令员意识到这一阶段所做的一切离开把“事情尽快进行到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他抱怨高尔察克的春季攻势妨碍了有组织改建工程的完成，而进行这一工程的命令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早在1919年初就已签发了。集团军内继续保存着类乎特别旅和北方特别远征支队这样的独立作战部队。在防御战斗时期，它们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但现在，当准备向外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广阔地带进行解放进军的必要性充分显示出来的时候，为了保证准确而有效的战斗指挥，把它们合并成更庞大的兵团的必要性随之也就更加明显了。

还在维亚特卡时父亲就知道了1919年7月5日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让他直接参加组建新的步兵第51师工作的命

---

<sup>①</sup> A·M·斯皮林，《粉碎高尔察克军》，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第202页。

令。集团军副司令员当时曾立即向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声明，他准备接受新组建的兵团首长的职务，但他的请求当时没有受到重视。

新建师被列入建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但直到7月27日集团军才知道新师的诞生已正式成为事实。谢·亚·梅热尼诺夫当天就宣读了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他的助手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为步兵第51师师长的命令。

怀恋火热的战斗生活的父亲愉快地离开从1919年7月底起就成了大后方城市的彼尔姆，到中乌拉尔首府去了。

1919年7月14—15日夜晩，弗拉基米尔·阿津和格奥尔吉·奥夫奇尼科夫的步兵第28和第21师的几个团首先开进了叶卡捷琳堡。第30师的路程更长，它的部队7月30日还在上伊谢茨科耶人民剧院的大楼前阅兵呢。就在当天凌晨，新任命的第51师师长来到这座城市，在这里的莫斯科城广场<sup>①</sup>上，他亲眼见到了他的老部队进行的那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阅兵式。

在叶卡捷琳堡开始组建新的工农红军兵团——步兵第51师。在波克罗夫斯基街和齐赫文斯基街拐角处的一幢大楼里，拨给了几个房间做司令部<sup>②</sup>。在这里迎候父亲的是老熟人，从前维亚特卡省的军事委员С·И·马雷金，现在被任命担

① 现在是乌拉尔公社社员广场，广场中央的小公园里，在为苏维埃政权牺牲的战士墓地上于1959年建立了方尖碑，并点燃了名垂千古的火炬灯。

② 现在是马雷舍夫大街和霍赫里亚科夫大街拐角处的楼房，墙上钉有纪念牌：“1919年，在这里住过参加粉碎高尔察克军队的工农红军部队。”

任师的政委。他介绍了第3集团军当面的一般情况，特别强调了左翼部队（北方远征支队和特别旅）在战斗行动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马雷金强调指出：“北方远征支队和特别旅的几个团打得不错。他们离秋明已经没有什么路程了。看来，我们在那里能赶上他们……”

师长非常了解编入北方远征支队和特别旅所有部队的诞生历史、战斗道路和作战特点。远征支队是由维亚特卡省志愿者和经动员的公民合成的第1北方团和第9特别护路团组成的。护路团的战士们在冬季要保障从维亚特卡到科特拉斯地段上军用列车运行畅通。特别旅拥有4个久经考验的战斗团：第21穆苏利曼团、第22基泽洛夫采矿团和第23上卡马团，他们吸收了彼尔姆矿场和矿山的矿工、乌索利斯基和切尔登斯基县的工人和贫苦农民，而在库迪姆卡尔地区又补充了许多科米彼尔米亚克人。

至于特别旅的第4个团——第61雷宾斯克团，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雷宾斯克老乡在防御时坚不可摧，而在进攻战斗中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父亲的战友们给我讲，在叶卡捷琳堡度过的那段时间在许多方面跟他一年前在万人乌拉尔混成部队从合围中突围出来后所经历的日日夜夜很相似。他奔走于各种机构之间，从不好商量的管理处长和集团军监察员那里去“掏出”弹药和被服，食物和药品来。可是，每到夜间整天忙碌带来的疲惫居然会顿时消失无遗。这消除劳累的制剂便是电报。来自前线的那些报告和情报传来了愉悦人心的令人无比兴奋的激动。集团军各部继续向东胜利挺进。这一切使人感觉到高尔

察克分子是守不住秋明了，新编师的各团将首先打开通往西伯利亚的“大门”。

8月6日师长一整天都呆在叶卡捷琳堡车站的军用平场上。载着第10莫斯科团、第1和第2维亚特卡要塞团的军用列车从彼尔姆一辆接一辆地开来，他们是去补充新编师的员额的。他们没有得到卸载的命令。师长预先已经同铁路员工商定好立即将它们发往秋明方向。他在把得到的全部贮品装上暖车和车厢之后，自己也随同最后一趟军列离开了中乌拉尔的这座主要城市……

在中乌拉尔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我经常到秋明去出差。有时坐不上快车，而普通客车那时候几乎是有站必停。但我并不抱怨，倒反而为此感到高兴。

1919年8月15日，在波克列夫斯卡亚（现名塔利察）车站父亲给步兵第51师各部签署了第1号命令，命令确定了师的组织编制为3个旅，9个步兵团，各团番号从第451团至第459团。特别旅是这个工农红军新建兵团的基础。它不仅给师里输送了战斗力最强，并在战斗中经受过考验的步兵部队，而且还有通讯营、工程营、轻炮兵连和装甲汽车队；命令还规定将特别旅的司令部、政治处、供应处和其他专业部门原封不动地改编为步兵第51师相应的机关和部门。这就使大家对新建兵团能比较容易地度过组建阶段有了信心。

尤沙拉、图古雷姆、波德伊奥姆3个车站是第51师第1和第2旅的部队协同一致击溃在铁路沿线一带作战的白军集团的地区中的几个要点。这两个旅把白军远远地撵到东南方向去了，这就为红军各团队于1919年8月8日傍晚进入秋明

市内创造了条件。深受白卫叛军384个昼夜野蛮统治之苦的秋明劳动者热泪盈眶地欢迎自己的解放者。

翌日，8月9日集团军各报上都刊登了东方面军红军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是这样开头的：“敬爱的同志，我们的久经考验的英明领袖：你命令我们在冬季之前拿下乌拉尔，我们完成了你的战斗命令。乌拉尔已属于我们。现在我们正向西伯利亚推进……乌拉尔再也不会落入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敌人之手了。我们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这一点。”<sup>①</sup>

近20年来，秋明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它已成为西西伯利亚石油边疆区的中心了。在秋明的中心街道——共和国大街上一座座设备完善的美丽的现代化建筑物拔地而起，昔日被认为是富丽堂皇的一幢二层楼房（门牌18号）现在看来就显得十分地土气了。但它并没有失去原有的革命历史荣耀。纪念牌上写着：1919年8月，这里曾是步兵第51师师长在秋明的师部所在地。这块大理石的牌子吸引着许多来访客人的注意。现在秋明人在这所房子里筹建了全国第一个瓦·康·布柳赫尔纪念博物馆。

还在波克列夫斯卡亚车站时，师长就接到了集团军司令员下达的第一个战斗任务：前出到托博尔河畔，并准备强渡过河。师长将第8旅留作预备队，把指挥这个旅的责任委托给参谋长，自己则在传令兵的簇拥下向秋明疾驰而去。几个先行旅还没有走得很远。师长利用这一机会亲自跟旅长、团

---

<sup>①</sup> 《乌拉尔军区历史》，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0年，第84页。

长、政委和参谋长们见了面，还到许多营里看了看，了解了全体人员的情绪和要求，并于8月20日给步兵第51师下达命令，号召各部队加强团结，彻底消灭高尔察克。

师长和师政委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师的坚强核心上。“各级政治委员和全师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你们对于苏维埃政权现行路线的任何偏离都是负有特殊责任的。我们期望你们协助把全师提高到应有的水平，并希望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我们称职的共事者”<sup>①</sup>。

在着手执行各自的战斗任务之前，几个旅就象一把特大的扇子一样朝各个方向散开，彼此之间一天比一天离得更远。第2旅的几个团朝东北，往托博尔斯克方向移动；第1旅在雅卢托罗夫斯克地区强渡托博尔河之后，顺着林间大路和小径往伊希姆河方向进攻；而第8旅在开进到前线之后配属给了步兵第29师师长指挥。

步兵第51师作战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不久以前对我来说还是首要的一个懊恼的“空白点”。起初总好象没有选定能穿越神奇的第51师经受光荣的战斗洗礼的那些地方作行进路线。只是到了1979年的冬季才打定主意要到那些偏僻的地方去看看，以便把一切都作一番比较，从而能对第51师正式成立以后的作战行动得出更加全面的概念。

我挤出时间决定去托博尔斯克一行之后，便买了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苏尔古特的客车票。车过秋明，我就把脸蛋紧紧贴在车厢的窗玻璃上，希望能看清居民点附近的那些车站，为了争夺这些地方1919年曾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可是，

---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88页。

熟悉一点的站名一个也没有发现。新的铁路干线取的是最短的直线走向。在这里，和全苏重点工程别洛列茨克—卡尔拉曼一样，不论是原始森林还是沼泽地都未能阻挡住我们这一代共青团员。他们在劳动中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完全可以同步兵第51师那些一开始战斗便成为新的传奇人物的英雄们的战功相提并论的。

在托博尔斯克古建筑文物博物馆的科学图书馆里我很有兴趣地翻阅了1919年版的报纸合订本。其中有一份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出一篇《红色雄鹰》的社论。

社论写道：“同志，请不必到天上去寻觅他们，要在地上把他们寻找，因为他们是我们光荣的红军的士兵。

他们从乌拉尔山那边向我们西伯利亚北部飞来……戈罗兹纳亚莫托维利哈、克什特姆、乌法列伊、塔吉尔、卡斯林斯基扎沃德——这就是红色雄鹰飞向我们的路途。

……同志，请不必到天上去寻觅他们，要在地上把他们寻找。他们都是和你一样的人，他们也是工人和农民，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时刻准备当一名红军战士，当一名劳动的军队的战士。”①

《托博尔斯克公社报》是当地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俄共（布）党组织的机关报，在把高尔察克分子赶出城之后第6天就开始出版了。这份报纸开辟了一个“在红色西伯利亚前线”的专栏，每天刊登作战简报。诚然，由于通讯设备欠佳刊出的报道一般说要迟到两周。

“我们的进攻……发展很顺利。在秋明到托博尔斯克之

---

① 《托博尔斯克公社报》，1919年，第4期，9月13日。

河的沿路地区我军在离托博尔斯克70俄里一带占领了许多村庄。

在塔夫达河上我们缴获了一艘‘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敌船，船上有1门3英寸的火炮、3挺机枪，外加全体船员”。这则报道是8月26日发的，但作为消息直到1919年9月12日才见报。

第2旅各部作战果敢、主动。第456雷宾斯克团在托博尔河两岸打赢了艰苦的战斗之后，就在别廖佐夫斯基亚尔和伊耶夫列沃附近顺河而下。当雷宾斯克人疲惫不堪了，第454团的几个营就上去替代他们。就这样，他们在9月1日以前占领了巴切利诺、贝加洛沃、胡佳科沃、库塔巴林卡几个村子和托博尔图林卡的一些蒙古包。接着步兵第455团转入猛烈进攻。9月2日，这个团把高尔察克分子赶出了克列姆涅沃、塔拉图希诺、希什基诺几个村子，并于9月4日夜间在托博尔河口附近开始强渡额尔齐斯河。由И.В.博里亚耶夫指挥的第454团就在同时也来到了额尔齐斯河边。第454团渡河的地点离托博尔斯克更近一些，因此是第一个突进托博尔斯克城里的部队。

师长向第2旅的部队表示热烈祝贺：

“我感谢新组建的第51师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感谢你们首次获得巨大的胜利。使我万分高兴的是我的老乡亲乌拉尔人取得了这次胜利。”<sup>①</sup>

我从《托博尔斯克公社报》的合订本中找到了9月25日

---

① 中央苏军国家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454，类号2，案卷号443，页次5。



的一期，我翻到了它的最后一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下子跳到了10月底。莫不是整个一个月的报纸都没有保存下来？不是的，就期号来说，并没有任何散失。这就是说，这段时间之内报纸没有出版。其中的原因实在非比一般，原来从1919年9月27日至10月22日高尔察克分子重又在托博尔斯克作威作福了一阵。

## 第51师经受战斗洗礼

正如步兵第51师的一位老同志，退役中将康·费·捷列金所证实的那样，东线第8、第5苏维埃集团军的托博尔斯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役实际上已注定了高尔察克叛军的命运，因为就在这延续近两个月的激战中高尔察克阻止红军胜利进攻，然后再求取有利于他的决定性转机的最后一次尝试破产了。

第3和第5集团军各部在几乎整个托博尔河上正实施渡河，突然遇到了白卫军的猛烈抵抗，战役便从此开始。我们的几个师停止前进，继而在敌人优势兵力攻击下开始退却。从库尔干到亚卢托罗夫斯克好几俄里的地区内高尔察克集中了8个步兵集团军，达到3倍于我的骑兵优势，企求为乌拉尔的战败进行报复。虽说有了一点战绩，但不过得逞一时，且远非决定性的成功。

可以确切无疑地说，在高尔察克的反攻过程中，第3集团军各部中处境最困难的并不是步兵第29师，而是刚刚组建的第51师。

的确，在白卫分子的突击下，第29师撤退得比其他师更远，几乎向西撤了有100公里。但这时配属于第29师指挥的步兵第51师的第3旅所受损失最严重。第29师师长及其司令部并不认为第3旅已经形成一个作战整体，因而剥夺了它的一切独立性。先是把它的团分给了各旅，各旅又把这些团

按营打散了，更有甚者，竟至被拆散成连，其结果这个旅实际上也就不再存在了。

第29师的仓卒撤退使第51师第1旅也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由布柳赫尔担任师长的第51师的部队已展开成战斗队形，前出到伊希姆河边，并形成了从北面包围伊希姆市的态势。当敌人把第29师击退到亚卢托罗夫斯克以远之后，它们的先头部队毫不费力地迂回到第1旅的后方，切断了该旅同第51师司令部所在地秋明的一切联系。与此同时，高尔察克分子从侧翼和正面加强了压迫，致使该旅丢弃作战物资和粮秣，从大路退入森林和沼泽地。

第2旅的部队在占领托博尔斯克之后迅速沿额尔齐斯河向上游和下游分别扩展开去，但已无法发展胜利：敌人把江河区舰队从鄂木斯克调到乌斯季伊希姆来了。他们放下第454团的两个营不打，但抢走了它们的全部辎重。随后，高尔察克分子的船只从托木斯克顺鄂毕河开进额尔齐斯河。他们的登陆兵把第455团的几个营从原来占据的托博尔斯克以北的居民点赶了出来，1919年9月27日这座城市再度落入白军之手。

高尔察克刚一接到攻占托博尔斯克，第51师的部队被分割、被包围，他的装载陆战队的船只开始溯托博尔河而上的报告后，便撂下战线南翼的所有紧急事务，急匆匆从鄂木斯克乘船直趋额尔齐斯河下游。正如他的侍从Г·К·金斯后来指出的那样：“海军上将显然已经预先品尝到了这次战役确有把握的胜利的快意了”①。

---

① А·М·斯皮林：《粉碎高尔察克军队》，第236页。

“最高执政”不仅企图彻底消灭年轻的苏维埃师，他还决定做更大的事：占领秋明，深入红军的大后方，对叶卡捷琳堡方向实施突然袭击，并消灭东方面军的整个第3集团军。

看来，刚刚建立的这个师的命运已预先注定了。然而，事与愿违，步兵第51师没有灭亡。虽然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但它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恢复了曾经丧失过一段时间的战斗能力，并在托博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广阔地域独立作战中给敌人造成了毁灭性伤亡。那末，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我是从第一手材料中得到的。在动身去托博尔斯克之前，我终于亲眼看了一遍根据国内战争的各种事件写就的一部很珍贵的著作。我事先知道了书名：《第51彼列科普师的五年战斗与和平生活史（1919—1924）》。我找到了介绍这本书的摘要，但没有能见到这本书。但我想应该能找得到的，结果还真找着了！不是在什么地方，而是就在我们这里，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托博尔人，精通我们边疆区历史的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尔丘戈夫提供的线索。

步兵第51师第453上卡马团原政工人员尼古拉·哈里托诺维奇·马柳京为纪念自己的青年时代把这本书保存了整整33年。只是在从高尔察克统治下解放乌拉尔40周年前夕他才把这本书赠送给了当时的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党史研究所。

我读了第51师战斗生活史的第一部分：《在乌拉尔同沙皇的阿塔曼和将军斗争中》。在第43页上我找到了这样的证

据：“当时（1919年底。——瓦·布·注）的情况对第1旅的部队非常不利，因为他们同第456团，同第454团第1营、第1轻炮营一起陷进了包围圈。”①

是的，他们同师部取得联系的最后线索也失去了。好几天没有收到和第455团一起从托博尔斯克撤退的第2旅指挥部的任何消息。他们可真称得上是走投无路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不论在西面，在秋明方向，也不论在南部，在尤尔加和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一带，高尔察克的强大的阻截队纵然截断了进入森林和沼泽地的所有通道，但还是没有等到任何一个红军连队。白军指挥部于是慌乱起来了。连同师长布柳赫尔一起陷于被包围之中的那些团队究竟藏到哪儿去了呢？

而在10月的头几天，他们居然又在北方，在未受破坏的干旱的大道上，在从瓦盖河到托博尔斯克之间的地段上出现了。这些红军居然斗胆径直地进到西伯利亚的首府去，居然还在敌人的大后方来回运动。高尔察克分子的一切如意算盘给搅得乱糟透了。

关于这一情况，第51师的历史写道：“布柳赫尔考虑到第2旅在托博尔斯克附近处境困难以及高尔察克分子向红军后方的推进尚属顺利……于是下决心冒点险打它一仗。”②

师长决定9月26—30日这几天内把零星散失的部队和个别组合集结起来，再摸一摸敌人的兵力和意图。他去了一趟瓦盖伊斯科耶村，遇上了第2旅的第456团，并了解到托博

---

① 《第51彼列科普师》，莫斯科，1925年，第43页。

② 《第51彼列科普师》，第43页。

尔斯克周围形成的局面的一些细节。他成功地把第454团不久前在进攻中担任第2梯队作战任务的一个营从高尔察克分子的打击下解救出来，随后又突然与И·В·博里亚耶夫团长相遇，他感到喜出望外，博里亚耶夫带领一小部分红军战士神奇般地冲出了在乌斯季伊希姆不远处的包围圈。

回来之后，他把编在预备队的团教导队和不满编的炮兵第2营召到别廖佐夫卡来，而从在舍斯托沃—阿什雷克地区坚持防御的第1旅阵地上只撤回了第453团一个团。另外的两个团（第451团和第452团）没有动。他是要让敌人相信这个旅是哪儿也不会去的，正继续执行先前规定的任务呢。

那末，新组建的集群为了成为真正的有战斗力的突击群应该如何行动才好呢？把它拉上去加强第1旅？毫无意义。想往西，向并行于托博尔河和图拉河的大道突进，也没有什么意义。往南，猛进到月初第29师的战线曾经越过的地方，那就无异于自戕。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向北行动一个方案了，这个方案越来越吸引着师长。他明白在如是的兵力对比条件下，在敌人以为我方不会给它任何打击的地方，或者不付出重大损失就能掌握主动权并强使对方接受意志的地方，是最容易取得胜利的。

往北，向瓦盖河口猛进提供了能以减轻依然处于被包围之中的第454团处境的机会。假定向额尔齐斯河的突破能够成功，那下一步怎样行动呢？高尔察克分子迟早会清醒过来，那时集群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钳制之中。哎，要是知道放弃托博尔斯克之后第455团是否还存活了下来，最终脱离了配属第29师师长指挥的第8旅是否来救援它了？要是能知道这些情况，那该有多么好呀。

现在也许应该介绍一下第51师的一位老同志、1918年的共青团员根·马兰金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50周年前夕发表在秋明青年报上的回忆录了。这些回忆把我们带到了师的第2旅和它的步兵第455团。

夜晚，旅政委斯捷潘诺夫把一伙年青的红军战士叫到自己跟前。

他对战士们说：“需要派几个志愿者去同师长取得联系。任务很艰巨，很复杂。谁愿意去？”

愿意去的人很多，但政委选定了根纳季·马兰金和亚历山大·维列格扎尼涅，他们俩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sup>①</sup>。

小伙子们换上了破烂的农民衣服，给他们配备了纳甘式手枪和“柠檬梨”手榴弹，发了食品，还交给他们一包文件，叮咛他们要穿林间小路，朝东南方向走。

两人小组由马兰金负责。文件由他带在身上。通过森林密菁用了一天一夜多时间。在博罗夫河边弄到一条小船，两人便划进了图尔干湖。在东边的沼泽地上了岸，每人找了一根木棍，踩着土墩挪动脚步。走出沼泽地后检查了一下文件有没有浸湿，把身上稍微收拾干净一点，也没有休息就加紧赶路，一直往南走。突然他们遇上了红军的侦察组。

“什么人？从哪儿来？为什么带着武器？”他们严厉地问道。

马兰金皱皱眉头回答说：“我们是2旅来的。”

“去找布柳赫尔的！”维列格扎尼涅快活地补充一句。

---

<sup>①</sup> 两名红军战士后来成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基洛夫（维亚特卡）州的第一批模范共青团员。

“找布柳赫尔，2旅的！……小伙子们，请问你们是不是从阴间过来的？听说第2旅在托博尔斯克不是全给打光了吗？”

“没有全光。455团还顶着呢。”两人小组的头头斩钉截铁地反驳说，并提出要求：“领我们去见布柳赫尔。我们有公文要送给他。”

师长不在，他到部队去忙组织环形防御的事了。旅长B·E·谢列布连尼科夫接下了文件。

为小伙子们烧了洗澡水，后来又让他们坐下来喝茶。没有白糖，只有胡萝卜奶渣饼。他俩喝茶一直喝到打起盹来。

师长回来的时候两个联络兵已经做过十几个梦了。马兰金和维列格扎尼涅送来的报告证实了第2旅确实没有被击溃。第455团有两个营把旅里未受损伤的几个小分队和勤务部门收拢起来，很有组织地从托博尔斯克往南，向马马耶沃—希什基诺一线撤离，就在那里同敌人重新展开力量悬殊的、但相当顽强的斗争。过了一天，在诺沃伊村附近被包围的一个营又与第455团会合了。有300名游击队员同这个营一道从敌人后方撤了过来。这还不是全部。团长B·B·科鲁格洛夫与第3旅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第457团前出到了前进阵地地域，第458团到了贝加洛沃附近，而第459团则等着在伊耶夫列沃村附近往船上装货呢。

师长高兴得喊了起来：“好呀，全师都在，整个都活了！全师都在，以后也不会失散！现在要全力对付托博尔斯克，只注意托博尔斯克！”

为了实现往北突破，第1旅由Ф·И·奥利舍夫斯基指挥的第453团、第2旅的第456团，以И·B·博里亚耶夫团长为



首的第454团的1个营、3个团的教导队和1个炮兵营领受了前出到瓦盖河河口通西伯利亚大道一带，并从额尔齐斯河左岸经克孜尔巴耶沃向托博尔斯克实施进攻的任务。第451和452团受命保证掩护他们在阿什累克和舍斯托沃乡所占阵地上的奔袭集群。正如步兵第51师的历史所指出的那样，师长采取了“即使牺牲留在后方的部队，也要挡住敌人，并赢得时间的万分勇敢的决定”①。

师长在指出在敌人后方实施奔袭的特殊困难的同时，号召指战员竭尽“全力完成规定的任务，并牢记只有迅速而坚决完成这次行动，才能保证胜利”。他还特别要大家注意“节省子弹，因为在几乎完全被隔绝的情况下是不能指望补充弹药的”②。

1919年10月1日，第51师突击群向托博尔斯克进发了。突击群统共只有约2000名活跃的步兵和12门轻火炮。高尔察克分子惊慌失措，未经战斗就放弃了好几座村子。只是10月4日在鲁萨诺沃村附近他们才第一次进行了顽抗。在6个小时之内，步兵第453和456团的红军战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凶猛攻击。从组织突击群起第一次让轻炮营的炮连投入了战斗。但直到师长给С·Д·戈尔什科夫指挥的第453团的预备营下达了任务之后，才算出现了转机。他的战士们通过泥泞的沼泽地和多刺的灌木丛，迂回过高尔察克分子。其他分队

---

① 《第51彼列科普师》，第137页。

② 引自В.В.杜申金：《从士兵到元帅》，莫斯科，1964年，第94页。

剿以齐心协力的正面冲击支援了他们从后方打击敌人。

敌人溃不成军，被击退了。突击群的部队占领了鲁萨诺夫村和邻近的尤尔特·额尔齐斯克村和萨巴诺夫斯克村。

我曾到托博尔斯克城郊外去过几次。在卡拉奇诺同著名的集体农庄庄员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雷马列夫作过长谈。他在第51师部队时曾经从托博尔河一直走到贝加尔湖。回到故乡之后，他担任了“苏维埃北方”农业劳动组合的第一任主席。在苏姆金诺已经建成了苏姆金诺第23职业技术学校的现代化的建筑群。我曾在这里给身穿水手服的孩子们讲了话。他们是获得过勋章的额尔齐斯河航运公司未来的船舶主人。这些会见是在曾几何时父亲指挥过战斗的地方进行的。我能够用仿佛是父亲的眼光去观看古老的托博尔斯克那一幅久远的图景，并竭力去想象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时父亲的思路。

1919年10月5日早晨，天气少见地晴朗。从额尔齐斯河升起的太阳照亮了在足有10—11俄里方圆的宽广的陡岸上拔地而起的这座神话般美丽的城市。

“那是托博尔斯克的内城”，一个月前才攻克这座城市的团长博里亚耶夫解释道。“市中心是有5个圆顶的索菲娅—乌斯宾斯基教堂。从教堂的钟楼往下看，周围的一切能够尽收眼底”。

“那他们已经测定了我们的位置了？”

“如果用望远镜细看，能看清的。”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你们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过河的？”

“在楚瓦什岬，呀，难道你们想再来一次横渡额尔齐斯，

河吗？”

“是的，一定要过去，但不是现在……”

布柳赫尔率领南乌拉尔红色游击队穿过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线统共才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就在乌法边边上过的铁路线，当时已经向白卫分子屈膝投降的立宪会议委员会的头目们都到乌法来开“国务会议”。要克制住行军途中不走巴什基尔首都的大街的诱惑真是一件大难事。然而，总司令不仅克制了自己，而且也克制住了他身边那些热心的助手们的愿望。顺道进入乌法在当时确是明显的冒险行为。即令如是，也已引起了敌人的慌张。立宪会议委员会的会议中断了，白卫军统治下的乌法城里的达官贵人都在匆忙打点行装。

那末，托博尔斯克呢？在北方的水路上托博尔斯克的意义无可争辩。同时，据俘虏们供认，高尔察克还亲自光临过这里。这次的冒险并不值得。不是这样吗？要打赢争夺这座城市的一场交战，无论是兵力和弹药都是不够的。装甲船，这些浮动的要塞，还会造成更多的伤亡。在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内集群就会丧失现有的突击力量，到那时也就无法把一个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了。

“是的，这可真是个好日子。应当好好地庆祝一下这个日子。而今我们就去突击马马耶沃，切断秋明大道，还要……”

“突击托博尔斯克！”博里亚耶夫急忙说道。

“这一时刻会到来的，可眼下只是看得着，吃不着呀……”

攻占马马耶沃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而且进展得很快，

以致连接巴恰利诺和托博尔斯克的电话线路也未遭到破坏。尼古拉·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卡拉肖夫<sup>①</sup>接通线路之后，就开始等候。耐心等待终于得到了报偿，而且是百倍的报偿。线路上渐渐热闹起来了。卡拉肖夫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第453团团长Ф·И·奥利舍夫斯基。就这样截获了科列斯尼科夫上校同托博尔斯克军队集群司令长官弗兰克将军之间的通话。上校报告说，许多部队仓忙地从前线撤向休基诺，因为有命令要他们在不迟于8个小时之后到达这里。弗兰克通知说，托博尔斯克的工事很快会得到加强，额尔齐斯河的渡口会有装甲船加以保护。步兵第27团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阻止红军推进，直到沃特金师到来。

听取奥利舍夫斯基的报告之后，师长毫不迟误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心：

“既然如此，那我们的任务也就明确了。必须赶在科列斯尼科夫之前到达休基诺。不是让27团来阻止我们，而是要把它从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清除掉。”

用夜间突袭的方式攻占了休基诺。高尔察克的第27团沿托博尔河撤向上游，直到拂晓才同迎面赶来的科列斯尼科夫的部队相遇。而弗兰克将军则一直到上午才把新锐兵力从托博尔斯克拉出来，其中包括从高尔察克禁卫军沃特金师里抽来的3个团。在他们的猛攻下我们放弃了马马耶沃和希什基诺，掉进了休基诺这块方圆3俄里，且四面受钳制的狭窄地

---

① 红军战士尼·阿·卡拉肖夫是父亲的同乡，雅罗斯拉夫省人。在彼列科普的历次战斗中表现突出。由于在国内战争战场上做出了功绩，他被授予红旗勋章。

方。这里集中着近400名伤病员。

突然出现了两架水上飞机。炮兵和机枪手不让它们低飞。从空中往地面丢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敌人在传单上写道：“你们被包围了，你们没有生路了，每抵抗一分钟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10月8日夜里，集群的团长和营长们召集了一次会议。

师长问：“士兵们对传单有些什么看法？”

“对威胁大家都说不怕。拿传单卷烟了，或者派了别的用场……”

博里亚耶夫愁眉苦脸地说：“子弹只够用一昼夜了。”

“面包也没有了，这已经是第4天了”，奥利舍夫斯基补充道，“一顿饭的口粮只有两个土豆。”

师长回答说：“我知道。出路只有一条：明天就摆脱困境。天一亮就冲锋。方向是卡拉奇诺。除了戈尔什科夫营之外，所有兵力立即开始行动。而您，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就再当一次我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吧。”

第一次突围的尝试计划在凌晨进行。但往卡拉奇诺的突围没有成功。白卫分子顶住了我们的强攻。10点钟从马马耶沃方向突然响起了管乐队的进行曲。这就是说，沃特金师的人马已经到达前沿阵地了。科列斯尼科夫上校的步兵从南边支援他们的进攻，我们正是计划通过科列斯尼科夫步兵的战斗队形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出去。中午以前又打退了6次猛烈的进攻。敌人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他们还用装甲舰上的重武器进行射击，从空中轰炸。伤员也没有撤离战场，只要手里还拿着武器，他们就一直坚持战斗，唯一的要求不过是水和子弹。

在危急时刻，师长从戈尔什科夫营里要走一个连，放到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皮上衣，帽子上缀着的小红星闪闪发光。师长亲临前沿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白卫分子大量减员，队伍开始动摇。然后撤向马马耶沃去了。

经过短暂停歇，高尔察克分子又重新开始进攻了。手里再也没有预备队了。斯捷潘·戈尔什科夫营的两个连已经完成了特殊任务。营长是土生土长的乌拉尔人，世袭猎人。从小就习惯于在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中的小路上行走。他带领红军战士在沼泽地里迂回。在黄昏降临之前不久，戈尔什科夫在敌兵背后打出了约定的信号弹。看到信号之后，师长迅速地重新部署兵力。他放弃了环形防御，把全部兵力调到南边，卡拉奇诺和塔拉图希诺村的方向。在白卫军后方，戈尔什科夫的几个连用坚决的冲击支援了这次果敢的突袭。终于打开了包围圈的缺口。

后来，师长在为步兵第453团第2营营长戈尔什科夫请功，申报授予其红旗勋章时写道：“这次胜利不仅解救了第51师的集群，而且也解救了红军的好几个别的师。”<sup>①</sup>

而现在红军以强行军急进，离开托博尔斯克越来越远了。随后接连两天他们根本没有休息。高尔察克分子开了载有登陆队的装甲船去追赶，但却无法让这些登陆队上岸，红军炮兵营的炮手们打赢了这场同白卫军的炮战。一艘装甲船被击沉，另外几艘被迫溜走了。俘虏了200来名高尔察克分子，而在战利品中还有10万多发子弹和10挺机枪。

---

① 《第51彼列科普师》，第291页。

10月10日晚，在**多尔戈亚斯科耶村**消灭敌人的掩蔽所后，突击群前出到第2、第8旅所属各团的阵地。这次奔袭的参战人员一个个显得十分消瘦，满脸胡子拉茬，因睡眠不足两眼熬得通红，这会儿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休息机会。全体人员都到了**伊耶夫列沃村**。几乎与他们同时，第451和452团也从东边，从**阿什累克**和**舍斯托沃乡**来到这里。

第452基泽洛夫团团长**A·И·加博夫**从前当过传令兵，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他就给我讲过：“完成掩护任务之后我们就决定要在森林中砍出一条路来。我们每天挥动斧头干18小时的活儿，要费好大劲才砍出1俄里路，我们就这样1俄里1俄里地去开辟那条路。”

这样，全师的所有部队都集中起来，成了一支统一的坚强的力量。**高尔察克**击溃步兵第51师的计划未能得逞，他的部队想在苏军第3集团军后方实施翼侧突击的计划同样未能实现。在10月中，当东方面军各部重新进攻的时候，年青的第51师和从前一样在其左翼连连得胜。现在第8旅的几个团打先锋。他们顺托博尔河两岸而下，神速推进。气急败坏的“最高执政”从托博尔斯克跑到鄂木斯克，他的船差一点遭到红军炮兵的轰击。

1919年10月22日，步兵第51师再度解放了托博尔斯克。

第151旅司令部原参谋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利亚克**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写过第51彼列科普师的历史。我想，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一下他的回忆录该是合宜的。提到该师作战的最初阶段时，他写道：“在西伯利亚，对于第51师来说，托博尔斯克之战的关键是彼列科普。如果说占领彼列科普意味着我们捣毁南方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大本营的话，

那末布柳赫尔同志在托博尔斯克附近实施的战役便是对高尔察克的致命打击。只要看一下当时形成的战略形势就能充分理解这次战役对高尔察克军的整个战线确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苏维埃各集团军的部队在敌人的猛攻下也不很稳定，高尔察克的突击队在他亲自指挥下乘装甲船从鄂木斯克到了托博尔斯克附近，到了苏维埃军队的后方，截断了我第3集团军正面从叶卡捷琳堡到秋明的主要交通线。

看来，要想以较小的兵力去打击正在向我进攻的敌人的后方，而这时在自己的后方还有敌人的另一个集群在捣乱，恐怕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翻尽国内战争和一切战争的历史也未必能找到类似的战例。然而，这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确然是这样做了，他们的确突破了敌人的战线。这时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只有培育出象布柳赫尔、戈尔什科夫、炮兵营长马秋什金这样的英雄人物的红军才能打出这样的战役吧。”①

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同志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雷马列夫给我讲述了占领托博尔斯克之后的事态发展情况，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底大雪就盖严了大地。那一带的额尔齐斯河在冰层封冻下静止下来了。为了赶上在沿河两岸以苏沃洛夫的精神正在行进之中的团队，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成立了一个人数并不很多，非常精干的野战指挥部。为了迅速机动，他命令多多寻找马匹和轻便雪橇。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剽悍的西伯利亚式的三套马的车子奔驰开了。11月11日已经到了塔拉。后来，他们并没有顺路到

---

① 《第51彼列科普师》，第314页。



第5集团军各部已解放了的鄂木斯克去，而是继续向西伯利亚腹地挺进。前方已是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继而便是卡霍夫卡和彼列科普了。

我从孩提时代起就记得父亲最喜爱的巴格里茨基的四行诗：

顶着稠厚的烟浪，  
身上溅满血迹和尘土，  
我们把一面面鲜红的旗帜  
插遍那喧嚣奔腾的克里木岸边。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牢记着这些诗句。父亲常常在给年青人讲述英勇突击彼列科普的故事时引用这些诗句。但是在我来到托博尔斯克之前还不知道这些诗句出自诗人的哪一篇诗作。读过《第51彼列科普师》这本书之后才得到了答案，我在一首长诗中发现了这熟悉的四行诗。爱德华·巴格里茨基把它称之为《第51》，这里所指的就是第51师的战斗历程。

我把自己的发现首先告诉了托博尔斯克的年青人，然后给他们诵读了诗人讲述的有关西伯利亚远征英雄的那些段落。

消灭高尔察克！在纷扰的原始森林中，  
我们在摸索，磕磕碰碰，诅咒着，  
艰难地向前走去，走向那篝火旁  
佩戴金色肩章的夜间巡哨的身影闪现  
的地方……

呀，子弹，你是铅质的山雀，呼啸吧！  
刺刀，你是野猪的獠牙，出鞘吧！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战士们的脸庞  
满是血和汗，他们缄口不语。

仇恨象滚烫的树脂在沸腾，  
但想歇息，刺刀催促着向前疾奔，  
骑兵正披星戴月  
赶着前来支援我们。

血液在接续不断的交战中翻滚，  
而心却象蜜蜂在树孔中嗡嗡。  
高尔察克被消灭了，在尘土和大雾中，  
在严峻的大地上，在密密的原始丛林中。

我很高兴听到年轻的西伯利亚人没有忘记要尊重光荣的  
第51师指战员们在托博尔斯克土地上建立的英雄业绩，并对  
之进行认真的研究。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早已成为少先队员和  
共青团员最喜爱的夏季旅游胜地。去那些地方旅游的发起人  
是以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马洛夫为首的第一中学的学生们。  
他们是第一批沿着从高尔察克手里两度解放他们故乡的第51  
师战斗过的地方转了一个“大圈”的人。他们还倡议在舍  
斯托沃、阿什累克、瓦盖、鲁萨诺沃、卡拉奇诺以及过去曾  
经发生过激战的地方建立校园地和战斗光荣史陈列馆。  
历年来也有一些其他的旅游探索队沿着这条路线绕行过多  
“匝”的。

其实，托博尔斯克又何止只有光荣的过去呢。伟大的门捷列夫在本世纪初说过的预言今天已变成了现实。他说：

“我的故乡终有一天会显示出她那极其优越的地位和保留着西伯利亚古老首府古风的居民那种顽强的进取精神的。”

伟大的十月革命为具有几百年悠久历史的托博尔斯克开辟了这一远大的前程。这里建起了一系列石油化工企业和石油加工工业企业。

苏共托博尔斯克市委书记维塔利·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布拉莫夫给我讲述了该市的宏伟的远景规划。我和他一起去会见了市里的青少年，各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在托博尔斯克最好的一座电影院的大厅里聚集着未来的船舶驾驶人员、港口机械师、建筑师和锅炉工程师。培训职业素养同高等文化程度相结合的新型石油工人的市第5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也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我同托博尔斯克未来的主人们的一次会见。我以毫不掩饰的巨大兴趣听取了将在二十一世纪生活和从事创造的人们豪言壮语，这不禁使我反复地默诵起共青团新的团歌歌词来：

青年是两代人的纽带，  
是父辈的接班人……

## 神奇的卡霍夫卡

1919年红军不仅消灭了高尔察克，而且还消灭了向十月革命的摇篮彼得堡疾犯的尤登尼奇的一大帮军队。

1920年1月，第1骑兵集团军解放了顿河罗斯托夫。邓尼金的残部正向高加索山麓，向克里木和敖德萨逃窜。败将邓尼金算是从舞台上匿迹了。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急忙把弗兰格尔男爵推上邓尼金的位置，弗兰格尔在帝国主义者的厚爱下宣布他是“俄国的统治者”，并接受了南方反革命军队总司令的桂冠。

1920年春季，协约国采取了反对苏维埃国家新的军事行动，他们决定：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军队从西边实施主要突击，而弗兰格尔的军队则从南边进攻过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剖析这一形势时说道：“我们又一次面临困难局面，国际帝国主义者又一次重新企图用两手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一手靠波兰的进攻，一手靠弗兰格尔的进攻。”<sup>①</sup>

遵照列宁的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0年9月21日发布命令，组建南方面军以与弗兰格尔作战。最杰出的无产阶级统帅伏龙芝被任命担任司令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1896年的党员谢·伊·古谢夫和红军国际新编部队的卓越的组织者贝拉·库恩。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30页。

党把最好的部队派到斗争的新的战线去。经过同高尔察克战斗锻炼的步兵第51师和第30师从西伯利亚出发了。享有盛誉的第1骑兵集团军也从西南战线急行军来到这里。

六十年代中期，我调到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一个总局当局长，在莫斯科生活期间我同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著名的部队政治工作者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捷列金相处得如同父子般亲密无间。

还在团属学校当学员时，他就在第51师的西伯利亚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从西伯利亚开赴前线时，他担任先头梯队的政治委员，后来又回来担任步兵第153旅第459团的副政委。该团光荣地顶住了弗兰格尔的“装甲骑兵”对卡霍夫卡登陆场实施的多次猛攻。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这个团的战士没有被钢铁怪物——英国坦克所吓倒，而“在彼列科普、阿尔米扬斯克、尤顺、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作战期间，”正如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1年9月20日的第264号命令中所说的那样，“步兵第459团是一支威严的力量，它常常以不可阻挡之势坚定地向前挺进，扫除阻挡红军在克里木获胜的一切障碍”。

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康·费·捷列金经历过光辉的战斗历程。卫国战争之初他是旅的政治委员，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而退役前已是中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给我读了他的《一个政工人员的日记》，那是他从1920年7月1日至11月16日几乎每天不漏地写下的日记。读着“从西伯利亚去消灭弗兰格尔”、

“通过锡瓦什”、“被解放的克里木”这些内容，真使人有仿

佛揭开了令人难忘的卡霍夫卡和彼列科普光辉历史全景之感。

1980年7月，工程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立第1和第61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一道首次到苏联人民战斗和劳动的光荣的革命圣地去作旅行参观。这次旅行参观的口号是“从乌拉尔到卡霍夫卡，到彼列科普和刻赤”，旅行是为纪念国内战争胜利结束60周年和苏联元帅瓦·康·布柳赫尔诞生90周年而组织的。

我原打算和青年们一起去，可是因病又未成行。

年青人对这次参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之后，他们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述乌拉尔步兵第51师和第30师于1920年夏秋在北塔夫里亚和克里木击溃弗兰格尔白卫军时期交战现场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了解到的有关在传奇般地保卫卡霍夫卡登陆场，值得永远纪念的强攻彼列科普和琼加尔时期所建功勋的许多新鲜内容。

他们为苏联人建设和修复第聂伯河水电站和扎波罗热炼钢厂，建造卡霍夫卡水电站和北克里木运河的功绩赞叹不已。

他们旅行参观回来之后制作了一本非常好的相册。看过这本相册后我下决心要同妻子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和女儿奥莉加一起利用假期去重走一趟他们这次探索性考察所经过的路线，以便亲眼看一看今天的卡霍夫卡、彼列科普，并再次重温红军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评价的那样，这是我们的父辈对弗兰格尔所取得的充分、彻底，而且是极其迅疾的一次胜利。

在这之前《乌拉尔探索》杂志和边疆区的乌拉尔军人报纸《红军战士》已经刊登过我所写的札记《父亲的战斗道

路》一书的头几章。自然，这些札记的第一读者便是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捷列金了。他在回信中写道：“感谢《乌拉尔探索》杂志。我读了开头几篇特写。我能理解你写你的父亲有多困难……但我全心全意并举双手赞成你提出的任务，要把所考虑的事情坚持到底。我将尽力帮助提供我所掌握的一切……”

1920年8月2日，第51师师长向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报告：“步兵第51师用提供给他们们的93节军用列车于今年7月1日开始从安加尔车站向西往8个方向（叶卡捷琳堡、辛比尔斯克、萨马拉）调动，同时先头梯队已于7月21日抵达阿波斯托洛沃车站，并开始卸载。”

下面就是政工人员康斯坦丁·捷列金日记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7月1日，我被任命担任师的第1个军列的政治委员。我决定请两个弟弟跟我一起上前线。

我给他们发了电报：‘我将奔赴前线，你们也来吧。’

今天拂晓，我第459团开始了出发前的最后准备。军列已发到车站。车厢里装满了粮食、饲料、炊具和板车。红军战士把自己的东西都装进背囊里。战士们领到了衬衣。这些衬衣是莫斯科的工人为庆贺战胜高尔察克特意给我们寄来的。

政委大声宣读了给团队的命令。

结束时他说：‘我希望在这次运动中你们能严格遵守革命秩序和纪律，并希望在我们的队伍中不要出现任何一个临阵逃脱的人、自私自利的家伙和劳动人民的叛徒。同志们，前进！在共产国际的红旗下游团结起来。祝大家一路平安！’

“7月19日

我们到了阿波斯托洛沃车站，派出了观察哨，架好了机

枪。军列开始卸载……招集来一些驭手。两小时之后，我们已经朝西南方向开动了。

起初居民们对我们有些不太信任……

红军战士要向他们买些东西，但只能听到回绝：

‘同志们，什么也没有，都吃光了呀。’

我们的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说说也就算了。他们啃几口干硬的面包或者把面包干泡泡水喝下，就干起活儿来了……到晚上农民的态度有了急剧变化。他们把红军战士请到家里吃饭，用腌猪油和牛奶款待……”

“7月20日

离前线愈来愈近了。关于‘西伯利亚赤色战士’是好人的消息赶在我们前头不胫而走，传遍了沿途的村村寨寨。指挥员和红军战士成了大家期望的客人。农民们同我们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在达维多夫布罗德和阿尔汉格尔斯耶科来了一批逃兵，请求带他们上前线。看，政治工作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呀！”

“8月7—10日

师属各部队差不多全部下了车，已经邻近别里斯拉夫利了……”

“8月11日

我团通过浮桥过了第聂伯河……我师接到命令：卡霍夫卡应当变成筑垒登陆场①。”

在右岸军队集群第一次八月进攻期间卡霍夫卡登陆场被

---

① 《彼列科普》，载《回忆录文集》，莫斯科，国家出版社联合公司，1941年，第26—29页。



第52师和拉脱维亚师的部队占领了。这次进攻于1920年8月7日夜间开始，持续到8月11日。步兵第51师这时继续在别里斯拉夫利地区集中，没有参加进攻。它的先头部队于8月11—12日前出到卡霍夫卡登陆场，并在保卫卡霍夫卡登陆场中起了决定作用。

父亲在为纪念粉碎弗兰格尔15周年所写的《勇敢者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位于通往克里木最短路程上的卡霍夫卡不仅顶住了弗兰格尔企图向克里沃罗日耶和顿巴斯的突破，而且阻止了弗兰格尔同波军的会合。弗兰格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一根芒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拔掉它，为此消耗了自己的精锐部队和技术装备，然而从8月至10月对卡霍夫卡的多次进攻毫无成果。所有这些进攻都被卡霍夫卡—别里斯拉夫利集群击退了。”①

由基泽洛夫矿、乌拉尔的卷纱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的步兵第51师，从组建初期到消灭弗兰格尔叛军为止始终是无产阶级意志、坚强不屈和勇敢精神的化身。正是这些素质保证这支队伍战胜了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军官队伍组成、技术装备精良的弗兰格尔的精锐部队。第51师同弗兰格尔作战之前已经在反对“西伯利亚统治者”高尔察克的远征和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步兵第51师的党性特征和阶级特征十分鲜明。“在调往弗兰格尔前线期间，全师的骨干基本上是乌拉尔的无产者。工人成份几乎达到全师编制的四分之一，其余的红军战士大多数是西伯利亚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从前的游击队员。党

---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39页。

组织拥有2765名党员和1200名预备党员，占全师总人数的12%和作战人员的近25%”<sup>①</sup>。

卡霍夫卡附近有辽阔无垠的平原。我们下了汽车，爬上一个高地，那上面有白石砌成的顶部竖着带金星的铁盾的锥形体。1920年这里曾是瓦·康·布柳赫尔的指挥所。在决定性的十月进攻时期谢·米·布琼尼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就是从这里指挥第1骑兵集团军各师对弗兰格尔作战的。

塔夫里亚大草原延展开去很远很远，直到黑海边。现在，大片的草原上纵横着一道道防护林带、高压输电线和灌溉渠。经过改造的大地面貌千姿百态，令人赏心悦目，她馈赠我们以从未有过的丰产和丰收。

步兵第51师师长率领全师到达新的战场之后从这个小高地上能看到些什么呢？

各旅各团急忙在刚收复的登陆场上修筑工事。师长要求大家日以继夜地工作。首先要挖好跪射掩体，再逐步加深成全断面掩体；其次要在捷尔内小村和20.9米高地上构筑支撑点；最后还要在防线的其余地段架上铁丝网障碍。

于是，在这一片被太阳晒枯了的茅草荒原上布满了一个个深深的掩体。火炮和机枪班组都钻进地下去了，同时竖起了一层又一层铁丝网围墙。

弗兰格尔把巴尔博维奇将军的“装甲”骑兵军调到卡霍夫卡来了。师的大事记编纂者不失时机地指出：“弗兰格尔的‘装甲骑兵’是会载入各种大小战争史册的……第51师曾

---

<sup>①</sup>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40页。

体验过它的强大的战斗力。”①

通常每一个骑兵连都配备有近10辆机枪车，2辆备有机枪和轻炮的载重汽车和若干装甲车。在各团的战斗队形中有轻型坦克参战。还有飞机掩护地面部队。“装甲骑兵”对冲鋒的准备是秘密的，一旦发起，行动极为迅速。在炮兵的急促射击下骑兵连带着配备的兵器能霎时间展开。天空中即时出现轰炸机，在投下第一枚炸弹的同时，骑兵同坦克和装甲车便会排山倒海地飞驰向前。炸弹破坏了全部通信联络，部队自顾不暇。面对这般狂轰滥炸，看来是谁也无能为力的……

不过，乌拉尔人、西伯利亚人硬是摧垮了这些“装甲骑兵”，难怪有人说强中自有强中手呀。

巴尔博维奇将军的突击骑兵连向步兵第457团的连队猛扑过来，战士们全穿着红色上衣。他们从掩体里跳出来，在空旷的田野里迎战“装甲骑兵”。红军战士在战术演练课上按照师长的指示对骑兵作战守则的全部要点进行过认真的操练，他们牢记这些操练，分成几个组，改编成所谓的“刺猬”队形，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步兵网。当还有子弹时，他们向冲锋过来的骑兵射击，然后用刺刀搏斗，跳上装甲车，向它们投掷手榴弹。许多人在机枪车的狂射下倒下去了。

团队失去了所有营长，半数的连长和副连长，但并没有退却，一直坚持到友邻团队的几个营到来。剩下的少数战士在补充了久候的子弹之后又继续战斗了。

步兵第457团在南方面军是第一个被授予革命荣誉红

① 《第51彼列科普师》，第58页。

旗的。

在卡霍夫卡登陆场的指挥所里父亲寸步不离地坚守到8月25日。团队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斗，有生力量伤亡很大。他们不仅挡住了敌人，而且还果断地实施了反冲锋。弗兰格尔分子被撵出了德米特里耶夫卡、安东诺夫卡、契尔年卡和新列皮耶夫卡。

师长把自己的指挥所转移到新列皮耶夫卡的钟楼上。以后几天敌人又放弃了伊万诺夫卡，波克罗夫卡，上、下谢罗戈扎。离梅利托波尔还有30俄里。这一战役具有重大意义。师的部队造成了使整个弗兰格尔军队与克里木之间断绝联络的威胁。白卫军指挥部被迫停止了往顿巴斯方向移动，并从这个方向撤下大部分兵力，以恢复卡霍夫卡附近的态势。敌人的反措施迫使我军折返第聂伯登陆场。

战斗间隙来临了。整个9月份，双方都在准备决一死战。开始布柳赫尔担任卡霍夫卡筑垒区司令员，后来又兼任卡霍夫卡—别里斯拉夫利军队集群司令员，他充分发挥了建造维亚特卡和彼尔姆筑垒区时取得的全部经验，并在前线军事工程师德·米·卡尔贝舍夫的积极协助下又大大地丰富了这些经验，从而赢得了真正的筑城专家的权威。

从那时起父亲始终和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卡霍夫卡市历史博物馆里我不仅看到了卓越的军事专家和苏维埃祖国的爱国者合影的珍贵的照片，而且还读到了德·米·卡尔贝舍夫这样的陈述：“带刺的铁丝网和混凝土工事，不是它们，而是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了胜利，但是带刺的铁丝网也好，混凝土工事也好，是能够帮助取得胜利的。借助它们建成的坚固防御就象塞瓦斯托波尔那般不可

战胜，又象卡霍夫卡那样富有生命力。”

到9月底，两翼以第聂伯河为依托的登陆场已有了按阵地巢原则修建的3条防线，并有3至4道铁丝网障碍物和按棋盘形设置的一系列支撑点。所有这些工事相互间都有交通壕连结，任何一个地段都能可靠地得到良好的炮兵、迫击炮和机枪火力配系的掩护。在坦克可能运动的地方都挖了坑，布了雷。瓦·康·布柳赫尔和德·米·卡尔贝舍夫在师炮兵主任B·A·布季洛维奇参与下首次在这里建立了炮兵反坦克防御地带，这在当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种创新。

就在这座卡霍夫卡博物馆里还展出了真正是孤版的一幅照片。那照片拍的是一辆以“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命名的又大又笨的坦克，履带旁边和炮塔上有10来名战士，他们都穿着饰有红军战士“标记”的军大衣。

卡霍夫卡登陆场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退役上校谢苗·谢苗诺维奇解释说：“这是步兵第51师最贵重的战利品之一。1920年10月14日我们缴获了它。就在那天早晨弗兰格尔分子一下子朝登陆场开来了12辆坦克。在整个国内战争史上这是最强大的一次坦克冲击。这些坦克在我们眼里真是怪物。这些长10米，宽5米多，高超过1俄丈的东西确实是怪物。每辆坦克上都有5挺机枪和2门炮。宽大的履带使这些庞然大物畅行无阻地通过堑壕，在它们的重压下铁丝网障碍物就象棉线一样被压断了。

卡霍夫卡的老战士扎哈尔·扎哈罗维奇·阿布拉莫维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不，我们没有惊慌。我们很‘礼貌’地迎接了这些怪物。连长戈洛瓦诺夫和红军战士帕尔申手握手榴弹首先向头一辆坦克冲去。帕尔申一跃跳上坦克，忽然舱

口打开了，英雄被打死了。连长为死去的战士报了仇。戈洛瓦诺夫抢着把手榴弹扔进打开着的舱口。在其他地段红军战士紧紧盯住向他们猛烈射击的坦克，他们纷纷爬上坦克，用手榴弹杀伤射手。”

红军炮兵同敌人坦克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们采用了不断移动炮位的战术，把火炮推到开阔的平地，用直接瞄准打那些运动中的堡垒。在这些炮战中最得手的要数列·亚·戈沃罗夫炮兵营的炮手们，戈沃罗夫后来成了苏联元帅。

正如南方面军司令员伏龙芝在总结3天的激烈战斗时指出的：“英雄的军队在布柳赫尔的统一指挥下，不仅击退了敌人的冲锋，而且一鼓作气转入反冲锋，彻底粉碎了敌人，并经过战斗占领了敌人整个防御阵地。10辆坦克、5辆装甲车、70余挺机枪和许多其他物资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①

这次胜利之后，在大卡霍夫卡的中央广场举行祝捷大会，第51师师长为庆祝活动发布了专门的命令：“……今年10月20日，莫斯科市工人隆重地把荣誉红旗授予我所在的师。

战友们，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莫斯科以充满期望的目光注视着我們，并给予我们巨大的关怀。

我们的革命责任是不辜负莫斯科工人的期望，我们要感谢他们的珍贵礼物。莫斯科在旗帜上的题词要我们‘消灭弗兰格尔！’我们从这一题词中听到了共和国下达给我们的战斗号令。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我们一定要准确地、认真地完成这一命令。‘消灭弗兰格尔！’从今以后便是我们的口

---

① 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01，类号1，案卷号29，页次134。

号，在响亮的战斗号令下我们将自豪地把莫斯科的这面光荣的旗帜插上彼列科普的要塞，让它在红色的克里木升起，我们要努力去完成第51莫斯科步兵师的胜利进军任务。”<sup>①</sup>

隆重的授旗仪式之后，接着举行了卡霍夫卡登陆场的阅兵式。战利品“为神圣俄罗斯而战”号坦克也参加了阅兵式，那时候它已被命名为“莫斯科人—无产者”号了……

红军为守卫卡霍夫卡登陆场而进行的82天英勇斗争是国内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实施积极防御战斗的杰出范例。

实际上，今天的卡霍夫卡本身就是一座纪念碑。这里的每一个广场都很美丽，各具特色。这是身穿军大衣，头戴红五星盔形帽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耸立在高高的台座上。在另一座纪念碑下经常摆有鲜花，在它的花岗岩基座上镌刻着：“卡霍夫卡市劳动人民怀念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的字样。卡霍夫卡人也没有忘记斯韦特洛夫<sup>②</sup>诗歌中的女英雄。即使如今，她在少年时代战斗过的城市里也依然穿着军大衣，手里紧握着步枪带。这就是以“卡霍夫卡之女”为名的雕塑的永垂不朽的形象。

为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捍卫我国革命的红军英雄和在1943年10月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卡霍夫卡的战斗中捐躯的苏联坦克手建立的纪念碑蔚为壮观，令人起敬。

① 《第51彼列科普师》，第337页。

② 米·阿·斯韦特洛夫（1903—1964），苏联诗人和剧作家。作品有：《卡霍夫卡之歌》、《二十八》、《意大利人》、《地平线》等。

在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第聂伯河畔的这座城市获得了更大的光荣。1967年10月27日，在过去的卡霍夫卡登陆场正中，即在瓦·康·布柳赫尔当年的指挥所附近，一座“神奇的机枪车”纪念碑隆重揭幕了。这座碑连同底座总高度达15米，长1米多。4匹马拉着机枪车和8名战士正向前飞驰。在高高举起的长矛尖头上飘着骑兵连的一面小旗……这座于1920年为苏维埃政权而在著名的登陆场战斗过的军人树立的纪念碑起名“青铜之歌”。它是由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卡霍夫卡地区的劳动人民集资建造的。苏联元帅布琼尼是列宁格勒雕塑家和建筑师创作组的主要顾问。纪念碑的创作人员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金。

在“神奇的机枪车”周围常常举行颁发共青团团证，召集应征入伍前青年的传统集会，欢送青年参加苏军等各种活动。

这里还为光荣的骄子第聂伯河建造了永久的纪念碑。1951年在离卡霍夫卡10公里处，即在过去的神奇的登陆场右翼兴建了第2座第聂伯水电站。它成了整个北塔夫里亚的骄傲，并给太阳城新卡霍夫卡增添了活力。

水电站站长，共和国优秀电力工作者弗·米·谢尔盖耶夫向我介绍了卡霍夫卡水电站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讲述道：“我们的水力发电站为共产主义已经工作25年多了。它用廉价的电力保障第聂伯河沿岸工业企业和边区的农业。卡霍夫卡水库、北克里木和卡霍夫卡大运河的建造能够灌溉10万公顷干旱的土地。现在第聂伯河流向何方？我们回答说：“流进了赫尔松和克里木的大草原。”如今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了。



我到过卡霍夫卡大运河的主要水泵站，在那里的机房里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乌拉尔重型电机厂制造的成套设备。后来又到我以瓦·康·布柳赫尔命名的国营农场中心场部的劳动者家里作客。这是对英雄们最好的纪念。

## 不朽的彼列科普

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守住了卡霍夫卡登陆场，随后便一鼓作气连续向出现在通往克里木道路上的筑垒工事发起强攻。克里木是弗兰格尔分子最后一个巢穴。

……土耳其壁垒。如今在这里建造了肃穆壮观的方尖碑。白色金属的两个末端尖尖的棱锥象刺刀一样直插高空。在它们的顶部是“1920”、“1943”几个大字，这是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强攻壁垒的年份。中间是第一枚苏维埃勋章红旗勋章的模型。一个棱锥的底座上铸有“为纪念苏维埃武装力量诞生60周年，并庆贺其在彼列科普的胜利特修建此方尖碑”字样。

从卡霍夫卡到彼列科普相距80公里。步兵第51师的突破势不可挡。他们在1920年10月28日转入决定性进攻之后在中间地区挫败了维特科夫斯基将军的白卫第2军的部队，并于29日傍晚抵达彼列科普。

11月1日夜发起了对土耳其壁垒的第一次冲锋。敌人以猛烈的火力迎击红军的散兵线。我军没有炮火支援。破晓前，Ф·А·里亚扎诺夫的第456团（原第61雷宾斯克团）6连越过障碍突上土耳其壁垒。可是就在那里这个连队几乎全给吃了，只有少数战士返转回来。

那次冲锋是一次试探性的战斗。这以后所有部队都撤到

后方去了。显然，想从行进中拿下彼列科普是不可能的。军队集群开始进行强攻敌克里木诸要塞的细致的准备工作，调来了炮兵，运来了弹药。

与此同时，对锡瓦什湖也作了研究，选择强攻土耳其壁垒最可靠的路线，照父亲的话说，这里“可真是山峦重叠，任何一个步行者和骑手都无法从北端翻越过去”<sup>①</sup>。这还是土耳其汗利用俘获的扎波罗热逃民的苦役修建的。壁垒前有深达10米，宽20米的一道沟壕，沟壕两端一面是黑海，一面便是锡瓦什湖。

弗兰格尔分子不仅使障碍物恢复了先前的作用，而且在法国工程师协助下，通过强大的纵深大结构复杂的永备筑城工事配系、大量的要塞和海岸重炮、隐蔽于水泥发射孔内的密集的机枪网而使其效力得到数倍的增强。

事情又何止于此。除土耳其壁垒以外，在地峡腹部，在斯塔罗耶湖和克拉斯诺耶湖之间还构筑有一个尤顺筑垒配系。这个配系计有6条带有若干地桩的铁丝网散兵壕防线。

1920年10月30日，弗兰格尔亲自视察了彼列科普工事的整个配系，事后他声称，“我们已经干了许多事情，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干，但从今以后克里木对于敌人来说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sup>②</sup>。男爵在报界的应声虫则走得更远。他们大肆吹嘘说，“我们正等待着敌人的到来。他们无疑将在我们那固若金汤的要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而瓦·康·布柳赫尔的司令部那几天正在积极而有计划

---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41页。

② 同上。

地展开强攻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要塞”的准备工作。经过仔细研究情况之后，父亲得出结论，利托夫斯克半岛是敌人防御中最薄弱的地方，其锡瓦什湖一侧的工事相当稀松，因为弗兰格尔分子认为红军要强渡这一水障碍是根本办不到的。

没有强渡器材。能够涉渡吗？侦察员带来了好消息。炎热的夏季和多风的秋季锡瓦什湖的西半部变得浅多了。当地居民说可以涉渡，于是不是几个连队，而是整团整团地展开了准备工作。集群司令员亲自驱车前往海边察看，并确信可以通过锡瓦什湖的某些地点。这就是说对于敌人彼列科普工事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然袭击的前提条件是具备的。

但正面攻击地峡跟过去一样仍然是问题的症结。这时司令员和参谋们决定采取国内战争期间谁也不曾使用过的部队和专业分队的编成方法，去突破敌人的防御地带。这方法便是采用5个波次（5道战线）的战斗队形。第1波由工兵爆破手、掷弹筒手和铁丝网剪除手组成，他们应当清除由炮兵射击指明的通道，必要时还应当为后随的步兵开辟新的通道。第2波是关键，其任务是突破敌人在壁垒整个纵深的防御，力避陷入持久战斗。拔掉抵抗的据点是第3波的事情。第4波要更加向前推进，要摧毁弗兰格尔的尤顺诸阵地。最后是第5波，应当尽量充实骑兵，这一波要以快速部队和集群去剪除残渣余孽，前出到克里木空旷的土地上去。

父亲在《勇敢者的胜利》一文中回忆道：“在欢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3周年前夕，我们作好了强攻的准备。第15师和52师已经抵达战场。他们同第153旅和彼列科普集群骑兵独立旅一起受命经锡瓦什湖突击利托夫斯克半岛……第

152旅和火力突击旅则准备对土耳其壁垒实施正面冲击。

米·瓦·伏龙芝来到驻扎在恰普林卡的第51师师部……

11月8日夜，当全国正在欢庆十月革命3周年时，第15师、52师和第51师的153旅和独立旅冒着透骨的寒冷和火炮、机枪的射击，蹚过锡瓦什湖的积水，肩上扛着机枪和火炮，正向着利托夫斯克半岛冲去。”①

在蹚过烂海的那些人中也有步兵第459团的副政委康斯坦丁·捷列金。在他的《一个政工人员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叙：

“11月8日

……我们接到命令，随第458团的右翼成梯次前进，亦即直接朝彼列科普壁垒后方开进。

团队开始行动。向导走在头里。海岸很陡，我们在锡瓦什湖稀软的、黏性的，有些地方还是泡水的湖底上行进。大雾使我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大家举步都十分小心。

……上午11点前，第458团为数不多的几名勇士终于抵近了利托夫克基半岛。我们也让3营9连跟了上去。如是，队伍又开始缓缓前行了，大部分人只能匍匐前进。预备队只剩下2个连和1个工兵小队了。骑兵独立旅在后面，都骑着高头大马。我们则坚持不懈地潜入锡瓦什湖在彼列科普壁垒附近形成的一个马蹄形凹地中去。

……我骑兵旅的2个炮连开了火。第2德罗兹多夫团顶不住而跑掉了。近300名士兵，4名军官，12辆机枪车连同上面的机枪成了我们的第一批战利品。

---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42页。

……上岸后，我们抢占了敌人的掩体，派出前哨警戒，并尽可能作好隐蔽，即使时间不多也尽量争取休息。我们计算了一下兵力。出发时500名战士（除2营外）剩下近120人。把装备深深埋进锡瓦什湖湖底的做法倒是救了我们。我们就地引爆了这些装备，结果只是朝空中窜腾起来窄窄的泥柱，而没有造成在硬实的地面上爆炸时通常因碎片带来的损伤。”<sup>①</sup>

步兵第51师2个旅和第15师、第52师的共同行动终于达到了目的。弗兰格尔丢失了利托夫斯克半岛，盘踞在土耳其壁垒筑垒工事里的他们的部队受到被包围的威胁。可是，对敌右翼和后方的突击在时间上并没有同正面强攻完全协调起来。

土耳其壁垒的炮兵阵地上一片沉寂。浓雾遮挡着土耳其壁垒。气氛愈显紧张。从利托夫斯克半岛那边不断传来探询的声响：“究竟怎么回事呀？”

一直到10点光景，浓浓的雾幕才渐渐消散，所有的大炮开始直接支援冲锋了。壁垒上的轻炮连受到压制，哑了。但尤顺筑垒阵地上的重炮兵和要塞炮兵并未遭到严重损伤。它们开始反击，把壁垒前7公里处的土地变成了一片布满弹坑的“汪洋”。

强攻的第1个波次直到中午才开始行动。爆破手和剪网手开辟出好几条通道，但他们自己却几乎全都倒下了。第2波次的团队得到15辆装甲车的支援。前线军事工程师德·米·卡尔贝舍夫和师部装甲兵主任И·В·扬科夫斯基建议首先将这些技术装备用于工程目的。每一辆装甲车都装备有

---

<sup>①</sup> 《彼列科普》，载《回忆录文集》，第192—193页。

特制的金属四角钩。步兵把很硬的钢爪抛出去，抓住铁丝网，然后装甲车调转车头，用铁链子把铁蒺藜拖倒。但是，即使采用这种新方法，第152旅、突击旅和第453团担任强攻任务的营和连还是无法越过第一地带的障碍。

随着暗夜的降临，冲锋又重新开始了。又进行了3个小时的激战，随后又出现一段间隙。离敌人的主体工事只隔开40步的距离。

半夜，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来电话找彼列科普集群司令员，转告他：“锡瓦什湖要漫水，我们在利托夫斯克半岛上的部队可能被切断。无论如何要把土耳其壁垒拿下来。”<sup>①</sup>

布柳赫尔把疲惫已极的部队重新拉了上去。共产党员走在头里。他们举着团队的战旗。在投入冲锋的部队中也飘扬着那面莫斯科苏维埃赠予的缀有“消灭弗兰格尔！”字样的旗帜。许多指战员饮弹身亡。尽管敌人火力凶猛，我军又遭敌探照灯照射而失去视力，但大家还是无所畏惧地向壁垒冲去。他们时而在冰冻的悬崖上加快脚步，时而顺着陡坡下滑，时而再往上攀行，然后又继续前进。

11月9日凌晨3点，第455团和456团几乎同时前出到壁垒跟前。这时，第5波次担任强攻任务的第453团和454团迅速越过它们的战斗队形，毫不迟滞地向南，向尤顺诸阵地直扑过去。他们的冲击和先期抵达利托夫斯克半岛的部队的突击汇合了起来。

父亲回忆道：“11月9日破晓时分，司令部转移到阿尔

---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43页。

米扬斯克巴扎尔……第51师各部因强攻而疲惫不堪，且有伤亡。这时既无食物，又无饮用水，弹药储备有限，但他们还是坚持着去突破设置有密密的铁丝网的尤顺诸阵地上的第3道和第4道防线。在最窄的地段上每公里正面配置的各种口径的火炮约40门，机枪将近100挺。

海上有白军的舰队在游弋，其重炮火力是可以及到包括阿尔米扬斯克在内的整个地域。我们驻留在布尔加科沃村，亲眼见到了规模空前的一场战斗的全景。火炮的轰鸣声，枪弹的呼啸声和嘘嘘声竟是如此之惊人，犹如我们撞上了火炮的炮口和机枪的枪口一般。

我们的火炮只及弗兰格尔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但炮手们丝毫不为白军炮兵的压倒优势所动。他们勇敢地将火炮拉到前沿部队去，并用直接瞄准狠揍敌混凝土的机枪巢……

11月11日夜间，第151旅攻占了尤顺的邮电所。第51师的所有预备队都向尤顺扑去，彼列科普集群的军队稳稳地占领了克里木半岛……”<sup>①</sup>

1925年出版的《第51彼列科普师》一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叫《列宁和彼列科普》，文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认为占领彼列科普和粉碎弗兰格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我军和弗兰格尔叛军的态势图，上面标示着我们的胜利和失败，从这幅地图上还能测出卡霍夫卡经彼列科普抵克里木的距离。

克拉拉·蔡特金在1924年3月第27期《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回忆录中曾引用过弗·伊·列宁的这样一段话：“……

---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43—144页。



我们利用同波兰媾和，目的是以全力去对付弗兰格尔，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好让他永久地不再骚扰我们……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根本无需再让俄国人民经受又一次冬季战局的惊恐和苦难……

不，一想到冬季战局的灾难，我就无法忍受。’

接着，蔡特金写道：‘不久他又说，要为红军战士预订1万套皮衣服，因为他们要从海上去攻占彼列科普。但不等这些衣服做好，我们得到消息说苏维埃俄国的英勇的保卫者经过强攻已经控制了地峡，我们大家欢呼雀跃。这是军队和领袖们建立的史无前例的战功。这样，列宁又可以少操一份心，少受一份难了，因为南线也不会有冬季战局了……’”

1920年11月11日，第51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联名向莫斯科苏维埃报告说：

“师所受领的开辟通往克里木之路的任务完成了。11月11日12时攻占了尤顺镇，前方便是克里木，这一路上已没有筑垒工事了……弗兰格尔的精锐部队垮了，那道固若金汤的土耳其壁垒，外加尤顺筑垒配系的4道防线和他们一起崩塌了。白匪坚守彼列科普和尤顺阵地……的妄想就象一朵肥皂泡那样破碎了。红军指战员尽管缺衣少食，受冻挨饿，又连续不断参加各次战斗，真可谓人困马乏，但还是消灭了占优势的敌有生力量，而且是摧毁了一支有几十道铁丝网和不计其数的掩体护卫着的有生力量。任何力量都已挽救不了弗兰格尔匪帮覆灭的命运。克里木应该是苏维埃的这项无产阶级的命令，已经忠诚地完成了。”①

①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99—200页。

全师向克里木黑海沿岸各港口的行进比较放开了。师长命令在解放居民点时，“要在乐队的伴奏下进入集镇。如果那里有执委会，就要在其驻地前停下来，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向他们表示祝贺。如果遇到游击队，则从作战关系方面应当让他们听从正规部队指挥”<sup>①</sup>。

1920年11月13日，第51师同布琼尼的第1骑兵集团军一起开进克里木首府辛菲罗波尔。直通俄罗斯光荣城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已经扫清。首先进城的权利赋予了第153旅各团。

这时，我又一次翻开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捷列金《一个政工人员的日记》：

“11月15日

休息5个小时以后，我们又上路了。完成命令，要在今天攻占塞瓦斯托波尔，这任务可非比一般。要快上加快地奔进……现在每个人都深信，正是我们将赢得让胜利的红旗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飘扬的荣誉。战士们越走越快，坐在大车上的同志开着玩笑，在鼓励他们的士气……

越过山口以后，天热起来了。战士们脱下军大衣，甩到大车上。山和山之间显出了海面。战士们以孩童般的兴奋之心向四周张望着。

转过一个弯，突然开过来一辆装满人的载重汽车，已经可以看清飘扬着的红旗了。

我们加快了脚步，原来是工人代表团来迎接红军。我们相互紧紧握手。有几名工人和一位女工热泪盈眶地跑上来拥抱我们，亲吻我们。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代表革委会和塞瓦斯

---

<sup>①</sup> 引自B.B.杜申金：《从士兵到元帅》，第140页。

托波尔的工人向我们表示祝贺。他说，全市将倾城迎接红军，并在离塞瓦斯托波尔5公里处的一座村庄里备下午餐。

据代表们讲，11月14日，弗兰格尔乘船逃到海上去了。地下革委会已经接管了市内的全部政权。

……当我们临近塞瓦斯托波尔时，老远就看到由塞瓦斯托波尔革命委员会带领的群众队伍迎面朝我们走来。同志们给我们送上面包和盐，祝贺我们胜利地消灭了弗兰格尔的军队。四周响起一片‘乌拉！’的欢呼声，到处都是一束束鲜花，人们向空中扔帽子。

我们刚一进入市内，就听到嘹亮的《国际歌》声。我们到纳希莫夫纪念碑的一段路程完全成了凯旋式的游行……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纳希莫夫广场……队伍整好了。旅部的同志也到了。团长作了报告：

“命令已经执行。我团于16时30分，比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没有人掉队。指战员们情绪特别高昂。”①

为表彰步兵第51师在开进克里木时英勇突破敌人的筑垒工事特授予其红旗勋章，该师并获得彼列科普师的荣誉称号。同时，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师长第2枚红旗勋章。而谢·米·布琼尼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则赠送给他刻有题词的一只表，题词是：“给红色领袖和彼列科普和尤顺的胜利者……第51师师长瓦·康·布柳赫尔。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赠”。

---

① 《彼列科普》，载《回忆录文集》，第250—252页。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在给我们讲述彼列科普的故事时联系起了当时的情况。他说：

“孩子们，现在，当火车机车在路经土耳其壁垒时要鸣笛致意。我在琼加尔也听到过这种鸣笛声，那就是我过去的游击队员，第30师的战士们强攻过的琼加尔。鸣笛是为了对在保卫故乡的苏维埃政权中牺牲了的志士表示哀悼。笛声号召青年人以英雄为榜样，追随他们，时刻准备象他们那样去光荣地保卫十月革命开创的伟大事业……”

我童年时一直幻想到那些地方去亲耳听听这些表示敬意的笛声。但那时并未能如愿以偿，一直过了40多年我才终于听到了这笛声。

为纪念苏维埃军人在彼列科普取得胜利而建造的方尖碑附近有铁路线通过土耳其壁垒。我没有发觉火车的临近，却听到了禀报它之到来的内燃机车头发出的长时间的笛声。那时，我不仅想起了父亲，也想起了大哥弗谢沃洛德<sup>①</sup>，想起了他的所有的同龄人。是他们那一代人，在决定成败关键的1941年继承了十月革命近卫战士的战斗传统。他们浴血奋战，保卫着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们也是第二次神奇般地强攻彼列科普的英雄。

内燃机车头的笛声令人激动，同时也显得庄重昂扬。这笛声何止是向牺牲者致敬，也是为胜利者谱写的一曲赞歌。

---

<sup>①</sup> 元帅之子弗谢沃洛德·瓦西里耶维奇·布柳赫尔生于1922年。曾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为表彰其在强渡维斯瓦河时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曾授予他红旗勋章。1963年，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手中领受了这一最高奖赏。

这胜利者之中同样也包括着那些和平时期来到这里，来到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成为第三次胜利地强攻彼列科普的创造者的人们。他们在这里自己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请看，旁边那一条由他们亲手开凿的北克里木运河便是这座纪念碑。它从新卡霍夫卡附近的第聂伯河里取水，笔直地横贯彼列科普，把土耳其壁垒一劈两半，在当年尤顺诸阵地一带的盐湖之间穿行而过，旋又分出众多的支流去充分地灌溉从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到拉兹多利诺耶、占科伊和刻赤渴望得到灌溉的克里木的原野。

这条在整个欧洲无与伦比的人工河道每年给克里木送来50亿立方米的水。仅仅在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地区的土地上，它的流量每秒就达150立方米，这就相当于因古尔河流入南布格河的水量。

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谁知道呢，也许，1920年11月11日第51师师长那份“致全体、全体、全体！”的胜利的无线电战报正是从这里发出的呢！要知道，那时候这地方可是白军筑垒工事的尽头处，附近没有任何建筑物，周围是茫茫一片含盐的荒原。

1932年出现的一个小镇子为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作为一个城市的规模它是直到1966年才具备的。这一点在许多方面正是北克里木运河的建设者们促成的。

如今，在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耸立起了一座“彼列科普三次强攻”纪念碑。在市公园的入口处有巨大的雕塑人像，一个是英雄战士，一个是英雄创造者，他们身后立着3个大圆柱，顶部有彼列科普3次历史性会战的年份，2次是

战斗的“1920”和“1944”，第3次是和平建设的“1963”。  
在石碑基座的铁板上铸上了热情洋溢的诗句：

1920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遥远而严峻的国内战争的英雄。  
你们在红星指引下，  
为了苏维埃国家光辉的明天  
英勇奋战！

1944年，  
勇士，苏维埃人  
曾在这里同法西斯蒂作过  
殊死的、正义的战斗。  
彼列科普的英雄，  
你们的荣耀将永远永远  
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1963年，  
第聂伯河让大地喝足了水，  
荒原上开出了明媚的花朵。  
新生活主人的劳动无上光荣，  
劳动者人民能把一切来创造，  
他们正沿着列宁的道路  
向共产主义迈进！

在纪念碑旁我脑海中浮现起了大学生们告诉我的在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会见的故事。对于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生活的他们来说，1963年本身便是历史。在这里他们受到了特别热情的接待。伏龙芝学校的少先队员在土耳其壁垒上等候他们。孩子们穿着节日盛装，头戴布琼尼式的帽子。雪白的衬衣上缀有红军战士的“标记”，他们向来自乌拉尔的客人介绍这座城市的所有文物、名胜，然后又邀请他们去参观学校的博物馆。

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第2中学的学生争取到以杰出的无产阶级统帅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名字命名的权利已经10年了。他们是以学习成绩优异，品行端正，帮助烈军属做好事，积极收集历史材料工作等各方面的良好表现赢得了这一光荣权利的。以米·瓦·伏龙芝的名字命名学校是由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作出决定授予的。

伏龙芝学校的青少年学生在新落成的大楼里学习，这幢大楼由他们的父母，彼列科普化学建筑部门的男女工人所建造。而那个内容极其丰富的校革命历史博物馆则是在那位不知疲倦的加林娜·伊万诺夫娜·波洛斯科娃的领导下由孩子们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

晚上，我们全体考察队员在市里漂亮的文化宫集会。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B·И·卡拉卡什代表荣获勋章的克里木州的劳动者（这个州有2座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享有在市旗上缀有祖国英雄金星的荣誉）向乌拉尔人表示欢迎。

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发表演说，他说道：“我们彼列科

普是同喀琅施塔得和纳尔瓦，同卡霍夫卡和沃洛恰耶夫卡齐名的。为了纪念第一次强攻彼列科普60周年，‘闪光’①、

‘鹰雏’②等军事体育游戏的参加者‘以战斗的方式’登上了土耳其壁垒，有8000名共青团员从斯特罗戈诺夫卡穿越锡瓦什湖到达利托夫斯克半岛……北克里木运河也是青年们的骄傲。小伙子 and 姑娘们以神奇的彼列科普强攻英雄的热忱在运河上参加劳动。

晚会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学生把他们从乌拉尔公社社员兄弟公墓中挖出的一撮黄土转送给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的年青人，而业余演员们演出的歌唱步兵第51师英雄的新歌使他们兴高采烈。这些歌是大学生们以爱德华·巴格里茨基的诗作歌词谱的曲。在这里，在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他们以特殊的激情唱着这支歌曲。

……那是又一次战斗，  
不要躲避蒙蒙的烟海，不要后退。  
从彼列科普吹来灼热的风，  
火焰熊熊，大炮在轰隆。

呀，痛苦的、令人难忍的光荣。

---

① “闪光”军体游戏，是全苏少年先锋队的军事体育游戏。1967年由《少先队真理报》编辑部首先创办，每年都要举行。——译者注

② “鹰雏”军体游戏，是全苏共青团组织的军事体育游戏。参加的是16—18岁的青年男女，包括中学9—10年级、职业技术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和青年职工。据统计仅1977年一年就有800万人参加这一活动。——译者注



我们浸泡在盐沼里，  
置身于犹如熔岩般的阵阵灼热中，  
我们守护着，手里执着枪杆。

穿越过红色的彼列科普，  
为铁锤和农民的镰刀增添光荣。  
我们使五星的徽号，  
披满了欢腾的荣耀。

## 《在太平洋沿岸……》

父亲是在刚从弗兰格尔手中解放出来的克里木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的，那正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1920年11月16日从占科伊车站向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发出电报之后两个星期的事。电报报告说：“今天，我骑兵部队攻克了刻赤。南线已肃清。”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红军在同弗兰格尔大军进行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非比寻常的英雄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向全国、向全世界宣布：“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就这样被消灭了。”<sup>①</sup>

1920年底，苏维埃共和国的城市和乡村终于盼来了渴望已久的和平。共和国的保卫者虽然很早就不再操持武器了，但他们当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安静的学习机会。这样的机缘对于父亲来说实际上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能出现。

1921年6月初，第51师师长兼敖德萨守备区和全省驻军司令紧急应召去莫斯科，去党的中央委员会。在那里作出决定任命他担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3页。

从那时起，除了到西部几个军区任职2至3年之外，父亲的整个一生都是紧紧地与远东连结在一起的。

不管是谁，无论是乌拉尔第51师和第30师的指挥员、政工人员或者甚至每一个战士，只要他们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南线来，就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这远东共和国是怎么回事，它是为了什么而建立的。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彻底粉碎高尔察克军队的残部，并和捷克白军签订和约之后，在整个西伯利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这一点已十分明朗。可是，俄罗斯并非仅以西伯利亚为限，西伯利亚之外延展开去的几千俄里依然是远东呀……

1920年8月7日，第30师各团进入伊尔库茨克。第5集团军的其他各部随即也开始朝贝加尔湖挺进。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一集结意味着提出了迅速解放外贝加尔和远东地区的任务，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集团军各部曾接到一道极其严格的命令，要他们坚决地守在贝加尔湖—色楞格河—蒙古边境一线，以便尽最大可能配合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建立远东“缓冲”国这件大事的顺利进展。远东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休戚与共，并以其实力作为后盾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

高级指挥员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于不理解党在远东的这一英明的政策的那些盲人是多么生气。人民委员会主席于1920年2月19日在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应当毫不留情地诅咒反对建立缓冲共和国的人，要以开党内审判威吓他们，并要求所有在西伯利亚的人都实现‘不再向东后撤一

步，动员起一切力量尽快把军队和机车向俄罗斯西部推进’的口号。要是我们自己糊里糊涂地退到西伯利亚的腹地去，那我们就真是十足的傻瓜了，因为那时候邓尼金就会复苏过来，波兰人也会打将过来。这将是犯罪行为。”<sup>①</sup>

远东共和国是1920年4月在外贝加尔、阿穆尔、滨海、堪察加等几个州和萨哈林北部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形式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执行的是苏维埃的政策，这是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当时它正力求保证使自己在远东能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

第5集团军各部在自乌拉尔至贝加尔湖一大片辽阔的领土上恢复苏维埃政权，严实地关闭东部边界，并给予将游击队组建成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以切实有效的支援之后，大多数部队经过重新部署很快便开赴西部战场去了。首先去波兰战场的是第27鄂木斯克师。紧接着载着第51师的军用列车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地离开乌拉尔飞驰而去。8月，轮到第30伊尔库茨克师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告别了。如是，担任守卫远东共和国与蒙古接壤的边界的任务就只剩下步兵第35师一个师了。

但是，到1920年底，当同波兰的和约已经签订，弗兰格尔的军队已被粉碎之后，远东之合并于俄罗斯联邦已并非最为迫切的任务，那时在远东的领土上还留有日本占领者的军队。弗·伊·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同日本打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137页。

仗，我们不仅应该尽力设法推迟对日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避免这场战争，因为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情况看来，我们现在无力进行战争。”①

可是，盘踞在蒙古和满洲的反革命匪帮已经迫不及待。1921年5月26日，白卫分子在日本干涉者的支持下推翻了远东共和国的滨海州当局，并成立了以工厂主梅尔库洛夫兄弟为首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临时政府。与此同时，以夺占和破坏贝加尔湖沿岸铁路为目标的温甘纶②分子入侵远东共和国境内的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一带，企图切断远东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联系，进而废弛劳动人民业已取得的一切胜利果实。

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弗·伊·列宁参与下讨论了远东共和国的局势③。

“俄国反革命残余势力，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怂恿和日本高级将领的支持下竭力想在远东共和国领土上建立他们进一步反对西伯利亚和整个俄罗斯联邦的行动基地……”会议通过的决议曾这样指出，“在远东共和国的领土上进一步扩展白卫叛军的势力，可能对俄罗斯联邦造成严重的威胁，现在正面临着重开国内战争，形成外部战线，并再度出现国际资本对俄罗斯联邦实行局部或全面封锁的危险”④。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2页。

② 温甘纶·冯·施特恩贝格（1886—1921），1917年8—10月组织东西伯利亚反革命志愿军，1920年窜入蒙古。——译者注

③ 参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546页。

④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72，类号1，案卷号65，页次255。

决议责成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号召党组织和远东共和国的全体居民动员一切力量，必须作出新的牺牲，务求把白卫叛军从远东共和国的疆域内赶出去”<sup>①</sup>。

由于各方面的情况极端复杂，决定让荣获共和国第一枚红旗勋章的卡霍夫卡和彼列科普的英雄瓦·康·布柳赫尔出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的任务是粉碎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队，但不能与日本人开战，为此党的中央委员会授予其特别全权：“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军队实力……，其他一切都应服从于这一任务。”<sup>②</sup>

我的中小学时代过得很独特。那时，妈妈在莫斯科的一所军事学院里执教语言课程，而父亲日常工作的地点又到了远东，所以每逢假期我就到他那里去。

有时候父亲让我跟他的某一位亲密战友同行。记得有一次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扬·鲍·加马尔尼克亲自带我一起上路。车过贝加尔湖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车窗外刚刚展示出辽阔无垠的水面，扬·鲍里索维奇便拉开他那动人的嗓子唱了起来：

光荣的海，神圣的贝加尔湖……

跟他同行的同志们也都和着唱起这支歌来，可我默不作声。

“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唱？”一级集团军政治委员严肃地问道。

①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72，类号1，案卷号65，页次255。

② 同上。

“我不知道歌词……”

“哈，这可是你父亲最爱唱的一首歌”，加马尔尼克抖了抖他那一大把又黑又密的大胡须说道，“你没有听过这首歌？”

“没有。每次火车过贝加尔湖都是夜间，我都睡着了……”

“那好，这会儿你就不要睡了。学一学这首歌吧，跟着我唱。这不难学，好在现在我把你送到乌兰乌德，完了还要把你带回莫斯科呢。”

我把他的话信以为真了，当然，我是力求不让他这么办的。不过，这以后，每当我来到贝加尔湖边，不管和谁同行，我总要带头唱起这首歌唱这光荣之海的美妙的歌曲……

成年之后，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也曾作过类似的旅行。当时我正担任苏联有色金属部维修工厂管理总局的领导工作和总机械师的职务。我住在莫斯科，但我的活动天地却从希宾到马加丹，从诺里尔斯克到与中国接壤的边疆。那时候我几乎坐车、坐飞机走遍了父亲当年在东部地区战斗过的所有城市。我还经常去伊尔库茨克和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地我认识并结交了许多当年的英雄的人民军战士，许多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光荣的军人。

我从莫斯科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后担任了乌拉尔重型电机制造联合企业的总经理，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再到边疆地区去出差了。但事隔10年之后，从小就倍感亲切的那些地方出乎意料之外地忽然又列入了我的那个工作的地区范围之内了。

1981年，为了保证堪察加、萨哈林、滨海和哈巴罗夫斯

克边疆区的职业技术学校能拥有高质量的师资力量，苏联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在远东建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程教育学院分院的建议。

需要从远东的城市里选择设立分院的地点，于是作为校长的我就开始了这一趟长途跋涉，于我是很有诱惑力的探索性旅行了。

这次旅行极富色彩，因为刚好遇上一系列新的纪念活动前夕。那是远东从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手中获得彻底解放60周年的日子。我没有变更在研究父亲过去作战走过的路途时所选择的准则，凭着对国内战争时期远东共和国及其军队的相当充实的知识开始了这次旅行。我也想顺便尽力最透彻地研究一下当时人民军战士去战斗时所走的路途，照父亲的说法，那些战斗是“为保卫苏维埃远东共和国而展开的组织得并不很好的游击斗争和诞生出一支新的正规军之间的一次鲁比孔河横渡<sup>①</sup>”，研究一下他们去夺取在人民中称之为第二次远东彼列科普的沃洛恰耶夫卡之战的胜利所走的路途。

我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起飞是当地时间子夜1点。喷气式大型客机每隔60分钟都要报一次所在时区的界线。旅客们可以放心地打瞌睡，但我总是无法入睡，也许是由于激动，也许是由于肌体不适应快速的时差反应。

半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到了秋明。这简直是神话。要是在

---

① 鲁比孔河原是意大利与罗马南阿尔卑斯高卢行省之间的界河。公元前49年，罗马元老院下令解散恺撒的军队。1月10日恺撒渡过鲁比孔河，进军罗马，揭开了意大利内战的序幕。后来“横渡鲁比孔河”成为一句成语，作破釜沉舟之喻。——译者注



1919年呢？红军的团队从叶卡捷琳堡到“西伯利亚大门”口，边战边走闹了4个星期；后来又在森林和沼泽地里绕来绕去绕了3个多月，好不容易才从敌人包围圈的火力口袋里钻出来；在突向额尔齐斯河之前，在沿冬季积雪的大路直线从托博尔斯克开赴塔拉和鄂木斯克之前，出其不意地在高尔察克分子的后方和侧翼闹了个地覆天翻。战士们奋力赶路，紧追敌人，又在路上赶了3个星期。

现在，再过半个小时，鄂木斯克也要远远落在后面了。我们朝下看去，只见西伯利亚铁路主干线顺着同一方向迅速向东延展开去。我的思想又折回到过去，折回到那1920年的夏季。从安加尔车站前去迎接卡霍夫卡和彼列科普来的步兵第51师的军人，就当时来说也真称得上是惊人地快速的了。能够保证他们如此迅速地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的又何必是铁路员工一个方面的力量呀……这使我想起了瓦西里·焦尔金这个人物<sup>①</sup>。

那个务实的老头儿

真是没有什么说的

是他想到了要在车子上

让大家吃到热呼呼的菜汤

这也并非偶然。要知道，那时候，师长瓦西里·布柳赫尔也正是这样一个“务实的老头儿”。他下令在卸车时不要灭了野战炊事车的炉子，要象平素一样准备好汤和面条。这一点

---

<sup>①</sup> 苏联著名诗人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中的主人公，这是一个勇敢刚毅、活泼乐观、善于克服困难的英雄战士的形象。——译者注

此前是谁也没有想到过的。看起来这仿佛是小事一桩，但要使两个轮子的炊事车在途中使所有的人都吃饱，都高高兴兴、情绪饱满，可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一路上车子只是在加油和换车头时才停站。

只是当服务员到乘客座位跟前催促：“请把折叠小桌拉下来，准备开早饭”时，我才浮想起上面所述的那一番景象。在进过一小杯煮糊了的纯咖啡作早餐后，睡意也就彻底消失了。

过了布拉茨克，我们迎来了黎明。眼前展现出贝加尔湖的湖面。呀，我多么想放声高唱那首悠远的歌子呀！可是飞机不比火车，飞机上是不让高声歌唱的。连大声朗诵一下诗句也未必合宜。但我实在忍不住了，便情不自禁地低声哼了起来：

我的心象一张风帆  
多么充实  
直直地驰向远方……

然后我从公文包里取出许久以来曾多次陪伴我一起旅行的一个本子，那是一本蓝面的小书，里面有父亲的文章和演说。我把它翻开，第一页上便是他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关于1921年夏季之前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状况》。我翻开这书是因为那里有一张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相片，相片上都是父亲的战友，老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同志。那是1962年10月28日在莫斯科摄下的。那一天这些光荣的同志在一起庆贺远东共和国从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40周年纪念，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红旗勋章。

他们，这些英雄，是远东人的骄傲。相片中央是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彼得罗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6年的党员，弗·伊·列宁的学生。他曾在施吕瑟尔堡服苦役，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被判终生留居于此。十月革命后，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参加了游击队，跟高尔察克作战，成了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在这位布尔什维克元老左侧是莫伊谢伊·伊兹赖列维奇·古别利曼，1902年的党员，外贝加尔第一批工人战斗队的组织者，革命前服苦役的政治犯。国内战争时期，在滨海地区搞游击运动，是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兼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据滨海地区的人说，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所写的著名的英雄人物莱奋生<sup>①</sup>就是取之于他的形象。

在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后面有一位奥莉加·安德烈耶夫娜·拉佐，1914年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参加者，传奇人物谢尔曼·拉佐的战友和伴侣，曾跟随拉佐在游击队里经历了国内战争的整个历程……

我感到很幸福，因为命运不止一次地使我有机会会见这些杰出的人物，我常常听到他们有关那些永远不会泯灭的光辉日子的生动而激奋人心的故事。

几年以前老同志们把这帧极富纪念意义的相片赠送给我，他们还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张庄重的相片上在此以前我所不熟悉的人。如外贝加尔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党的和游击队

---

<sup>①</sup> 法捷耶夫1927年发表的《毁灭》是以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战斗为题材的名作，游击队队长莱奋生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译者注

的两位重要的领导人B·A·博罗达夫金和C·Г·韦列热夫；还有沃洛恰耶夫卡战斗的直接组织者A·B·苏霍姆林和B·Я·普列亚斯金，这两位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军事首长、苏军的将军。

老同志们说，“我们所有的人那时候在这里都作好充分准备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其他更合适得多的同志。谁呢？当然，首先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以及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谢雷舍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托明和雅科夫·扎哈罗维奇·波库斯……

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些战友中间履行党所赋予他的新的负责任务的。在这里，除了指挥员的意志、技能之外还要求具备一个国务活动家的智谋。这就是说，不仅仅要会吩咐别人做事，而且自身必须善于学习、再学习。

远东共和国新任军事部长和全体武装力量总司令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劈头就说：“我来到赤塔，接触到军队的一些情况，发现这支军队处境十分危险。”<sup>①</sup>

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成员、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米·伊·古别利曼的说法与此类同。他回忆道，人民革命军游击习气严重，纪律松弛，装备很差，缺衣少食，人民军战士和军队指挥人员长期领不到薪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革命军依然保持着革命精神，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忠贞不渝和必胜的意志，这是共产党坚毅顽强

---

<sup>①</sup>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65页。

地开展工作的结果。

请看1909年的布尔什维克，阿穆尔州一支游击队的队长B·A·博罗达夫金回忆第一次会见共和国新任部长时的情景，他写道：“这是1921年在赤塔的事，那里正在召开远东立宪会议。我们得到通知说，傍晚要举行一次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军事部长、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布柳赫尔要作报告。我们多数同志不认识布柳赫尔，大家对他的战斗经历和战功也是一无所知。

党团会议开始了。大会让布柳赫尔讲话，一个体格魁梧的比中等个子稍高的人走上讲坛，开始讲话：

‘同志们，我们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打过高尔察克的军队，那时我们是工农红军的战士和指挥员。在这里，在远东共和国的疆域内，从色楞格河之滨到太平洋岸边，到堪察加、萨哈林和千岛，我将和你们一起去歼灭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敌人。现在我们是人民革命军的战士和指挥员。我们这支军队现在换了装。我听说，我们有的指挥员不愿意穿人民革命军指挥员的军装，他们说：‘我干吗要佩戴这蓝色的菱形破布章呀？’我知道，你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游击队的领导同志，都是党的积极分子。同志们，不管你们对这一切多么不乐意，但那都是无济于事的，人民革命军的服装大家还是要穿。我们远东共和国的军队应当和红军一样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是国际形势所要求的。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命令。而他们的命令是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的。我就是这样性格，我有执行我们党的命令的癖好。’

接着，瓦·康·布柳赫尔开始阐述我们面临的任务，他

的讲话充满着‘恰到好处’的幽默话，很快就攫住了整个会场的注意力……关于布柳赫尔大家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印象：是自己人，一员沙场老将，一个行家！”

由于俄共（布）中央代表的坚持，远东共和国政府通过决议成立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这是指挥共和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集体领导机构。3年前，父亲曾担任过乌拉尔各红色游击队的总司令，现在他要领导这个委员会，他“决心一定要铲除军队中的游击习气”，因为他“十分清楚，若是带着跟远东过去一样的一支游击式的队伍，要进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真正的战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之所以下这个决心，还因为从建设工农红军的经验中他深知：“游击队对瓦解和削弱敌人的后方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们不能保证进攻行动的胜利实施。”①

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改组军队……大幅度地缩编人员着手开始了一场整肃军队的斗争。

1937年2月，父亲在沃洛恰耶夫卡战斗参加者的集会上回忆道：“当我们开始把游击队改编成正规军时，不仅仅精简了后勤机关，而且还保证了命令的服从和执行。此外，你们都知道，我们军队还开始改变了成员的年龄结构。在整编过程中我们希望把军队改编成年龄和身体素质都很合适的一支队伍。整编以前，军队里战士的年龄从15岁到70岁都有，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②

---

①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72，类号1，案卷号4，页次35。

②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71—172页。

在1921年6月30日发布的第3号命令中，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瓦·康·布柳赫尔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米·伊·古别利曼指出：“只有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思想教育，由自觉的革命纪律团结起来的战士才能组成坚强的可靠的战斗队伍，只有这样的队伍才能去完成重大的任务。我们首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出这样的战士。”<sup>①</sup>

党政机构在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基干军队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并改善这方面的工作，成立了人民革命军军政部。

从组织上重建这支军队的工作是在继续不断地与温甘纶男爵匪帮的战斗情况下进行的。父亲在决定包括纯军事方面的内容在内的事务时都是与米·伊·古别利曼共同协商操办的，也要广泛地吸收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来参与这项工作。

后来，他有一段较长时间跟费·尼·彼得罗夫一起共事，但不是在共和国的首府，而是远在国外，在中国城市大连。1921年，副总理率领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与日本使者的会议。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费·尼·彼得罗夫向政府提出请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去大连走一趟。

据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证实，瓦·康·布柳赫尔在和日本人进行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对方提出的全部17点协议，如果接受这些协议，就会使俄罗斯的远东变成日出之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殖民地附庸。

---

<sup>①</sup>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201页。

请看，1937年父亲是怎样回忆他一生中第一次承担外交使命的情形：“他们（指日本人。——本书作者注）送我离开会场时对我说：‘希望您顺利抵达赤塔，我们担心您也许会迟误的’。他们的意思是假如我们不想签约，那他们就会找到另外一个政府。因为我们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就要为傀儡政府搞这么一个地盘，日本人便急匆匆准备让白卫军队实施进攻了。

诚然，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我不怀疑，我会到赤塔的，至于谈判，如果需要再开始的话，那就让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吧’。”

事态的发展是这样的。还在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离开大连之前，1921年11月30日，日本将军就让一个军列开进了“中立地带”，这趟军列的车厢里装满写有“消费品”字样的密封的箱子。在车子抵达什马科夫卡车站之前由日本哨兵担任警卫，但在临近“中立地带”边界时，这批神秘的货物的主人变成了白色骚乱分子，他们都是步行到这里来的，随身没有带武器。很快就启封了。箱子里装的尽是步枪和机枪。军官们检查过部属的装备之后，按排、连集合好，又过了一会儿，这些分队合编成了若干个营。他们编好战斗队形，开进了远东共和国的领土。

12月2日，骚乱白军的突击集团击溃了伊曼车站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毫无战斗力的屏护队，利用数量上的优势，沿铁路线迅速向哈巴罗夫斯克方向推进。

父亲到赤塔并没有迟误，他是12月18日到。但他未能消除对哈巴罗夫斯克的威胁。翌日，骚乱白军发起正面进攻，并假道中国领土大宽度地实施侧翼迂回，抵近了阿穆尔



河沿岸地区首府。下达了关于组织坚固城防的命令，但新组建的东方面军指挥部无力执行总司令有关在卡扎克维切瓦地区组建强大的军队集群的极为重要的指示，于是不得不放弃哈巴罗夫斯克。

12月22日夜，人民革命军各部撤到阿穆尔河左岸，5天以后又退到了伊恩。敌人企图包围并歼灭集结在这里的人民军战士，但他们被击溃了，把他们撵到沃洛恰耶夫卡车站去了。

沃洛恰耶夫卡……这里的英雄都很年轻，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偏僻的阿穆尔河沿岸小村庄却已经扬名不限我们国内了。

在欢庆沃洛恰耶夫卡战斗15周年前夕，不知为什么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讲起了德国，他还在三十年代初曾去过那里。他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在柏林，我感到最好的地方是韦登格。这是一个无产者集中的区，就跟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一样。有一次我到俱乐部去。那里正在放映苏联电影。知道吗，工人们看完电影以后起初寂静无声，后来忽然放声高唱起我们远东的著名歌曲来了……”

大哥弗谢沃洛德马上抢着说，“‘沿着谷地，沿着小丘’，是吗？”

“你急什么，不是。”父亲皱了皱眉头，“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不是这么唱！是‘沿着谷地，在山的背后……’过去游击队是这样唱的，后来唱走样了。”

“爸，那不就是‘最后的伤口中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大旗’，”大哥试着想顶父亲，“这听起来更有劲，比……”

可父亲却放声唱了起来：

红旗招展  
阿穆尔河沿岸剽悍的骑兵游击队  
从原始森林中杀来  
杀向那敌人的营垒

“这才更有劲呢，而且主要是更加确切了。好，让我们一起来唱吧。”

斯帕斯克的夜战  
沃洛恰耶夫卡的日日夜夜  
那将是一篇童话  
那将是星星点点诱人的火花

关于这一段在柏林听到歌声的情节，父亲于1937年2月22日在远东地区国内战争参加者召集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曾引用过。他在演说结束时说道：“你们看，沃洛恰耶夫卡的意义多么深远呀，它的影响远远地超越过伊云科兰山，超越过我们大家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疆界……”

当年，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旅行期间，有一次，当神奇的伊云科兰山飘着红旗，山顶上身穿长襟军大衣的红色战士的形象从车窗外徐徐掠过，父亲神情严肃地沉默着，不一会儿清晰地吐出来几句话：

“这就是一切。你们要记住，我们这是在家里……”

如今，无论是哈巴罗夫斯克人，还是因航空事业发达大大缩短了距离而来到他们这里的客人，都已无法在抵近这座城市之前向英雄的人民军战士的不朽功绩表示敬意了。在那遥远的1922年他们曾在沃洛恰耶夫卡为从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哈巴罗夫斯克以及整个远东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

不过，今天与战前的昔日相比也有着毋庸置疑的优越性：现在，即使不离开哈巴罗夫斯克，也照样可以了解沃洛恰耶夫卡了，它好象已经搬迁到市里来了，而且已成为凡来到革命、战斗和劳动传统如此丰富的广大边疆区博物馆参观的人表示虔诚敬意的主要对象了。

我踏上远东大地后的清晨，首先去拜访的便是“沃洛恰耶夫卡会战”全景场所在的地方，我是第一次去那里观赏。这个蔚为壮观的（其规模：周围40米、高6米）艺术创作出自莫斯科的战事画家艺术家С·А·阿加波夫和А·А·戈尔片科之手。全景场隆重的揭幕仪式是1975年举行的。

螺旋形的陡梯犹如伊云科兰山一般盘旋而上。从瞭望平台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整个周围的地形。导游请大家从西南角开始观看全景场。人民革命军的主力，雅科夫·扎哈罗维奇·波库斯的混成旅各部：阿穆尔特别团、第5团、第6团（当时尚未命名为红旗团和沃洛恰耶夫卡团）和第3赤塔团，就是从这里发起进攻的。基干战士们一式穿着人民革命军的制服，游击队员穿着没有面料的农民的短皮袄和老式的毛大褂。

车站小村沃洛恰耶夫卡已为人民军战士所占，有一幢房

子上挂着红旗。战斗发生时当然不会有这面红旗，这显然会暴露目标的。但我们应当体谅画家们的自由想象，他们需要这面旗帜，以便让我们这些参观者立即注意到在那3天激战的进程中总司令瓦·康·布柳赫尔，他的政委帕·彼·波斯特舍夫和东方面军司令员斯·米·谢雷舍夫的司令部所在的地方。

远处，右侧，И·А·德罗贝舍夫斯基的第8号装甲列车正在冲击敌人的装甲车。白鬼子害怕冲撞，当他们发现身后的桥梁已燃起熊熊大火时，连忙逃跑了。铁路线外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基的骑兵团正在机动……

接着，我们的视线又转到了全景场的西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白刃格斗。我方参战的是第5团和阿穆尔特别团的战士。步兵第5团第7连连长沃伦采夫手中举着一面红旗。不久，它就将插上伊云科兰山的山顶……

前景部位是构筑得十分考究的堑壕，那里有刚来到不久的卡佩尔团和谢苗诺夫团的人员，他们多半是军官，作战很凶猛，但掩体内是一片混乱、慌张的景象。

那边，靠北一点，第4骑兵团、舍夫丘克和彼得罗夫一捷捷里茨两支游击队的骑兵排山倒海地飞驰而来。他们那迅猛异常的突袭加剧了敌人营垒中本来已经出现了的慌乱。但见通向哈巴罗夫斯克的路上一队接一队的炮兵、步兵、救护车在后撤。在他们前边一列远去的火车吐出的烟越来越淡了，从一个车厢里依稀可见在沃洛恰耶夫卡吃了败仗的莫尔恰诺夫将军那张满是恼恨的脸……

无论那全景场是何等地鲜明，又是何等地令人难忘，但既然到了哈巴罗夫斯克而不去参观一下伊云科兰山的“现

场”，我是不会甘心离走的。满载我国人民战斗荣誉的神圣遗址无时无刻不在勾起你的怀恋之情，使你思绪联翩，这些恋情，这些思绪是你在观赏即使是最最杰出的艺术作品时也不会生成的……

当天，我就坐火车去奥利戈赫塔方向。应当说，在我国许久以来不仅有一个，而且已经有了两个沃洛恰耶夫卡车站。第2个沃洛恰耶夫卡车站是在开始建设通往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铁路支线时出现的。其实，本来也未始不可给位于横贯大陆的大干线上的这个新枢纽站起一个另外的名称。但沃洛恰耶夫卡这个名字，哪怕是沃洛恰耶夫卡第二也罢，要比其他任何名字有魅力得多，更何况铁路建造者们在天气晴朗时从线路分叉处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山丘顶上那面鲜红的旗帜和手持步枪高踞于敌壕胸墙上方的军人胜利者的塑像。

总之，当年那个真正的沃洛恰耶夫卡离开哈巴罗夫斯克还有好几公里，而已成为英烈墓地的伊云科兰山顶连同耸立在那里的一尊庄严肃穆的纪念碑，作为远东劳动人民战胜白卫匪帮和日本干涉者标志的那座纪念碑，现在则位居于两个同名车站之间的区间地段了。

有那么几秒钟心里有点紧张，激动，我下车踏上第一沃洛恰耶夫卡站的月台。车站的建筑是崭新的，全是玻璃和水泥结构。候车室很宽敞。从候车室有相当宽阔的楼梯通向二楼。这里有一片只有博物馆里才有的宁静。大厅深处，在枝叶扶疏四季常青的夹竹桃围抱之中谢·格·拉佐和瓦·康·布柳赫尔两尊半身雕像安放在高高的基座上。他们在世时没有见过面。传奇人物谢尔盖·拉佐是在父亲来到远东前一年被白卫分子抛进机车锅炉烧死的。而在这里，在沃洛恰耶夫

卡车站上，他们俩永远站在一起。

在车站小镇上也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我不能不到不久前竣工的一幢两层楼的石头房子里去停留一会儿。1937年由远东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父亲的一本书里举过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一次战斗胜利结束之后，有两位沃洛恰耶夫卡的老头儿把父亲拦住了，他们指着被炮弹打塌了的学校抱怨说：“这会儿让孩子们到哪儿去上学呀？”父亲回答说：“重要的是把白军打垮。我们要把他们赶得远远的，要彻底击溃他们，到那时再建造一座比这更漂亮的学校……”真的，沃洛恰耶夫卡的孩子们很快就有了一座新学校。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比以前所有最好的学校更好的一座学校。

顺着东去的公路走出去1.5公里有一个向左的拐角处。通向伊云科兰山有一条以著名的第8通古斯游击队队长伊·彼·舍夫丘克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他什么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呀！1942年10月30日，伊万·彼得罗维奇·舍夫丘克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壮烈牺牲。

我来到小山脚下。童年时期就十分熟悉的那些长满山坡直到山顶的橡树更高、更壮了，可伊云科兰山这一次倒反显得矮小了，但却更加敦实了。也许，是我情不自禁地把它来与伊兹沃兹山作了比较。那座山坐落在此去数千公里之外，那里是亚洲的尽头，也是欧洲的起点。怎么说呢，乌拉尔的伊兹沃兹山比起远东这座姊妹山来气势是要大些，至于荣誉嘛，自然是不相上下的。

一个想法立即钻进我的脑际：在这里父亲于那1922年严寒的2月天里是否曾记起过1918年炎热的7月呢？他是必定会想起的，因为那次战胜凭险隐蔽在几乎是固若金汤的山顶

的敌人并不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作战胜利，而是一个事件，一个意味着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赢得胜利的事件。

在伊云科兰山银装素裹的高原上我顺着边疆区博物馆沃洛恰耶夫卡分馆的守护人细心清扫出来的小路走到一块巨大的铁板跟前，那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题词：

这里安息着 118 位战士。为了  
远东苏维埃的胜利，他们在与白  
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斗争中，于  
1922年 2 月12日强攻沃洛恰耶夫  
卡筑垒工事时壮烈牺牲……

我在英烈的墓地前低头默哀，一面鲜红的大旗每天覆护着这些英烈。早在1928年就耸立在颇具特色的沃洛恰耶夫卡纪念碑白色台座上的一个永远年青的人民军战士每天举着手中的步枪在向英烈们鸣枪致敬。

而在同样的一座白石纪念碑的右侧刻着：

献给  
远东国内战争的英雄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布柳赫尔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劳动人民 敬立

沃洛恰耶夫卡的老同志们证实说：“布柳赫尔哪儿都去，他的出现总能鼓舞指战员的士气，他以自己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去感染别人。每当战斗的危急时刻他们常常见到一个穿着半身短皮袄，头戴耳罩皮帽的熟悉的人影跟他们在一起……

布柳赫尔细心地注视着战斗的进程，有时就在行进中下达各种命令。”①

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的诗人韦涅季克特·斯坦采夫的长诗《总司令》，我是很熟悉的，其中《第三次射击》一章是专写强攻伊云科兰山的英雄的。这一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经过白刃格斗  
攻下了沃洛恰耶夫卡  
通向胜利之路  
就此打开  
总司令  
象是一只受伤的天鹅  
登上陡峭的山顶  
一双白色的翅膀  
停住了唼扇  
暴风雪一阵又一阵滚卷而来  
忧悒袭上他的心头  
这颗心上伤痕累累……

---

① 《苏联元帅瓦·康·布柳赫尔》，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国家出版社，1937年，第27页。



总司令亲眼目睹  
极目所至  
满地横尸  
尸横满地  
他比任谁  
都更感寒意逼人  
他轻轻地、轻轻地在重复  
“死者知多少  
死者知多少”  
那么悲怆、那么凄切  
这轻声呼唤  
梗塞了他的喉头……  
在时间的长河中  
只有英雄人物的荣耀  
万世流芳  
钢也罢、铁也罢  
石也罢、玉也罢  
无法与之并论  
全体英烈  
要在这里埋葬  
埋葬在这伊云科兰山之巔  
我向来不喜好  
迷人动听的颂辞  
但愿我能受到  
如是的荣誉和奖赏  
不管什么时候

当我走完我生命的最后一程  
请你们也把我  
埋葬在此间  
我要和英烈们朝暮相伴……

确实，事后人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立即发布命令：  
“迅速将在沃洛恰耶夫卡激战中舍身忘己英勇阵亡的全体将  
士的尸体收集拢来，把他们安葬在伊云科兰山顶上的阵亡将  
士公墓里，并在墓地上建造一座宏伟的纪念碑。”①

莫斯科、新西伯利亚、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  
托克出版了不少记叙沃洛恰耶夫卡光辉史迹的书籍和科学论  
著。其中，据我想来，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论沃洛恰耶夫卡  
战斗》一文。父亲写这篇文章时事过不久，印象还深。那是  
为战斗当年，1922年在赤塔出版的一本文集《为保卫哈巴罗  
夫斯克而斗争》所写的一篇文章。10年之后，这篇文章又在另  
一本文集《在太平洋沿岸……》中重印，我是在哈巴罗夫斯  
克边疆区科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见到这个文集的。此后，这篇  
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了。

父亲在前言中写道：“人民革命军在沃洛恰耶夫卡、斯  
帕斯克、卡扎克维切瓦和其他地方奋勇作战，给骚乱白匪以  
一系列打击，使其兵力遭到致命伤亡，迫使他们慌忙逃离哈  
巴罗夫斯克，并在其雇主武装干涉者庇护下撤走，在此之后  
也就有可能更加明朗、更加确切地断定我军各部过去和当前  
在战场上所进行的巨大的战斗工作，并对他们实施战斗活动  
的极端困难条件加以阐明了。”

① 《在边境上》，1937年，第5期，第5页。

当谈到战局初期时，作者指出，骚乱白军迅速而突然的进攻使人民革命军配置在乌苏里铁路沿线人数少、装备差、且毫无作战准备的先遣支队陷于绝境，逼使他们先是撤到哈巴罗夫斯克，接着又弃城而走。

初战得胜冲昏了敌人的头脑，于是它决定沿阿穆尔铁路继续挺进，但年底前几天内它已经在伊恩车站附近遭到人民军战士相当厉害的打击，以至于不得不转而防御，并拼命地开始在奥利戈赫塔—哈巴罗夫斯克一线加固工事。

若与人民革命军相比，骚乱白军各部基干人员的专业素养高，指挥人员经验丰富，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为确保战斗力，凡远距离转移都有车辆运送。

在短时间内骚乱白军设置了大量的铁丝网障碍。其中在沃洛恰耶夫卡村前伊云科兰山一带的工事最为坚固，那里不仅有山丘周围的地桩，而且邻近的整个灌木林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这一带的地形本身也为敌人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很有利于它组织步机枪和火炮非常密集的火力配系。

我要饶有兴味地指出，在争夺沃洛恰耶夫卡的决定性交战前夕，人民军战士侦察员成功地弄到了莫尔恰诺夫将军于1922年2月5日签发的第572号密令。其中提到：“我们自身的现实条件要求充分调动一切力量去求取胜利。只有胜利，我们才能生存，失败会剥夺我们存在的可能，因为我们是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①

---

① 《在太平洋沿岸……》，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国家出版社联合公司，1932年，第134页。

人民革命军总司令读到这份文件后得出结论。骚乱白军很清楚，仅仅局限在阵地的技术设施方面是不行的；要想夺取胜利，部队向来都必须有坚定顽强的精神，只有这样，再配上铁丝网，使我们遭致最大伤亡，才有可能在最顺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并发展对我们的进攻。

同时，他对于他的战士们还在准备对伊云科兰山实施总攻的日子里便遇上了多么巨大的困难是十分明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刚应召来队不久，未真正经过战阵的新战士。加之，在此以前他们已在露天呆了6个昼夜，在雪地里挨冻，真所谓饥寒交迫。但大家都能以自己的指挥员为榜样，充满革命激情，胸中只有一个愿望：胜利。他们也真的胜利了！

父亲在他的文章的最后几行写道：“许多光荣的英雄离开了我们的团队，进攻使军队付出的牺牲相当大，但大家如此炽烈地渴望的胜利终于使沃洛恰耶夫卡之战创造了这一实属罕见的功绩。我很难断定哪个部队表现得更加高尚，大家都英勇作战，都视死如归。

战士们在没有剪刀，没有任何剪铁丝网工具的条件下用自己的身体压在铁丝网上，让大家通过。指挥员冒着敌人疯狂的火力在障碍物中间开辟通路，用军刀砍断铁丝网和地桩。

就连敌人也对我们部队的功勋钦佩不已。沃洛恰耶夫卡地区骚乱白军司令阿尔古诺夫上校在逃亡伊曼时说，他要给沃洛恰耶夫卡的所有这些红色英雄授予乔治十字奖章……

敌人在丢失沃洛恰耶夫卡之后丧失了对获胜可能的信心；我军则因控制了卡佩尔分子的这座城寨而现实地感到了

自身革命精神的力量，并深信对敌人精锐的军官部队的最终胜利无疑已近在眼前。

象人民革命军战士在沃洛恰耶夫卡之战中表现出来的无先例的英勇精神，即使在红军中我过去也是很少见到过的。”<sup>①</sup>

有这样一个细节也不无意义：当父亲正在为文集《为哈巴罗夫斯克而战》撰文时，有一个叫B·鲁斯坦-贝克的白军中校也写了有关同一事件的札记。他那时已到了中国。显然，由于没有俄文的出版物，他把写就的文章发表在英文版的《北京—德里新闻》上了。10年以后，B·鲁斯坦-贝克的文 章又从英文翻译成俄文，和其他材料一起出现在《在太平洋沿岸……》一书里。这个文集的编者发表了来自我们敌人营垒中的一个人的纯客观的自白，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这些自白又一次很有份量地证实，无畏的战士为苏维埃远东所创造的一切功绩是多么地不平凡呀。

请看一个过去的白俄军官，以白俄侨民的身份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吧：“这是发生在西伯利亚一个严寒的冬季……人民军队没有足够数量的冬装，食品也匮乏，但全军上下革命精神旺盛。大家决心：要么胜利，要么阵亡。

他们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哈巴罗夫斯克，无论怎么说不能认为敌人是虚弱的，或者是毫无斗志的……他们（指白军。——原作者注）受头头们蒙骗前来与自己的兄弟厮杀，还深信他们是在协助假想的军队，这支假想的军队似乎是在假想的战场上作战，并正在胜利地逼近莫斯科。

---

<sup>①</sup> 《在太平洋沿岸……》，第139—141页。

白军的口号是：‘向克里姆林宫挺进！’他们象雄狮一般凶猛。可怜虫，这些盲目的人们！

可是，那些存活下来的人，那些一旦明白了真相的人，该受到多么大的刺激呀！

人民革命军的首攻目标是沃洛恰耶夫卡。

红军部队总司令布柳赫尔尽他力所能及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他写给白卫分子头目莫尔恰诺夫将军的信充满自信，而且令人感动，历史上未必能找出类似的先例。总司令布柳赫尔在给自已的敌人的这封信里用词极有礼貌，讲究分寸；他是要竭力唤起俄国将军的民族感情，但毫无结果。布柳赫尔没有收到复信，于是实践预言，发起了进攻①。

……激战延续了3天。白军打得非常顽强。全部都由军官组成的一支部队几乎全体战斗员都战死了，只有6个人活了下来。

尽管白军遭到严重失败，他们撤退时却队形齐整。不过战术形势对白军很不利，于是他们被迫撤离了哈巴罗夫斯克。

2月24日，亦即10天之后，向前挺进的红军的战线抵近罗津加尔托夫卡，这是在哈巴罗夫斯克以南110英里处的一个车站。”②

前此一天，1922年2月23日，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事部长和总司令又给莫尔恰诺夫将军发了第2封信，

---

① 这封信的全文刊载于《为哈巴罗夫斯克而战》一书，赤塔，1922年，第87—88页。B.B.杜申金的《从士兵到元帅》引用时作了删节。

② 《在太平洋沿岸……》，第141—142页。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再一次，但这已是最后一次要求您，将军，表现出正直和理智，真正做到不再充当外人的意志强使您在武装干涉者和外国资本家最近的流血企图中去扮演那个残暴的角色。”<sup>①</sup>

白军将军依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理智，在罗津加尔托夫卡和比金车站附近的连连失利使他的部队的士气一蹶不振，他们的退却变得毫无秩序了。

8月19日，人民军战士抵达伊曼城。他们完成了机动，从东面突击敌人的翼侧，终于控制了敌人防御的最后一个基地。

自乌苏里车站起便是“中立”地带了，已遭粉碎的白军残部在这里找到了海外庇护者的刺刀保护。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战争，总司令命令人民革命军各部原地驻止。有几个月的时间出现了平静状态。人民革命军准备投入新的战斗，以最终解放被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侵占的远东。

不久，俄共（布）党中央作出决定召瓦·康·布柳赫尔到莫斯科。1922年7月4日，值离开远东共和国之际，父亲向人民革命军各部发布了告别信；7月7日，星期五，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

对此，当地报纸写道：“为表彰布柳赫尔同志在创建远东共和国国家军事实力的活动中所作出的不平凡的劳动、他的毅力和所取得的成就，部长会议主席向布柳赫尔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并授予他一份证书，指出布柳赫尔同志的名字，对于经受过严寒、饥饿，但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民革命军的

---

<sup>①</sup>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88页。

战士和远东人民共和国人民来说，是永志不忘的。

这份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您为革命和远东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此，部长会议特决定：您将永远是人民革命军的一名荣誉战士，您的名字将永远列在红旗勋章获得者、沃洛恰耶夫卡步兵第4团第1连的花名册上。”

1922年10月，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注意力重又集中到远东，工农红军步兵第1军军长，彼得格勒筑垒地域司令（父亲当时的职务）特别密切地关注自己心爱的部队——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新的胜利。

10月9日，人民军战士胜利地完成了“斯帕斯克夜攻”，13日在莫纳斯特里谢村击退了白卫分子最后的屏护队，20日迫使他们及其主子——日本占领军的头目在谢丹卡车站签署了有关彻底归还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协议。

两天以后，父亲作为派往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彼得格勒使者去参加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大会紧张工作期间，他十分高兴地获悉，人民革命军部队于1922年10月25日开进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给解放了的滨海地区的贺电。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写道：“值此胜利的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的前夕，红军在肃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占领者方面，又完成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使备受日本帝国主义沉重压迫的俄国公民同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了。谨向俄国全体劳动者及英勇的红军祝贺这一新的胜利，并请远



东共和国政府向解放了的各省及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全体工人和农民转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祝贺。”<sup>①</sup>

1922年10月31日，瓦·康·布柳赫尔第一次见到伊里奇，并聆听了他的讲话。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演说。这是他在久病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

伊里奇说，他只能讲几句表示祝贺的短话，他宣称：“首先必须祝贺我们的红军，他们前几天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英勇精神，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肃清了最后一个同苏俄联合的共和国境内的敌人。如果我说，我们大家在这里祝贺红军的这一新的功绩，同时也祝贺这一个看来相当坚决的结束战争的步骤，即把白卫分子的最后兵力赶下海去，我相信，这些话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意见。”弗·伊·列宁等全场掌声静止下来，继续说道，“我认为我们的红军已经使白卫分子长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再来侵犯我们，不可能侵犯俄国或者任何一个同我们直接或间接、紧密或不太紧密地联合着的共和国”。接着，伊里奇又说：“但是，为了免得一下子就流露出过分自夸的腔调，我们同时也应当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红军的功绩和力量，而且有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活动。

有一个时期，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援助高尔察克的协定。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很久，也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根本把它忘掉了。但是，事情总是有过的。如果说，我们已经作到使这种协定不可能实现，使拥有强大兵力的日本人宣布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44页。

撤退，并且履行了这个诺言，那末，这里当然也有我们外交界的功劳。”<sup>①</sup>

自然，布柳赫尔也和大家一样，为伊里奇的这一席话高兴。在那一刻他也许会想起列宁在党内的多年的老战友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彼得罗夫，他在大连日俄会谈期间与之交往甚深，正是彼得罗夫披露了当时他一直感到玄妙莫测的外交和约的实质。也许他还想起了在他离开大连时他对日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我毫不怀疑我会到达赤塔的，至于谈判，如果需要开始的话，就让我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开谈吧。”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只是要作一点小小的更正，当人民革命军的部队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外围的时候，日本人就提前签署了撤离的公告。当时父亲大概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不久正是军事外交工作将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成为党和国家托付于他的主要职责。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1页。

## 应孙中山之邀

1924年，父亲临时调到苏联革命委员会去执行特别重要的使命，不久他领受了一项极其重大的政府工作，出国去了。苏联元帅瓦·伊·崔可夫在《真理报》为纪念瓦·康·布柳赫尔诞辰90周年发表的题为《英雄们永垂千古》的文章中如是描述过这次公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了全世界革命的高潮，也唤醒了远东各国人民。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中国进步力量奋起与外国压迫者和卖身求荣的中国军阀进行斗争。1924年秋天，苏维埃政府应孙中山之邀派遣瓦·康·布柳赫尔（化名加伦）去中国南方担任广州政府的总军事顾问。在他的领导下1926年进行了伟大的北伐。”①

在中国，父亲一直工作到1927年8月，其间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5月曾有8个月的间隙，因为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极坏，返回苏联作治疗。在结束这次国外出差之后他曾计划跟军事顾问小组的同人一起出版一本关于中国的书②。可是，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繁忙异常的职务未允许他实现这个计划。

父亲在中国的一段生活和战斗活动早就引起我特别的兴趣。那时节不仅最最充分地表现出他的统帅能力和外交家

① 《真理报》，1980年11月30日。

② 见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奔腾的中国两年（1925—1927）》（回忆录），莫斯科，1965年，第253页。

的才具，而且也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最最崇高的品质，他善于深入到中国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去，而当时中国的劳动人民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已经走上了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道路。

我妈妈当时也忘我地为中国革命事业服务。她出生在哈尔科夫，在哈尔滨长大，受教育。后来到彼得格勒贝斯基热夫女子学院学习。毕业之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开始在俄国电报局工作，不久被派到北京分局出差。1923年秋，妈妈又被派到孙中山政府的总政治顾问米·米·鲍罗廷的机构工作，而当父亲来到中国后，她就成了他最亲密的助手，担负起翻译、速记员和打字员等多种责任。

我的童年时代父亲和妈妈常常回忆起在中国那段生活的情景，可那时我实在太小了，无法懂得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当我步入中年之后就患上了一种思念中国的“病”，那时我在莫斯科生活和劳动过几年。第一个帮我了解这些事情的就是我已提到过的卓·谢·杜巴索娃。她是一位汉学家，很了解我妈妈，她们在北京一起工作过。

卓娅·谢尔盖耶夫娜把我介绍给曾和我双亲一起在中国呆过的同志们。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会见正好是在他们都准备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想写一写在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最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苏联给予他们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

岁月流逝，在我的图书室里，为纪念1925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纪念以军事顾问、翻译、汉学家身份参加这场革命的我们苏维埃人而创作的书卷越积越多了。总军事顾问本人也为历史留下了久远往事的见证。A·И·卡尔图诺娃的著

作《布柳赫尔在中国（1924—1927）》已经出了第二版。书中收集有父亲在国外执行使命时所写下的大量材料和文件。

有一个问题一直使我感到困惑：父亲出国去中国之前是在什么情况下取了“加伦”这么个化名的？М·И·卡扎宁的《在布柳赫尔司令部里》和基·阿·梅列茨科夫的《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两本回忆录对此作了答复。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办理出国护照时工作人员问父亲，写什么姓，他说：

“就写加林吧。我老婆叫加林娜。”

“名字和父名呢？”

“这个嘛”，父亲迟疑了起来，忽然有了点子：“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卓娅，一个叫弗谢沃洛德……就写上卓伊·弗谢沃洛德维奇吧。”响起一阵欢悦的笑声。有人提出：

“可没有叫卓伊这个名字的呀……”

“难道说起名字只能限在圣徒叫过的圈圈里吗？”父亲反驳说①。

“加林”这个姓起初在中国发音上多少有些变化②。法国通讯社的记者很快就发现孙中山的主要军事顾问是一位体魄强壮的人，他那张显然是欧洲型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意。那末这位经常给中国革命领袖提出各种极其成熟的建议的外国人究竟是谁呢？一则谣言传播开来了，说那是某一位退了伍的法国将军加伦。法国参谋总部的工作人员在人员统计科仔

---

① 见М·И·卡扎宁《在布柳赫尔司令部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第41—42页。

② 指Галин（加林）成了Гален（加伦）。——译者注

细地查找这个姓字，可是当记者们追问时他们只好耸肩摊手，无言以答。于是，那些老练的报人又从另一角度去寻根究底，且终于探明那虚构的法国人不是别人，却是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英雄，应孙中山博士之邀，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顾问、布尔什维克米·米·鲍罗廷，武官亚·伊·叶戈罗夫和军事顾问伊万诺夫斯基（即安·谢·布勃诺夫）同一个营垒那边来到中国的①。

可是，资产阶级报纸的撰稿人费了好大周折去打听这化名加伦者究竟何人，后来他们开始相信布柳赫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俄国人俘虏去的一名奥地利军官，此人乃是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的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直系后裔。

在这一奇谈之后报界又传出另一种怪论，说是布柳赫尔和另外几位苏联著名统帅一起在莫斯科军事学院毕业之后曾到过柏林，在德国参谋总部军事学院进修过②。

当有人把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翻译给父亲听时，他只以一笑了之。

据我看来，M·H·卡扎宁的回忆录对父亲的面貌的记叙很明晰，也很贴切。他写道：“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跟布柳赫尔见面。跟他见面时第一眼给你的印象以至继而永远留在你记忆中的，我敢说便是他那充满幸福的外表和充满幸福的举止；在你面前和你交往的是一个长得英俊，有魅力，但很朴素，同时又很刚强，很持重的人。刚一接触从他身上看

---

① 见基·阿·梅列茨科夫：《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莫斯科，1968年，第121页。

② 见M·H·卡扎宁：《在布柳赫尔司令部里》，第115页。

不出任何特殊的特征，工人、农民、士兵或者军事领导干部的特征。他给你留下的是浓而密的眉毛底下一双灰眼睛中那坦率的目光。他身上既有农民的憨厚，又有工人的自豪和布尔什维克的预见，他曾经历过战壕生活，负过伤，得过乔治十字勋章，因而还集中了他从战争环境的好的方面摄取到的品德：英勇、寡言，判断迅捷，对战友的无限信任，对职责、荣誉、名声的高尚概念。正是这些素质使他经常保持着整洁的外表，端庄的举止和自尊。”<sup>①</sup>

1924年秋瓦·康·布柳赫尔所领导的那个驻中国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人员中有好几十名顾问。他们当中有俄国旧军队的军官，这些人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已经得到充分证明是很有见解，而且是忠于苏维埃事业的“军事专家”；也有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对一切体力劳动具有天然的聪颖和灵巧能力的工农出身的同志。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坚强的集体，他们彼此以传统、知识和生活经验互相补充，互相充实。

最受总军事顾问器重的要数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切列帕诺夫。他曾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两次战争，当过在普斯科夫交战中组建的第一个苏维埃团的团长。我们每年都要纪念这个日子，即1918年2月23日，这是工农红军诞生和接受战斗洗礼的日子。国内战争结束后，亚·伊·切列帕诺夫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毕业，1923年他和我们第一批顾问一起去了中国。他参加了组建黄埔军校领导层的工作，这座军校不久之后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群众运动中发挥

---

① 见M·И·卡扎宁：《在布柳赫尔司令部里》，第114页。

了领导作用。

父亲在他的一本题为《广东（军事事件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的著作中指出：“学校里把政治教育列为一门必修课程，这在中国军队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其任务是培养学员对党忠诚，对敌（军阀和帝国主义）仇恨的思想……

共产党相当重视这座学校，派遣大批干部到学校去，很快他们就掌握了学校的整个政治工作……

国内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学校都有一定的反应。到（1924年）10月初学校的政治影响已经越出了黄埔的范围，成了广州一切政治事件中的一个巨大的因素。”<sup>①</sup>

作为第1军的军事顾问，亚·伊·切列帕诺夫对于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地盘上以及北伐期间的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是出了力的。他常常不得不远离其他苏联委员同志单独工作，没有翻译，无法跟别人用俄文交换意见。父亲总是很称赞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工作，每次都非常认真、专心地阅读他的报告。

1938年，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亚·伊·切列帕诺夫又一次受苏联政府委派到中国去，这次是担任中国军队的总军事顾问了。

亚·伊·切列帕诺夫中将积极参与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他在列宁格勒战线指挥一个集团军。战后，他从事创作，写下了《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一书，出过两版。正是亚历

---

<sup>①</sup> 引自A·И·卡尔图诺娃：《布柳赫尔在中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47页。



山大·伊万诺维奇以自己的榜样激发了许多苏联老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参与者拿起笔来，使革命的苏中合作的光荣而英勇的篇章重又苏生起来。

对于我个人说来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书是尤其珍贵的，因为他在书中叙述了有关我父亲在他一生这一时期战斗活动中的许多有趣的情节，列举了总军事顾问就1924至1927年间中国政治局势各种问题所持的不少极有价值的见解。

亚·伊·切列帕诺夫回忆道：“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一到广州就立即把我们全部喊到他那里去。

我们按规定时间到了他那里。一分钟之后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进来了。他在门口站住了，似乎是想从侧面观察一下我们。我们按士兵的习惯挺直身子，全神贯注地望着这位中等身材，强壮结实，穿着灰色西服的人。游移在浓而密的眉毛底下那双灰眼睛里的一道仿佛能窥透一切的严峻的目光使我肃然起敬。

我们互相作过介绍之后，布柳赫尔就跟大家谈起他这些日子以来观察所得的印象。有时他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好象是希望检核一下他的结论是否正确。这种谈话方式使我们稍稍感到点惊奇，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布柳赫尔不先听听我们作了准备的关于黄埔军校情况的报告。后来我们了解到他早已从广州的总顾问办事处获得所需的事实材料。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理解到布柳赫尔的工作方法的价值。在定下某次战役的决心之前他是从来不听我们的一般性意见的。反之，他总是提前给每个人布置为他准备一个具体问题。布柳赫尔带着具体问题去找中国活动家商谈。在搜集好全部材料之后他便开始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然后定下决

心，向我们公布决定以便执行。

起初，我们还真有点生气呢。怎么会这样呢？总顾问在定下决心之前也不听听“老相识们”的意见。可是，从东征一开始我们就深信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去生这份气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真是料事如神呀！

他说：“整个战争以及每一次战役，首先是数学，要作计算”。我们深信，布柳赫尔对于一切‘敌’、‘我’的计算，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的。”<sup>①</sup>

在中国，父亲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布拉戈达托夫建立了最密切、最友好的关系，布拉戈达托夫也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20年他们曾一起保卫过卡霍夫卡登陆场，冲击过彼列科普要塞。在粉碎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的军队以后，亚·瓦·布拉戈达托夫跟亚·伊·切列帕诺夫一样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他比之我们的许多其他的指挥员来能更出色地向中国革命家传授红军的珍贵的战斗经验。列宁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我想，红军所做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的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sup>②</sup>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在中国工作时化名“罗兰”。在著名的北伐时，他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南方组的参谋长，实际上是瓦·康·布柳赫尔的第一代理人。伟大卫国战争时期

---

① 亚·伊·切列帕诺夫：《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4—155页。

②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第586页。

他的职务是军长，后来出任集团军副司令员，乌克兰第8方面军派驻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代表，1945年占领奥地利首都之后，他任维也纳苏方警备司令。

1979年首都的“科学”出版社第8次出版了退役中将军亚·瓦·布拉戈达托夫的《1925—1927年中国革命随记》一书。作者回忆了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活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为我父亲专门写了一章。他以生动而准确的笔触描述了前去帮助中国同志的一些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象帕·安·帕夫洛夫、维·卡·普特纳、维·马·普里马科夫、А·Я·拉宾、М·В·桑古尔斯基等许多人的情况，他们通过自身忘我的工作加强了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盟和友好关系。这一联盟的源头是列宁。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坚持这一联盟。

我还想指出一点，在军事顾问中间，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中不仅有苏维埃人民的代表。1926年，当父亲接见从莫斯科前来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一批同志时发生过一次迥乎寻常的会见。小组领导人开始正式报告他们此行的目的时，总军事顾问打断了他的话头：

“别着急，亲爱的同志，别着急。我们会有时间谈你的题目的。请你先讲一讲莫斯科的情况，说说祖国，心里头可是渴望得很呀。讲一讲吧，要详尽些。”

父亲能不知疲倦地倾听每一位从苏联转来的人谈论祖国，他对祖国在他来到中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怀着强烈的兴趣。这一次亦然如是。只是在从同志们那里了解到所有莫斯科的消息之后，他才开始详细地向他们介绍广东和中国其余各省的军事政治形势，向他们说明著名的中国将领和国民党

领导人的特点，同时还通报了帝国主义代理人暗中破坏革命事业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

告别时父亲仔细地端详那位小组领导人：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您不是俄罗斯人，我说得对吗？您的发音使您暴露了……”

“完全正确，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那人答道：“我是保加利亚人。”

“哈，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父亲叫了起来，他拥抱了这位新朋友的双肩。

“我知道你们的人民，也知道你们的党。我个人和瓦西里·科拉罗夫有私交……”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结识了伊万·措洛维奇·维纳罗夫，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保加利亚职业革命家，离开中国后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苏联相见过。1929年，伊·措·维纳罗夫为一项专门任务曾来到远东特别集团军，当时父亲正担任这个集团军的司令员，按照父亲的推荐他荣获了红旗勋章。

后来，伊万·措洛维奇成了保加利亚人民军的将军。

1971年，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从保加利亚文翻译出版了伊万·维纳罗夫的一本回忆录《寂静战线的战士们》，他在书中讲述了他在中国和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会见瓦·康·布柳赫尔的情况。

退伍中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孔奇茨是我早已认识的，他过去是第6军军长的军事顾问，北伐时曾在南昌城下打过一场粉碎军阀队伍的漂亮仗。他也出版了自己的《1925—1926年在中国的日记》。

我就是依据这些权威性的史料，以及与写作和编纂《加伦将军》有直接关系的材料和文件来继续讲述父亲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使命在中国的经历的。

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一任总军事顾问是帕维尔·安德列耶维奇·帕夫洛夫。他在国内战争中因战功卓著曾荣获2枚红星勋章、布哈拉金星和银制马刀。军事领导干部的才具和军人的无畏在他身上同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素养结合了起来，帕·安·帕夫洛夫掌握5门外语。不过他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1924年7月18日，在一次视察前线时因发生不幸事故而牺牲。孙中山就这一事件向苏联人民委员会发了唁电：

“帕夫洛夫将军是俄国为中国自由而捐躯的第一位先烈。今殉职，本人不胜悲痛。他是邻邦的英勇、高尚的儿子，死得其所。他增进了俄中两国间的联系，使国民党愈加坚定其决心——不将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进行到最后时刻，誓不罢休。”<sup>①</sup>

苏联政府派遣瓦·康·布柳赫尔到广州接任帕·安·帕夫洛夫的工作。

父亲和孙中山博士之间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24年11月初，在停泊于广州不远处的一艘苏联军舰“伏罗夫斯”号上进行的。中国革命领袖给新任总军事顾问留下了强烈的影响，他浑身上下精力充沛，但使人感觉到，这种精力已临尽头。

谈话结束时，孙中山紧握父亲的手，说道：

“请留在我们这儿，用您的经验帮助我们的事业吧。我

---

<sup>①</sup> 引自A·И·卡尔图诺娃：《布柳赫尔在中国》，第33页。

们相信苏俄，也相信您个人！”①

随后又同中国的将军们会见。在招待会上大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特征：总军事顾问善于专心致志地倾听对方的谈话，并能令对方开诚布公。这个特征使他在制定计划时能够顾及执行者的愿望和兴趣，而这一点在那时的条件下是很重要的。加伦将军一般着中国军装，不佩军阶符号，脚登一双高筒靴子。他说话不慌不忙，充满自信。至于我国的其他顾问，他要求他们做到使与之共事的将军们能够迅速、精确而有创造地去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并给他们以具体的帮助②。

同志们看到，总军事顾问无论在处理大小事务时，都表现出统帅才能。对于他那种军事干部充满自信的逻辑即使是国民党的右翼分子和透散着利己情绪的“联军”的将军们也不能不叹服。他喜欢在笑声中表示自己对形势的评估。一些动摇分子往往在他的清醒的估计下不得不退让下来。对他的论断表示赞同。

不过，总还是发生了对总军事顾问的工作立即造成很大困难的情况。

孙中山和他身边的一些近侍认为征讨北方军阀的思想事关大局。瓦·康·布柳赫尔担心，孙中山再次提出立即实施北伐的要求。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只好对孙中山的计划持坚

---

① 见伊·措·维纳罗夫，《寂静战线的战士们》，第161—162页。

② 见亚·瓦·布拉戈达托夫，《1925—1927年中国革命随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02页。

决反对的态度了<sup>①</sup>。

瓦·康·布柳赫尔意识到国民革命军的队伍要是还没有达到必要的统一，北伐就不能开始，因而在一份关于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附录中指出：

“经验告诉我们，它（指北伐。——瓦·布·注）只有在后方（广东）充分巩固，邻近各省的形势对之有利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展。而眼下这些条件一个也不具备，故而北伐的问题应当推迟到国民党在广东得到完全巩固以致消灭陈炯明的问题解决之后再予考虑。此外，我们也没有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博士（指孙中山。——瓦·布·注）又想提出这个问题时，必须迫使他放弃北伐并说服他应当更多地关注广州，必须转而进攻汕头这件大事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我在此间的主要工作，我将坚持必须转而东征，而且务必不迟于元月的下半月开始。”<sup>②</sup>

布柳赫尔坚定地把东线问题列入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议程。他在同苏联同志谈话时说道：

“能不能从僵死的观点上推动一下这个问题呢？这主要取决于廖仲恺（孙中山忠实的战友。——瓦·布·注）在他寻找眼下广州所缺乏的资财时的毅力。我寄希望于他的毅力，也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使国民党的领导人赞同东征。而且我就东征计划向孙中山博士提出的预想报告，他们曾经认可过的。只有东征胜利

---

① 见亚·伊·切列帕诺夫：《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第173页。

② 引自A·И·卡尔图诺娃：《布柳赫尔在中国》，第125页。

之后才谈得上北伐。”<sup>①</sup>

经过总军事顾问一个半月对国民党将军们的影响，他们总算接受了他关于必须毫不迟误地转而向陈炯明将军发起进攻的思想。一月底，通过了进攻的决定。

进攻于1925年2月1日开始，恰好一个月之后苏联驻华大使П·М·卡拉罕向莫斯科报告：“由我国教官领导的部队，尤其是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的师冲锋在前，往往在最困难的地方给敌人以打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广州全体将军表示赞扬我们的指挥人员特别是布柳赫尔同志的电报……我们的同志总是冲锋在头里。按中国的规矩一个将军通常是稳坐在离战事地点至少一百俄里之外，而布柳赫尔同志一反中国的常规，在战场上常常身先士卒。在一次十分危急的时刻他甚至率领一辆装甲列车。这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士气。”<sup>②</sup>

由于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1925年底肃清了广东全境的敌军。这些胜利对于提高国民党的威信意义非凡。

“孙博士过去在军事上的失利使许多中国人不得不认为国民党人是一伙无能的对中国各种事态的社会进程不具现实影响力的庸人。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敌人，而且也有同情国民党的人。”总军事顾问如是确认，继而他得出结论：“一战而胜陈炯明，粉碎广东境内的强敌表明了党的生

---

① 见亚·伊·切列帕诺夫，《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第174页。

② 同上，第429页。



命力，也表明了她在背后的现实力量。这无疑会引起敌人更认真地作好同她争斗的准备，但同时也加强了党在同情她的各阶级和各阶层居民中的威望，并促使党在党员数量上得到发展，这就会扩大党对周围国民革命运动总的进程的影响。”<sup>①</sup>

国民革命军的实力随着每一次新的战斗战役的进行而得到加强。强攻惠州城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攻占惠州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中的转折点。

攻克城堡非常困难。惠州城三面围水，城墙高而又厚。从陆路进城只有城南一条道。城堡历来被认为是不可攻破的，几百年来曾发生过37次攻城的尝试，但全都徒然无效。它甚至有过被围数年的经历。可是在年青的革命军猛烈的进攻面前城堡第一次顶不住了。革命军进攻的劲头是如此之高，以致无论是水障还是高墙都无法阻挡住英雄们攻城的决心。

10月13日，黄埔第1师的部队投入强攻。由顾问吉列夫指挥的炮兵向城堡猛烈开火。黄昏时分第1师以强大的攻击摧毁了北门，但敌人对着城门又拉上来2挺重机枪，把通路堵住了。在城门前端还发现另一种障碍物，那是埋在地里的削得光光的竹杆子和浸上毒汁的铁钉。但这也没有能阻止勇士们的强攻。次日，攻击又以新的力量开始了。傍晚，第4团炸掉了那2挺机枪，从北门突进了城堡。不久它便完全投降了。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前推进。

---

<sup>①</sup> 引自亚·伊·切列帕诺夫：《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第429页。

从当时的文件可以看出，总军事顾问瓦·康·布柳赫尔对国民革命军战士的战斗素质评价很高：“虽然大多数士兵思想不大开放，文化程度不高，但不久就达到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士兵们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现代化武器的使用技术。他们非凡地忍受了征战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勇敢而无所畏惧地投入战斗。当炮弹和子弹呼啸着飞过头顶时，他们表现得十分镇定。他们在防御中沉着冷静；进攻中勇往直前。只有当军官撤走时他们才离开战场。正是那帮军官要对中国军队的坏风气承担主要的责任。”<sup>①</sup>

父亲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应：“士兵、下级军官和军队中的一些党代表，其素质不仅胜过上级军官，而且他们作战勇敢，常常是5个敌人还顶不上他们一个……第1团只是稍稍地而且是很肤浅地接触到一点政治工作的边边，就向人们表明，无须多久，渴望自身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必能造就出一支捍卫自己的军队，在这支军队面前，那些讽刺、嘲笑者都将被迫闭口，而中国人民的朋友则将发出一片赞叹之声。”<sup>②</sup>

1925年夏末父亲病得很厉害。Л·М·卡拉罕将军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报告说：“非常遗憾，加伦不得不离开中国，因为他完全病倒了，绝对不能让他再继续留在那里了。让他离开中国，这是很遗憾的事，因为他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一个军人和政工人员的双重品质，这是其他任何工作人员所不及的。他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环境，在那里达到了应付自如的

---

① 引自А·И·卡尔图诺娃：《布柳赫尔在中国》，第45页。

② 同上。

程度，他有一种能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刻意识到应当怎样采取正确决心的触觉，实在令人叹服不已。”①

9月下半月，当时他已到了中国北方的张家口，父亲写过一篇以《广东》为题的战事随笔，紧接着又写了一篇指令性文章：《南方今后工作展望，或称1926年国民党军事工作大计》。文章作出结论：“因为现在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没有了后患，因为消灭邓本殷或者说西南方面的问题以及消灭陈炯明残部或者说东线方面的问题已不存在特别的困难了……，所以现在提出使国民党的影响范围扩大到北方，并使它在华中登上政治舞台是适时的……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提北伐，并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次北伐可于1926年下半年初开始。”②

在此之前总军事顾问一直在力争经过去苏联作长时间的治疗之后再回到中国来。当他不在时制定的北伐计划方案规定要同时进攻敌军的两个主力集团。对此布柳赫尔表示不同意，他一再说明对付主要敌人必须坚持各个击破的原则。

他在1926年7月5日的报告中写道：“自我来到之后一开始以至后来的所有时间我就一直把改变这个计划作为自己的任务，并且把作战的范围局限在湖南省境内。经过许多次会议，我总算于6月23日说服他们（指中国将军们。——瓦·

---

① 亚·伊·切列帕诺夫：《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第429页。

② A·И·卡尔图诺娃：《布柳赫尔在中国》，第196—200页。

布·注)同意改变计划并否定了立即向江西出动的方案。”

应当说明，父亲所坚持的力争求得一个合理的作战计划决不是偶然的。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尽快解决革命武装力量赢得胜利的任务，而中国指挥部的上层则是以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的。

北伐的新计划是依据总军事顾问6月23日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制定的。作战行动的目标是攻占武汉这个“帝国主义走狗”吴佩孚的“巢穴”，进而再与国民军会合<sup>①</sup>。

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国民革命军各部转而向东去攻打另一军阀孙传芳并解放江西和其他各省，随后革命军再向北挺进，以粉碎其余的军阀，解放北京为目标。这个计划把作战艺术和对政治因素的极清晰的估算结合了起来。

“国民革命军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北伐的：天气奇热，霍乱猖獗，再加上道路崎岖，只有一些蜿蜒于水网稻田之间的狭窄小道……

1926年7月12日Л·М·卡拉罕向莫斯科报告：‘如果在一周之内广州的军队确实能拿下长沙并占领长沙以北的全省……那末这在此间，在北方也会产生极大的效果，这将对吴佩孚的又一次足以使其彻底垮台的沉重打击。’”<sup>②</sup>

国民革命军在醴陵城下首战告捷。继而又攻下了长沙。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在解放湖南省之后向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神速推进。

<sup>①</sup> 见亚·伊·切列帕诺夫：《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第433—434页。

<sup>②</sup> 同上，第456—457页。

国民革命军多次投身白刃格斗，跟敌人拼刺刀。8月27日凌晨，他们集中全部预备队，重新发起冲锋，并一举摧毁了敌人，敌人开始仓惶撤退。当他们获悉在和谁作战时，一个个吓得魂飞胆战。结果表明，敌人以12个团对付国民革命军的6个团。如是则战果确属辉煌，敌人一半兵力被歼。

武汉解放之后，国民革命军的任务就是要胜利地进行打击孙传芳的战役，孙传芳是江西省的统治者。

由加伦出色地拟制的江西战役的计划全部被采纳了，他又草拟了进攻命令，对每个军的任务都有详细的指示，甚至还预示了敌人可能的行动方案，命令译成了中文。总军事顾问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用大兵力去硬碰敌人的坚固设防阵地，这时候应当通过迂回这些阵地，从侧翼给以打击的办法解决问题。

10月底开始了北伐的第二阶段。在那些日子里布柳赫尔写道：“孙传芳的部队打得不错。他们的特点是外表比我们壮观阔气，装备好，机枪和火炮很多。虽然他们在技术装备和人员数量上占优势，但我们这些南蛮兵在战斗中的表现却是怎么嘉奖他们都不会过分的……我们的胜利是用非凡的顽强，用刺刀和夜战夺来的……”

孙传芳的军队以及江西的地方部队最终败北是在11月5日。从南北夹击他们的残部，将其解除武装是9日的事情。一共缴获近4万支步枪，好几十门火炮和许多挺机关枪……九江和南昌地区充塞着俘虏兵，总数超过4万人。”<sup>①</sup>

<sup>①</sup> 引自B·B·杜申金的《无产阶级的元帅》一书，莫斯科，1974年，第95—96页。

国民革命军的队伍攻进了安徽省，并于1926年11月底拿下了省会。敌人顶不住革命军强大的攻击，开始向上海和南京撤退。

进攻上海时传来消息说，上海的无产阶级起义了。孙传芳的军队威胁要进行残酷镇压。布柳赫尔急电B·H·帕纽科夫（当时正指挥上海方向作战的司令官白崇禧的顾问）要他们以最快速度发起进攻以拯救上海的工人群众。他十分了解白崇禧将军反动信念甚深，所以建议用作战构想把发动进攻的意图隐蔽起来<sup>①</sup>。

然而，这一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当时足能左右形势的白崇禧的集群在上海郊外停驻了下来，看来是要等待上海的反动势力把起义工人镇压下去。但工人们表现得非常坚强，他们控制了城市<sup>②</sup>。

进攻中的军队在解放上海之后又解放了南京。这是中国革命力量的一次大胜利。

中国的平民百姓以巨大的热情报答苏联人在他们的斗争中所给与的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

A·赫梅廖夫顾问写道：“在解放了的各省，尤其在发生过作战行动的地方，加伦将军是特别受人敬重的。只要一进城，不管他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向他表示热烈欢迎。比如，当加伦进入南昌城时，他的坐骑一进入市区，一直站在司令部门口的沿途的老百姓便呼口号，鼓掌，对他表示欢迎。

<sup>①</sup> 见A·B·布拉戈达托夫：《1925—1927年中国革命随记》，第203页。

<sup>②</sup> 见亚·伊·切列帕诺夫：《一个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日记》，第537页。

加伦这个名字在中国老百姓中间是有名望的。如今，我们全体苏联顾问的名字都变成了加伦。”①

我们的顾问始终坚信为正义而斗争的思想在军队的士气方面是起决定作用的。他们在中国进步人士的头脑中培植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这一点就连中国革命的敌人也是一清二楚的。

的确，政治宣传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武器，通过宣传使士兵第一次懂得了他们是在为土地、为工作、为挣脱一切剥削制度赢得自由而斗争。伟大的北伐战争消灭了在华中和华南作威作福的军阀。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一下子扩大了4倍，解放区的人口增加到1亿5千万。中国共产党经受了锻炼，成长了起来，中国革命的基础大大地拓展了。

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在国民革命军里工作的苏维埃国家的代表对这一胜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瓦·康·布柳赫尔代表大家发表讲话：“我们，苏维埃人有幸光荣地肩负起把自己的革命经验，把我们的精力和知识用以完成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伟大的中国人民从军阀政权和帝国主义桎梏下获得解放的使命，我们为此感到自豪。”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17日的《解放日报》在谈到苏联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间给与中国的支援时写道：“应当记住，那时候革命的中国遭到了帝国主义者们的封锁和包围……只有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给

---

① 引自B·B·杜申金：《无产阶级的元帅》，第97页。

② 引自A·B·布拉戈达托夫：《1925—1927年中国革命随记》，第203页。

与了中国革命以帮助。由于苏联的直接帮助很快地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sup>①</sup>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博士在北京逝世了。他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形势变得尖锐起来。党内的反动人物担心工农运动会越出他们的控制，进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蒋介石就是这类情绪的代表，那时他为夺取国民党领导机构和军队最高指挥的权力真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和国内解放运动的规模在帝国主义营垒中引起一片惊慌，于是他们公开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同时帝国主义者还决定要从内部来分裂统一的革命战线。由于国际反动派不吝惜重金收买并兼施压力，主要是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致使蒋介石彻底撕下了过去那副“左派”国民党人的假面具，于1927年4月12日进行了反革命的大转折，并中止了和共产党的一切合作。

全国开始大逮捕，对革命工人和共产党人处以极刑。中国革命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了，于是不得不将其中断下来。

---

<sup>①</sup> 引自B·B·杜申金：《无产阶级的元帅》，第97—98页。



## 在祖国远东大地上

在哈巴罗夫斯克，在现今高大的建筑物中间我特别珍爱那幢外表上很少引人注目的古老的二层砖房。在父亲诞辰78周年前夕，正如1968年11月21日的《太平洋晨报》报道的那样，在这里，伊斯托明街53号的楼房前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

市委书记A·A·伏洛申，哈巴罗夫斯克市执委会主席IO·B·多姆宁和红旗远东军区司令部政治处主任И·И·谢尔比纳少将小心翼翼地 from 墙上扯下了遮布，哈巴罗夫斯克人眼前亮出了一块纪念牌，上面刻着：

国内战争的传奇英雄，  
苏联元帅瓦·康·布柳赫尔  
故居（1938年以前）

战后我第一次拜谒这里是在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前一年。又过了不算短暂的15个年头，而今我又一次来到从小就十分喜爱的这所房子跟前。当我读完纪念牌上刻着的这些金光闪闪的字眼时，我惊异地感到此时此刻仿佛父亲来到了街头……。

他刚刮过脸。他那笔挺的军上衣的红肩章上，缀着元帅的星徽，勋章在胸前闪烁。父亲以习惯的动作检查帽子是否戴正了，在发亮的皮带以上是否有皱褶。他跟司机握手道贺之后，简短地对他说：

“时间很充裕，先上建筑工地去吧……”

汽车还没有开到谢雷舍夫街就停下了。这儿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青年人都在等待它尽快竣工，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则每天都专注地关心着工程的进展情况。远东籍的战士们在共青团大街上建设了一座4层楼的新学校。大家都在突击干活儿，2个半月，更精确些说整整72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边疆区的老住户们回忆说，“元帅关心的何止只有这一座学校呀，什么事他都放在心上。领导大家在今天的贝阿铁路干线沿线找矿，给苏城<sup>①</sup>人供应木材，替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张罗水泥……”

那一年，当我到这个年青城市来的时候，它刚庆祝过建城35周年，在为第一批建设者树立的纪念碑前市委书记说道：

“要知道，你父亲完全有权列入这些人的名单中。1932年5月，他跟第一批建设者一起在这里安营扎寨。1933年6月12日，就在这里，在这荒无人烟的阿穆尔河岸上，共青团请他为我们工厂第一个主体车间奠基……”

我还记得，父亲常常以作为崇高的战斗奖赏授与他的一枚“光荣的契卡工作者”证章而自豪，并且总是把它和各种勋章一起佩在胸前。很久以来我老在想着，究竟因为什么具体的事迹他竟获得了这样一枚难得的奖章呢？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捷连季·德米特里耶

---

① 苏联滨海边疆区一城市名，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东，现名游击队城。——译者注

维奇·杰里巴斯的儿子帮我找到了答案。有关杰里巴斯的英勇无畏和无可指责的忠诚在三十年代是有口皆碑的。几年以前安德烈·捷连季耶维奇给我寄来一本杂志，上面有记叙他父亲的事迹的文章。从中我获悉了远东契卡工作者怎样在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积极协助下把日本间谍大王土肥原贤二本人象俗话所说的那样“给耍”了的一段历史。

关于这件事请看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吧。

“有消息说，土肥原和‘俄国法西斯党’头目罗德扎耶夫斯基一起准备派遣35名臭名昭著的歹徒越境。杰里巴斯知道，经验丰富的日本间谍是不会搞一般的武装挑衅的。

他们十分秘密地把匪徒装在用铅印封好的载货车厢里，运到铁路终点站，然后用有篷布盖严实的卡车送到阿穆尔河岸边，再让他们登上炮艇……

尽管他们做得似乎是天衣无缝，但在苏维埃岸边这批匪徒还是遇上了边防军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许多破坏分子被击毙，有一部分投水游过阿穆尔河返回，但也有几个人登上了我方领土。契卡工作者对他们实施监视。不久，有一名‘匪徒’来到杰里巴斯的办公室。这是一名在白俄侨民组织中工作的苏维埃侦察员。

“我们接到任务：潜入布柳赫尔的司令部……”他向杰里巴斯报告说。

杰里巴斯想，‘他们在边境上搞这次挑衅活动原来是为了这个目的呀！牺牲30名俄国侨民，好让他们当中的一头“笨驴”抵达哈巴罗夫斯克！我能认出土肥原贤二的笔迹……’

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秋夜，杰里巴斯去找布柳赫尔。他即刻把出现的情况告诉了司令员。他说：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日本人派了人来，他带有钻进你的司令部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人，我对他充分信任。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做下去？要是让他到司令部来，那就必须准备一些象样的材料。’

布柳赫尔听了杰里巴斯的讲述，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

‘看来还值得闹腾一下。不妨试试看，放他进司令部来……’

就这样，我们给日本军事当局发了好几年的假情报。‘无敌的’日本情报部门对他们的成就坚信不疑。根据这些情报他们制定关东军的战术计划，变更兵力部署。而红军的阵地也作出相应的改变，造成了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会有利于我军的阵势。

与此同时，契卡工作者成功地获得了许多有关日本帝国主义者意图的重要情报。在这场争战中逮捕了几十名日本特务和破坏分子……”<sup>①</sup>

1934年1月初，远东边疆区第十一届党代会选举父亲为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在那次会上，他象4年前一样又一次被授权在全国共产党人最高会议的讲坛上发表讲话。在2月8日的演说中他说：“同志们，我在这里所代表的远东边疆区，是我国遥远的地区之一。它处在当今国际政治事件尖锐冲突的地区，现在已经直接与正在狂热地进行战争准备的日本毗邻在一起了。”

远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向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的劳动

---

<sup>①</sup> 《边防军人》，1976年，第10期，第87页。

人民保证，并强调指出：“我们永远不会把苏维埃的远东拱手出让。在这一点上我的信念不仅是建立在红军实力的基础上，不仅建立在红军的技术装备、其忠于革命和我们党的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基础上，而且也是以边疆区本身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为后盾的。

全军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提高警惕，时刻作好战斗准备。”<sup>①</sup>

红旗特别集团军始终坚定地信守这一准则。在整个战前年代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的确确是工农红军的一个战斗军团。

1937年12月父亲被推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市选举前召集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他说：“我的一生，也就是一个苏维埃国家工人农民的一生。我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成长为军事政治活动家，那完全是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指引我、教育我的结果。

我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小小的分子，是广大群众中的一个服从于工人农民意志的分子。我可以斗胆地说，从1917年到今天，我一直是老老实实地在履行着对自己阶级所承担的职责。

我向你们保证，今后要是仍能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将努力真诚地做到不辜负这一信任。”<sup>②</sup>

代表候选人在结束自己的演说时，说道：

---

①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记录》，莫斯科，1934年，第629—631页。

② 《布柳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76页。

“我要对你们说，我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也曾说过，一旦远东发生战争，远东特别集团军，从红军战士到集团军司令员作为无限忠诚于革命的士兵，将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要让资本主义的根基在受到这次打击后开始坍塌，有些地方甚至立即垮下来。”<sup>①</sup>

还在1936年11月底，红旗特别集团军就曾打退过日满军队在兴凯湖地区的第一次入侵。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后来改编成远东红旗方面军。1938年8月，在哈桑湖附近的战斗中又使日本挑衅者遭到一次新的、更加致命的失败。于是，在它的歌词中当时又出现了新的段落：

在渺无人迹的无名高地旁  
敌人从满洲彼岸爬来  
我们强大国家的人民  
把敌人从祖国大地上撵跑

---

<sup>①</sup> 《布抑赫尔文章和讲演集》，第178页。

## 祖国将永远怀念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工农红军诞辰20周年之际写过一篇《布柳赫尔元帅》的随笔。他在文中举出这样一则有趣的事实：“当布柳赫尔回忆彼列科普那次战斗时，引用了巴格利茨基的几句诗：

驱散那滚卷着血滴和尘土的  
浓密的烟波  
我们把红旗插遍了  
克里木喧嚣的海岸

统帅和诗人就这样相见。这个情况似乎微不足道，但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无产阶级军队的司令员懂得并热爱诗篇，诗对他来说十分亲切。”<sup>①</sup>

1935年11月14日，父亲读到了当天发表在《红星报》上的他的文章《勇敢者的胜利》，当时他正在莫斯科近郊“巴尔维哈”疗养院治病。事隔一周，中央各大报纸都刊登报道，根据1935年9月22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工农红军5位最杰出的统帅以苏联元帅军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

<sup>①</sup> 《新世界》，1938年第2期，第218页。

赫尔便是受领这份荣誉的5个人中的一个。

次日，有一批正在写作步兵第30师历史的作家来到“巴尔维哈”。他们特别关心父亲担任过第一任师长的这个兵团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一年以前，继夏伯阳第25师之后，全苏主席米·伊·加里宁曾亲自授与由全俄中央执委会命名的伊尔库茨克红旗第30师以祖国的最高奖章——列宁勋章。

作家们和国家第一批元帅之一的布柳赫尔的谈话，时间很长，谈得很详细，光是父亲的一篇发言稿就有52个印刷页。那末，是哪些人在听他讲呢？他们当中有：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阿尔乔姆·韦肖雷、季娜伊达·里希特、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列夫·尼库林！……

45年过去了，1980年11月14日，在莫斯科法捷耶夫中央文学家之家，诗人和作家们又一次济济一堂举行以布柳赫尔为主题的晚会。大家欢聚在一起庆祝这位统帅的90寿辰。会上许多人讲了许多事，其中有的当年曾跟他一起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南征北战，有的在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十分眷恋的远东会见过他，也有的是今天正以他为对象从事科学著述和艺术创作的人。

父亲的同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诗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苏尔科夫宣布晚会开始。

他说：“在雅罗斯拉夫偏僻荒凉的小村巴尔欣卡，当地一个贫苦的农奴家里诞生了一位统帅人物，是苏维埃政权培植他成为杰出的统帅。我也是这个县、这个乡的人，而且我也曾在这位后来的苏联元帅就读过的学校里念过书，只是他



比我早两年，为此我感到骄傲。他那光辉的一生令人信服地证实，革命是敢于从‘底层’群众中提拔有才能的人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为普通人开辟了广阔的前程，这个制度以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武装他们，从他们中间造就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动荡的三十年代曾在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服役过的历史科学博士尼·尼·阿佐夫采夫教授作了关于共和国第一位红旗勋章获得者的战斗、军事政治和国务活动的报告。学者在评价国内战争的结果时说道：

“多民族的俄国实心实意地理解十月革命的伟大真理。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夏伯阳这样一些火一般热情的战士，犹如雷击闪电似地跨进了历史的洪流，成为传奇式的英雄。而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第一批苏联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克里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都是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国内战争的著名军事领导人，还有20位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在这些交战的烽火中开始了他们的战斗历程的，后来也都成长为苏联元帅。”

晚会参加者热烈欢迎1917年的党员、退役上校伊·瓦·扬科夫斯基的讲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曾在父亲的步兵第51师里担任过装甲营营长，因为在保卫卡霍夫卡登陆场的战斗和彼列科普的强攻中表现出英雄主义和无畏精神而荣获2枚红旗勋章。

第一批苏联英雄之一，空军上将格·菲·拜杜科夫谈到

了英勇的奇卡洛夫飞行小组沿莫斯科——远东航线实施洲际不着陆飞行的事迹。当时政府规定的飞行终点应当是堪察加，但瓦·巴·奇卡洛夫在征得副驾驶员格·菲·拜杜科夫和领航员亚·瓦·别利亚科夫的同意后决定继续飞行，直到哈巴罗夫斯克。但到鄂霍茨克海上空时AHT—25红星号飞机结冰了，于是只好在阿穆尔河谷口作强迫降落。

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把飞机和机组人员从遥远的乌德岛上营救出来。他派军人建设者乘快艇到现场去，在规定时间内把木制的起飞跑道安置好。

格奥尔基·菲利波维奇讲述道：“1936年8月2日，我们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一到机场立即受到布柳赫尔元帅的热情欢迎，四天四夜我们成了非常好客的哈巴罗夫斯克的客人。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在答报界人士问时强调说，我们这次飞行对于远东人来说意义实在太大了，对开发人迹罕至的北方边疆地区作出了新的贡献……我们是坐了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安排的用丝绸贴面的暖车厢回到莫斯科的，这也是政府给予的第一次崇高的奖赏……”

我以极大的兴趣谛听了苏联英雄安·拉·格特曼的发言。

安德烈·拉夫连季耶维奇回忆道：“我是在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毕业之后到布柳赫尔元帅的远东红旗集团军去的。我去的时候那里正和日本侵略者在哈桑湖一带发生战斗。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那时已担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尽管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接见了我们。

哈桑湖的战斗时间不长，后来在蒙古境内哈拉哈河一带又接续发生新的更激烈更长久的战斗。1941年秋，我带领一

个坦克师离开远东红旗集团军去参加莫斯科保卫战。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举办我国的一些高等军事学校了……”大将强调指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以自身顽强的毅力和忘我的劳动对战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事业，从而也就是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只可惜他已经无法再参加这场大战的各次交战了……”

列宁奖金获得者、作家奥斯卡尔·库尔加诺夫和战士诗人谢尔盖·奥斯特罗沃伊讲述了他们早年到远东创作出差的情形，讲到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渴望使全国人民都了解过去的边远地区经过苏维埃人的劳动从一个充满苦役和不幸的穷乡僻壤变成了拥有大工业的边疆区，变成了社会主义祖国最富裕、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的那种强烈的心情。

在中央文学家之家举行的晚会还使我想起了与电影导演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和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尼古拉·古边科的那次会见。他们根据尤利安·谢苗诺夫的同名作品《不需要暗语》创制的影片第一次在电影艺术屏幕上再现了父亲在担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和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时的形象。

1980年底，国内许多其他城市也都广泛地开展纪念苏联元帅瓦·康·布柳赫尔诞生90周年的活动。人们纷纷邀请我重访卡霍夫卡和克拉斯诺彼列科普，车里雅宾斯克和上乌拉尔斯克。从基洛夫、彼尔姆、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也发来了邀请信。当然，要到所有这些地方去践约是根本办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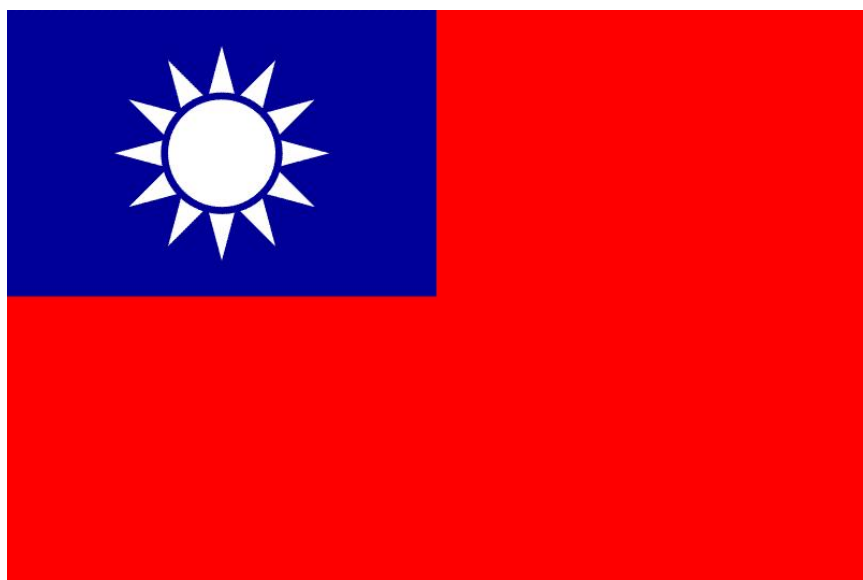
苏联人民将永远怀念自己忠诚的儿子和保卫者。今天，

八十年代，列宁格勒有一条新干线已命名为布柳赫尔大道，还竖起了一块献给他的纪念牌。哈巴罗夫斯克出现了布柳赫尔广场，哈尔科夫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彼尔姆第9育马中学也取得了这样的荣誉，这座学校的红色探索者走遍了苏维埃国家第一位红旗勋章获得者战斗过的地方。秋明的共青团员和青年每年都传统地举行苏联元帅瓦·康·布柳赫尔杯的接力赛跑，表示对家乡从高尔察克分子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庆贺……

首都和各地方的出版社纷纷出版广泛介绍父亲生活和军事政治活动各个侧面的书籍。

在遥远的“我国”边疆区彻底粉碎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60周年前夕，哈巴罗夫斯克出版了一本记叙远东人英雄功绩的《这里是俄罗斯的边境》。1981年，“科学”出版社印行了苏联元帅、两次苏联英雄瓦·伊·崔可夫的军事顾问的札记《在中国的使命》。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集体编撰的《中国现代史（1917—1927）》第1卷也已于1983年下半年出版，其中有许多篇幅写到了瓦·康·布柳赫尔。

现在，我也想竭力尽一点做儿子的责任。在这本《父亲的战斗道路》里我力求以当今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历史，并殷切希望我们的年青人能够把这一光荣的过去看作为经验之最丰富的源泉，看作为加强思索，鼓舞他们去从事光荣事业的素材。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